目录

序言.................................................................1

第一部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 .........................9

一、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而不断地进行
阶级斗争，还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1.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我党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的提纲受到了嘲弄.................................12

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
略集团，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
争势力..........................................................12

削减军费一百亿比利时法郎..............................15

互不侵犯条约......................................................16

民主修改政府纲领吗？.................................18

政策的失败..................................................19

核武器的扩散..............................................19

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21

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侵略..................................................21
侵略社会主义古巴的威胁 .............................................. 25
政治局违背了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 32
2. 武器的性质能否决定一切？——修正主义的
矛盾 ............................................................................. 38
3.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
的形式之一” .................................................................. 40
4.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战争危险的活动的指南 ...................................... 41

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
斗争，还是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
同资产阶级合作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八十一个
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被抛弃）
1. 刚果 ............................................................................. 44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 45
   比利时的军事干涉 ..................................................... 47
   刚果和联合国 ........................................................ 48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和平共处”？ .................... 49
   加丹加的停火 ......................................................... 50
   帝国主义对刚果的“新政策” ..................................... 51
2. 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古巴——中国 .................... 52
3.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呢，还是新殖民主义？ .................. 54
   现代修正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 55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各个阶段 ..................................... 58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 ...................... 59
三、为当前的要求、为民主自由和为有利于人民群众的
改革而进行有效的斗争，还是长入社会资本主义

1. 反对单一法的斗争和百万人大罢工…………………………61
   紧缩政策………………………………………………61
   百万人罢工的准备工作………………………………62
   罢工……………………………………………………64
   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的错误…………………………66
   罢工的后果，选举……………………………………69
   聂菲耶尔—斯巴克政府…………………………………72

2. 关于工厂的、职业的、职业间的纲领……………………74

3. 行动和谈判…………………………………………………75

4. 改革改革…………………………………………………77

5. 社会纲领…………………………………………………79

6. 把工资同生产利溢联系起来吗？…………………………82

7. 反罢工法案………………………………………………83

8. 争取改革的斗争——有各式各样的改革……………………84

9. 联邦制……………………………………………………92

10. 帮助左翼社会党劳动者摆脱改良主义呢?还是
    掘救右派分子呢?………………………………………101

11. 群众行动呢，还是议会法?……………………………106

12. 共同市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108

四、要革命呢，还是要社会改革？要马克思列宁

主义呢，还是要修正主义？要共产党呢，还是

要改良主义的政党？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

结呢，还是要在修正主义基础上的假“团结”？

1.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吗？………………113

2.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否必要？……………116
3. 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 .......................... 117
4. 国家是否为阶级的国家？ .............................. 121
5. 修正主义者的手法........................................... 124
6. 是“后退”了，还是从十一大到十四大 ............... 129
7. 政治局与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危险.......................... 131

第二部分

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章

修改草案 .......................................................... 141

一、一个修正主义的总纲领....................................... 143
二、是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 145
三、党章结论（我们的草案）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内团结不可缺少的基础........ 146

帝国主义 .......................................................... 146
帝国主义的侵略人................................................. 147
共产主义社会 ..................................................... 147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 148
马克思列宁主义 ................................................... 149
社会主义革命 ..................................................... 149
王国主义列宁主义的党 .......................................... 151
比利时共产党 ..................................................... 152

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界胜利的时代 ........................................ 153

四、民主集中制，还是官僚集中制 ........................... 156
第三部分
愈来愈深地陷入修正主义
从政治局的暴力行为到它的制造分裂的阴谋手段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及其后果

一、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手法
一个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
既成事实
修正主义者害怕政治讨论
分裂主义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修正主义者的惶恐和“四人”的被开除
党领导机构的分裂活动与日俱增

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与政治局相互支持

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路线”与实践中的修正主义
关于伯内尔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再论反罢工草案
党的领导机构是否丢掉了自己的纲领?
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对西班牙贵族进行的“有效工作”
修正主义的骗局与有效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相对立
反对修正主义者所要的分裂——怎么办?
序 言

报纸和电台1963年4月16日宣布，四名党员——大家熟悉的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被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

代表大会主席团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甚至拒绝他们进入会场。

布鲁塞尔地区党代表大会和这几位党员所在的基层组织均未得到通知。

这种不能容忍的做法，理所当然地使人不能信任并加以谴责党的领导。

现在，受类似这种专断行为迫害的，已经是好几百名布鲁塞尔共产党员了。这种专断行为的目的，在于不惜一切手段，维持领导集团对党的控制。

所有这些同志的“罪行”何在呢?

安特卫普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丝毫未提及政治分歧的问题。

将近两年以来，《红旗报》一直用无耻的诽谤，既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又对他们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党的政治局把自己所挑起的、分裂党的严重冲突公开了。

难道只有诽谤别人才有发言权吗?

受攻击的同志们的明确的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立场。经验证明，只有这种立场，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才能引导工人阶级达到社会主义。

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几个专家的事情，也不是学派讨论的对象，它们关系到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因此，我们不得不出版这本书。

通过向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党的领导集团企图制定一种违背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违背1960年八十一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宪章——的政策。

党的领导的政策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1967年莫斯科宣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据。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据。”

奉行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的党，被取消了。

修正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是有危害性的，同时它还采取各种打击手段，破坏列宁主义的行动准则和党章。

修正主义者知道，如果遵守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如果全体党员能够行使共产党员的正常权利，那么，由上面强加于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很快就会被清除掉。

因此，他们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开展一个
造謠中傷的運動，也正是為了掩蓋他們的活動。

領導機構里的修正主義者害怕黨內的同志得悉真實情況。

幾個月以來，他們再三再四地進行各種分裂主義陰謀活動。這些陰謀活動在今天已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

同時，政治局公開污蔑和攻擊了一些兄弟黨，這樣，便把國際共产主義運動推向分裂。

党的領導人对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敵對，是秋波頻送、頗揚備至，面對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進行斗爭的革命戰士和兄弟黨，却懷恨在心。

然而，形势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多么有利啊！資本主義动摇得多厲害啊！

的确，我們的时代是資本主義腐朽的时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时代，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

偉大的十月革命打開了道路，十天的時間便震撼了世界。一個落后的國家已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有着六億五千万人口，占社會主義陣營人口的三分之二——，在亞洲給了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對世界力量對比的变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柏林到河內，從地拉那到平壤，從莫斯科到北京，組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擁有十億人口。

以後，勝利的古巴革命又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團結一致，社會主義陣營是不可戰勝的。它是爭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斗爭勝利的保證。
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力量不断地壮大，猛烈地冲击着殖民国奴役制度。占资本主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还处在不能容忍的剥削与压迫之下；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即将被世界革命所突破的环节。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正进行着不断高涨的斗争，反对托拉斯、垄断资本和它们的国家，维护他们的要求与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社会主义。

劳动人民的一切胜利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
的确，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现阶段可能是个最后斗争的阶段。

在我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进攻和阴谋诡计，却碰到了经常表现出意气风发的无产阶级，碰到了日益提高的阶级觉悟。

不久前的百万人大罢工，沃尔罢工，1961年底公用事业职工的行动，儿星期前冶金工作人员的行动和反对反罢工法案的斗争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就是上述情况的证明。

直到现在为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一优秀的工人阶级取得其战斗性应该可以取得的成果呢？

谁使得国民收入中纯工资部分下降了呢？
誰使得:
——對民主自由、對罷工的威脅越來越明顯了呢?
——我們同英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北大西洋公約侵略集團勾結在一起的呢?
——軍費开支有增無減呢?

為什麼在我國工人階級具有如此战斗性的情況下，資本主義仍然如此強大呢?

其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腐人的思想，是比利時工人黨和比利時社會黨先后宣傳了幾十年的這種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

是:
——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它按照我黨領導機構中修正主義者嘴裡的詞彙，把革命者稱為危險的、沒有耐心的人，數條主義者、空論家和浪漫主義者。
——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它認為談判可以代替行動。
——這樣的一種機會主義，它只談所謂的“現實”和“明智的妥協”，以掩蓋其投降行徑。
——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它斷言應當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它頌揚資產階級的議會制。
——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它為了在資產階級挑起的廝殺中，站到資產階級一邊去，而不停地否認階級的階級內容。
——這一類改良主義者，他們謊稱革命者希望戰爭，謊稱社會主義國家是侵略性的國家！
——這一類改良主義者，他們謊稱為和平服務，背叛了西班牙共和國，贊成慕尼黑，從而把世界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參預冷戰，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它顯然不要戰斗的、先鋒隊的
党。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掌握着强大的组织，用以向工人阶级内部渗透资产阶级思想，把中央各部门“老爷们”的欺骗性决议强加给工人阶级。

——这样的一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其失败，一直是任何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甚至是任何局部成功的先决条件。

——列宁毕生与之斗争的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改良主义。

这种改良主义建立了一些什么呢？
除了失望和背叛之外，它给工人阶级带来了些什么呢？
无产阶级越来越厌恶它了，并竭力要摆脱它。

目前，党内情况如何呢？
政治局在最近三年中干些什么呢？
今天，它想把什么东西强加给我们呢？

和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实践惊人地相似，以致不能不引起党员积极分子的警惕。
难道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新思想”吗？
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吗？

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提纲草案和新党章第一条构成了在我国推行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完整纲领。

塞尔・科尔斯、柯纳・兰多尔夫同志和我自己，那时候为准备代表大会而草拟了两个文件。

其中之一，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它一方面批驳了提纲草案
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这个文件于1963年3月1日脱稿。以后，我们只作了若干修订，特别是关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估计和关于瓦隆人民运动作用的分析。

另一文件，即党章修改草案，政治上最重要部分的详细摘要，构成本书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也保持了原来形式。

莫里斯·德洛涅、莫里斯·马索拉萨和其他同志为撰写第三部分，为全书政治上和文字上的校正，贡献了力量。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将近两个月的今天，党同们和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还看不到代表大会“通过”的所谓提纲。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老爷们”还在为之“加工”……

这说明，对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并不赋于任何价值和重要意义，而这次代表大会却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自称这是他们的代表大会。

总而言之，领导机构起草的工作报告、提纲草案和党章修改草案暴露了领导机构的面目。它的政治实践和它所使用的反党专断方法，也表明它是有罪的。

不要很长时间，党领导机构里的修正主义者就会被所有诚实的共产党员从革命工人运动中清除掉。

向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目标前进，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目标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雅克·格里巴

1963年6月5日
第一部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
在开展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在争取
满足要求、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改革的斗争中，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举行一种符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
利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经常关心保卫我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最高利益，有没有经常关心促进那些为他们自身的解放
而斗争的人民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国际无产阶级的
团结，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刚果、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开展必要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
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腐蚀、反对构成当前主要危险的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同时也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关心加强劳动者的斗争意志，提高无产
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工人阶级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有所准备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正确地执行八十一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的指示和我党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的提案？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检查一下，这些提纲是否已由事实和阶
级斗争的实践所证实呢？

中央委员会在制订政治路线时有没有正确地估计到形势的
一切具体方面和一切新因素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而言之，中央委员会有没有起到一个革命党、先锋队和马
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机构的作用呢？

这些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
实际上，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就会使人看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
会，总的来说，没有完成任务。
一、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而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还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1.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受到了嘲弄

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集团，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

我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揭露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是欧洲的和平共处、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头号敌人。

声明还揭露美帝国主义领导下的，还有英、法、西德等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的侵略性。

根据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其本质来说，已谈不上什么侵略性了，问题已不在条约本身，而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端分子"了，这些复仇主义者就是这些极端分子的代表。

工作报告一方面承认，
“美国垄断集团继续奉行一种超军备政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鼓励德国侵略意图。”

但另一方面宣称：

“……美国不得不提出更具体的裁军建议，不得不在柏林问题上继续谈判，并遏制德国军国主义者过份好战的言论。”（提纲草案第一条、第二条）

1962年9月7日（肯尼迪决定侵略古巴所采取的严重措施六个星期之前），在《红旗报》上写道，让・特尔夫在《红旗报》上写道，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肯尼迪起着主角的作用……”

“肯尼迪总统走上了和平道路。现在重要的是，防止他走上另一条道路。”

让・特尔夫又在1962年2月4日和5日的《红旗报》上发挥了同一论点。而且，在让・特尔夫看来，“加强肯尼迪的地位”已成为争取和平的行动目标了！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让・特尔夫还引证了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谈判。然而，同一个《红旗报》却指出，在美国的支持下，美国不顾阻止核试验！显然，几天之后，美国又进行地下核试验了。

至于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如果说它会因谈判的必要性作过积极的声明……但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极端分子的压力下，逐步屈服了”。

关于斯巴克，1962年8月7日的《红旗报》确曾说过，“他脑子里考虑的显然是均势解决办法。也正是因此而使他得到威信”。

因此，中央委员会，从机会主义陷入修正主义，把下列论点规定为所谓争取和平斗争的三个基本观念之一（提纲草案第三十七条）：

“特别重要的是瘫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端分子。”
共产党并不认为比利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組織是可能的。但是它认为，使比利时在北大西洋公约組織内反对冷战狂热分子则是可能的。这些狂热分子，例如波恩复仇主义者，否认走向缓和局势的必要性。”

放弃阶级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是有其必然的逻辑的。

中央委员会不是去分析战争危险的真正原因和争取和平斗争的基本力量（在我国，是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和利用帝国主义内部和垄断集团内部的矛盾），而是对形势进行了一种十分主观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和最明显的事实完全相违背的，这种分析的基础是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行动服从这个或那个垄断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立场。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里，一次也没有揭露作为世界主要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美帝国主义，这难道不是已经够意味深长的了吗?

分析国际形势而“遗漏”这样基本的因素，只能是错误的分析。因此这种分析只能导向错误的结论，导向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

——信任斯巴克的“均势解决办法”(?);
——“肯尼迪，是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主角”;
——“肯尼迪走上了和平的道路”;
——“加强肯尼迪的地位”;
这样就完全错了。

1961年11月20日《红旗报》社论向肯尼迪进言：“要郑重地确定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組織内的领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退出而完全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組織，以便在該組織内起“有效的”作用，来
加强肯尼迪(和斯巴克)的地位！

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似乎都需要肯尼迪的支持。肯尼迪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放棄反对战争危险的真正斗争，从而什么都是“有理由的”了。

**削减军费一百亿比利时法郎**

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經认为“目前比利时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迫使政府削减军费一百亿。

事实上，中央委员会已放棄了这个目标和要求，而代之以另一种目标：“不再增加军事开支”！

很久以来，我们就习惯于社会民主党在它的代表大会和竞选纲領里提出某些正确的口号和要求，但是后来它们就借口“现实主义”、“效率”、“责任心”和“必要的妥协”，而把这些口号和要求一脚踢开了。

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很好地解釋了削减一百亿军费这一目标的意义，它意味着和北大西洋公约組織的指令一刀两断(恢复到朝鲜战争前的预算)，并且指出哪里能获得必要的钱来满足工人的迫切要求。

“冻结军事开支”这一目标绝不意味着依附北大西洋公约組織侵略集团这种对外政策的根本改变。它不能同动员劳动者提出要求联系起来。它和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包括某些极端分子)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些集团批评军队中的“浪费现象”，他们只希望军队开支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工作报告企图为此进行辩解，说什么“削减一百亿军费”是一种“解释性的”(?)口号，而“冻结军费”则是行动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党本来应该使党員具有的信心，就被中央委员会的这种
态度所破坏了。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难道就不再是行动目标了吗？
一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削减一百亿军费”不是行动口号，而另一方面，同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草案，却说“有监督的普遍裁军已成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了”！

如此自相矛盾的政治观点，难道有一点点严肃之处吗？

事实上，在这方面犹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这几年来政治局的政治态度沾染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被这种或那种时髦观念，或者是自以为是时髦的观念，牵着鼻子走。

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规定的争取和平的具体斗争的其他方针是，
——完全停止核试验，作为完全销毁核武器的第一阶段；
——支持一切裁减军备的倡议（腊帕茨基计划和非军事化地区）；
——防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推行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政策（这个目标特别包括不使西德国防军获得原子武器，不许在比利时领土建立德国军火库）；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以上这些方针，都已经被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的没有讨论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成员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新”口号所淹没了。一年半以来，这个“新”口号已被看作为首要的目标，看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三个基本观念的首要观念（提纲草案第三十七条），看作为“当前最完全和最切实实际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为其他的解决办法开辟道路，而不排除任何一个解决办法”（1962年7月14日《红旗报》）。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种互不侵犯条约，作为缓和局势的若干措施之一。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这项建议。但是，对任何一个道理的人来说，这种条约的政治价值，只有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或至少暂时，采取缓和局势的具体措施，才有意义；就是说同它们的侵略政策完全不同的措施，真正能巩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措施。

联合国宪章不是已经含有不使用武力和消除任何侵略行为的庄严保证吗……？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惜任何代价，顽固地在群众中宣传（而且毫无结果）这种思想，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是“孤立原子冒险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关键”（见1962年5月10日《红旗报》，埃内斯特·伯内尔在别的口号下进行的伟大的5月8日运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宣传有什么根据呢？

1961年9月，柏林问题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消息。而且，即使不是唯一的焦点，似乎也是焦点之一。当时本来应当迫使帝国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放弃它们的侵略政策。

赫鲁晓夫曾肯定和约将在那一年签订。帝国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地位的软弱而显得有点不安。当时斯巴克就插手进来，拿出他的“出色”的替代办法，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从那时候起，政治局就把这个口号提到前面来了。这样做，恰恰符合后来当斯巴克已经像丢掉一件过时的上衣那样丢掉了他的“英明的”想法时所清楚地表明的下列估计。

“况且，继保罗·雷诺和范范尼先生之后，斯巴克也在去年9月访问了赫鲁晓夫，这难道不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吗？听了当时的斯巴克的声明，难道还不应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谈判和缔结北
大西洋公约組織和华沙条约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条约这一真正的均势办法嗎？

保罗—亨利·斯巴克的这种暂时的而且其动机是很明显的立场，必然成为党争取和平斗争的主要目标了！

始终是同一看法，一切都好像资产阶级政客保罗—亨利·斯巴克是争取和平斗争的主角之一，因而也是我国争取和平斗争的唯一主角了。

而且，在这方面，政治局的这种态度，和1954年前我党领导的态度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者，当时的口号是宗派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而现在则是右倾机会主义。

例如1962年5月8日，强大的群众組織，其中有比利时总工会、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和自由工会，都以罢工和示威来支持：
——争取和平，
——停止核试验，
——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
——为在国际监督下普遍裁军而締结必要的協議，
这一广泛的运动。

党的领导要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杰出，而提出“互不侵犯条约”这一口号，这就使1962年5月9日的《红旗报》上出现了下列标题：

《几十万工人罢工，发电报給日内瓦会議，要求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組織和华沙条约間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标题有意歪曲5月8日这一天的性质和内容。

民主改革政府綱領嗎？

在国际問題上，党的领导事实上已經抛棄了真正的斗争的
立场。放弃到了什么程度，特别可以从伯内尔1962年10月底的谈话中衡量出来。谈话的题目是《争取民主修改政府纲领》。

在涉及国际政策方面，伯内尔考虑的唯一一点是“冻结1963年全年军事开支”。

在伯内尔看来，一个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只限于冻结军事开支，就应该得到共产党的同意和支持了。

关于大量削减军费，在比利时驻扎能携带原子弹的空军，在我国建立外国基地，特别是德国基地，延长兵役时间，对朝鲜、共同市场和欧洲煤钢联营的态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后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缓和国际局势的倡议，等等，这些问题，当前竟和这种所谓民主地修改政府纲领没有关系了。

政策的失败

工作报告的第一章第三点承认，“因此，我们应当看到，为什么争取和平的斗争尚未达到能够阻止美苏集团的罪恶行动的规模。”工作报告的以后部分还确认“其原因应当主要从我们自身、从我们党内去找”。

但是，中央委员会不去批评它自己所奉行的政治路线，不进行自我批评，而是像一切坚持错误的领导一样，事实上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同志们的不理解，由于同志们对这些“新思想”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很好地执行。

实际上，修正主义的失败的根子在于这些事实。

核武器的扩散

各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以及这些武器愈来愈扩散，感到特别的不安。
除了美国——主要资本主义原子大国之外，英国和法国都在建立他们的原子“打击力量”。

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地或者是根据各种军事协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许多核基地。从土耳其到台湾、在美国本土、在英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建立的五十个基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

装备着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航行在海洋上。携带氢弹的飞机在天空中不断地飞行着。

是的，各国人民都反对扩散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核武器，不论是否是美国招牌的，还是其他国家招牌的。

1962年6月21日《红旗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了比利时保卫和平联盟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和合作而出版的，它特别指出：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愈多，爆发原子战争的危险就愈大。如果人们不加以警惕，这种核武器就会扩散。根据某些人的说法，中国不久将拥有这种武器，即将我们的德国正在坚持要求核武器，如果不履行和约义务，德国的要求就会有兑现的危险”。然而，美国确确实实在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地，却没有作为扩散危险而受到揭露。

但是，《红旗报》却支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是和平的）和波恩的复仇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宁可使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忍受来自美国本土、苏联和阿富汗和中太平洋任何一点的核侵略，却不能让他们拥有原子武器！

这难道是为和平事业服务，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沮丧吗？

这是欺骗人民，这是为帝国主义效劳。
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反对世界大战危险的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斗争，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其他形式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都是没有矛盾的。

恰恰相反！

这些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和这些革命运动打击战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削弱它们的力量，在客观上加强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

正是根据这样的精神，我们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声明反对反动派企图在刚果进行血腥冒险，支持刚果人民的斗争。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也表示了关怀。

根据近几年来的局势，特别还应该加上对受侵略之害的古巴、越南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关于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刚果，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

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

关于印度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报告竟一字不提！

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报》简直和大多数资产阶级报纸唱同一个调子，有时比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还要更右些。《红旗报》只转载新德里的造谣消息。

党内有人提出了抗议，而《红旗报》是这样解决问题的：1962年11月15日和16日，该报仅仅转载了新德里的消息，而资产阶级报纸转载的一模一样，并且谎称是北京的消息！

这些手段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在反对侵略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不依靠人民的行动，
而寧願指望像肯尼迪和斯巴克这类主角，指望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所谓“第三种力量”，那就不得不隐瞒真理，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采取敌视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工资阶级报纸和《红旗报》无耻歪曲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不仅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于一切不被错误思想蒙蔽的人来说，情况是很清楚的，事实驳斥了政治局的歪曲和诽谤。

代表印度反动资产阶级的尼赫鲁，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愈来愈陷入反动立场，这是很明显的。克拉拉邦所发生的事情，便是一个例证。

成千上万的印度劳动者，由于示威反对极端贫困，而死在尼赫鲁的警察的子弹下。少数民族遭受压迫，种姓制度继续存在。

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中，越来越依靠帝国主义大国的投资，特别依靠所谓“援助”。这种“援助”高达几千亿比利时法郎（去年一年约六百五十亿比利时法郎）。

自称为“反帝”的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同时却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内）越来越执行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和美帝国主义同谋的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

必须撕下尼赫鲁在国际政策上所谓“不结盟”的假面具。让我们举几个尼赫鲁立场的例子：

1956年，诬蔑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1958年，为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和约旦辩护；
1968年，为伊拉克人民的敌人和刽子手费萨尔之死，表示遗憾；
1960年，拒绝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军事条约的斗争；
1961年，当美国的雇佣兵企图入侵古巴时，尼赫鲁发表声明
說：“印度既不能，也沒有資格，根據古巴的國際形勢，判斷誰是誰非。”

1959年，印度軍隊在我中國領土上進行了攻擊。我們的中國同志，多次建議談判，但沒有結果。早在1959年，中國同志就建議雙方武装力量從实际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以便創造談判條件。此外，中國軍隊還建議從这条控制線後撤了二十公里。印度軍隊佔領了這個地區，重新恢復了侵略活動。1962年10月15日，本次談判即將恢復三天前，尼赫魯下令進攻。究竟誰是侵略者呢？新的進攻發動後，我們的中國同志又建議停火，各從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並舉行談判。但尼赫魯狂妄地拒絕了這些建議，他的軍隊進一步深入中國領土，在某些地方甚至越过了印度反動資產階級繼英帝國主義後所主張的所謂“麥克馬洪線”。

以後的事情也是盡人皆知的，中國邊防部隊打退了侵略者。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議，立即停火，撤退到1959年的實際控制線，在这条控制線兩側建立一個二十公里的非軍事地區，並舉行談判。儘管尼赫魯拒絕這些寬宏大量的建議，我們的中國同志還是撤回到它所提出的这条控制線，再一次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此外，我們的中國同志原則上接受了科倫坡會議六國代表的建議，但是，在最重要的舉行談判這一點上，六國建議被尼赫魯拒絕了。

誰去救尼赫魯的呢？是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是南朝鮮和南越的腐敗政權。蘇聯以米高21 战斗机供应印度的消息，在我們的隊伍中引起很大的震動，也使消息不靈通的、受欺騙的我國轟論，迷失方向。

在印度共產黨內，一部分領導表現出政治衰退，聲討尼赫魯的侵略，並且捐資資助反動資產階級購買軍火，而另一部分領導
则被关进监狱并受到死亡的威胁。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的应当
被侵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要
顶住情绪激动的狂徒，要有勇气看到真理，并说出真理，代表印
度反动资产阶级的尼赫鲁是侵略者。

1962年11月6日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作出了一项
决议，揭露尼赫鲁是侵略者，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声援。全
文如下：

“共产党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注意到，一部分舆论在
中印边界问题上受到歪曲报道的欺骗，兹特：

——提醒注意，人民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问题，而且同尼
泊尔、巴基斯坦和缅甸也都有边界问题；

——强调指出，人民中国同尼泊尔、巴基斯坦和缅甸通过谈
判，已和平地解决了这些边界问题；

——提醒注意，许多年来已同尼赫鲁的印度提出过和平解决
的同样建议，尼赫鲁顽固地拒绝进行任何实际谈判，甚至利用
人民中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单方面诺言，占领了这
块撤出的领土；尽管对人民中国进行种种挑衅，但它仍然继续不
断地建议谈判；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公然告诉全世界，他
已命令他的军队驱逐中国人，在人民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了进攻；

——谴责代表印度反动资产阶级的尼赫鲁，他是侵略者，他
伙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挑衅；

——要求比利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赞成恢复它在
联合国被傀儡蒋介石窃踞的席位；谴责印度反动资产阶级的侵
略阴谋；赞成苏联和人民中国建议的不战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

为尼赫鲁宣传的《红旗报》不发表这个决议。先是政治局，
后来是中央委员会，就谴责这个决议，说它违背党的路线！
在这些事件中，中央委员会不仅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义务，而且事实上已站到帝国主义帮凶那边去了。

侵略社会主义古巴的威胁

阶级斗争最紧张的时期更清楚地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它迫使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暴露出自己是斗争的敌人，革命的敌人，因而就有意无意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1962年10—11月加勒比海事件又一次暴露了政治局的机会主义立场。

对于那些不管这些事件，而仍然认为“肯尼迪是争取和平的主角……”“肯尼迪走上了和平道路……”，“应该加强肯尼迪地位……”的人，不可能对古巴有真正团结一致的行动，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也就必定会继续把斯巴克看作是和平人物。在1962年10月24日《红旗报》第一版上，不加评论地引用斯巴克称赞肯尼迪的声明，其标题是：《斯巴克赞同谈判》。难道这是可以容许的吗？

在1962年10月23、24、25和26日《红旗报》第一版的标题中，“支持古巴”这样一个口号一次也没有出现。这样还配称为共产党报纸吗？1962年10月27日和28日，我们党出版了一个宣传专刊，并发行了好几千份。当时我们正处在人们所说的“加勒比海危机”的高潮。有一页是关于埃内斯特・伯内尔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古巴事件。

在那一页的背面，如果说美国侵略古巴的战争措施受到了
譴責，但仍找不到支持古巴的具体行动口号。罗伯・达赖还在坚持说古巴没有发射台，而赫鲁晓夫此时却已经证实了这件事。

10月27日馬特維夫在《消息报》上说得对：“美国有些人，以他們无耻的讨价还价来衡量一切，以为，可以让出接近苏联领土的几个美国基地，以换取古巴放弃其反对美国侵略的防御手段。例如《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10月25日的文章中就是这样推論的。这类所谓建议只不过暴露了提议者的恶意罢了。”

但是同一天，赫鲁晓夫却“同意从古巴撤出肯尼迪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而以美国从土耳其撤出类似武器为交换”。

翌日，10月28日，肯尼迪在一封罕有地公開的信件中，提出他的“美国和平”的条件：“在适当的联合国观察和监督下，把这些武器系统撤出古巴，并且在适当的保证下，肯定不再把这种武器系统运入古巴。”在作出这方面的适当安排之后，美国就“马上取消隔离措施，并提供不进攻古巴的保证”。

然而，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代表的话，特别是肯尼迪的话，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在古巴问题上，大家都知道，美国侵略政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肯尼迪的“保证”又有多少价值！

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复肯尼迪的信中说：“我对您1962年10月27日信中所作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这个声明就是不对古巴进攻……正如我在10月27日的信中通知您的，我们同意同您达成协议，让联合国代表去古巴核实您称之为进攻性武器的拆除工作。”

《红旗报》1962年11月8日的标题是，
《赫鲁晓夫说：要么我们信任肯尼迪的诺言，要么就走向战争》。

根据《红旗报》的解释，人类的命运、战争与和平，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信任肯尼迪的诺言。防止世界大战不再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斗争，不再取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信任肯尼迪。

这种“推论”的逻辑结果，必然认为：要对战争危险负责任的，不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那些对肯尼迪不信任的人，例如我们的古巴同志。

而且，让·布鲁姆在1963年2月12日《红旗报》上就是这样说的。他把原应属于帝国主义的罪责，归之于那些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危险的人，归咎于那些号召人民保持警惕以防止威胁和挫败侵略者（如果侵略者发动疯狂进攻的话）的人。实际上，如果帝国主义者不认识到人民能够挫败他们，那么侵略的危险就不可能防止。

面临着侵略的危险而不动员群众，这就是准备让自已彻底失败。

以古巴的主权做交易，同意把古巴变成又一个附庸，来换取肯尼迪不侵犯的诺言，这不是妥协的基础。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对这种要求愤慨地回答说：不！他们提出了五项真正保证的条件。

1962年11月6日，当还在对古巴实施海上军事封锁时，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以多数票通过了下列决议：

保卫古巴，就是保卫和平。

“共产党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意识到，美国在加勒比
海挑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尚未结束——肯尼迪政府已提出若干新的要求，并使它自己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交换信件时所作的保证成了问题，兹特：

——强调指出，全体公民必须提高警惕，以便挫败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美帝国主义已经，并且不会不，企求于这些新阴谋，企图实现其根本目标，消灭卡斯特罗领导的人民政权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

——要求一切正直的人们积极声援古巴，使古巴人民获得他们认为必要的保证，以便确保他们的人权，确保他们的独立，确保他们有可能来建设他们所选择的制度。这种国际声援是挫败那侵略成性的、强横的美帝国主义新计划的主要条件之一；

——认为声援古巴人民保卫权利，是保卫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呼吁人民要求政府不支持美国侵略集团，特别是拒绝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任何封锁古巴的行动，要求政府采取或支持一切旨在保证古巴独立和世界和平的行动。

1962年11月6日

先是由政治局，后来是中央委员会，都认为这项决议是违背党的路线的。

我们的领导就是这样一个谴责一呼一应声援古巴人民决议的领导！

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个问题的第二点说道：‘他们（美帝国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集团）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封锁、破坏交通、侵略这个岛屿的威胁）所挑起的、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边缘的严重危机，已由于苏联和古巴的冷静而得到解决……’。

28
然而，经济封锁、破坏交通和侵略这个岛屿的威胁仍然存在，有了什么变化呢？

同我党政治局的同志相反，我们赞成并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1963年1月16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对我们的说话，加勒比海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意见是：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没有赢得和平。迫使我们采取的那些措施和迫使我们采取我们曾经采取的那些步骤的一切情况，还依然存在，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吗？难道美帝国主义者公然宣称的敌视和侵略我国的政策不是依然存在吗？我们不相信肯尼迪的话，而且肯尼迪也没有许下什么诺言。如果他说曾经许下过什么诺言，那么他也早已把它取消了。

“因此，我们说，对我们的说话，并不存在实现我们在那次危机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的令人满意的保证。如果说，我们仍在这里，只是由于肯尼迪的诺言；这就不真实的了。

“对我们的说话，和平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呢？自从肯尼迪在奥兰治博尔发表谈话以来，帝国主义特务已犯下了四次谋杀罪行，他们携带美国武器，执行美国命令；这是帝国主义者公开宣称的颠覆政策……

“我们当时是怎样说的呢？我们曾说，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用饥饿来扼杀我们，孤立我们，在空中和海上的一切航道上施加压力，剥夺我们基本原料物资，在我国制造饥荒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不顾国际法、不顾联合国的原则，而执行这一封锁我们、给我们制造各种不可设想的困难的政策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扰乱我国的社会秩序、运送武器、派进英和训练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并组织雇佣军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自认为有权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的话，如果帝国主
义者自认为有权组织海盗集团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
权横在我国的一块领土上，威胁我国领土的话，如果是这样，怎么能使问题获得解决呢？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要求撤走朋友的武器，而在我
们的祖国的土地上保留着敌人的武器呢？这是些用于侵略的武器。帝国主义
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肯尼迪先生在危机后发表的三次声明中，使用了威胁性
的言辞，即有言论，坚持他在经济、政治和其它方面对古巴施压
力的政策。他说如果我们不策动颠覆活动，他就保证不侵犯古
巴。但是，对肯尼迪说来，一个讨论拉丁美洲饥饿和极端贫困问
题的妇女代表大会，就是颠覆活动。”

卡斯特罗还提到肯尼迪在奥兰基博尔与雇佣军的讲话，他
在这次讲话中说，他将在哈瓦那把雇佣军的旗帜交还他们。卡
斯特罗还提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的讲话，腊斯克说，美国没
有作过任何不入侵古巴的保证。

“他们这样做时，不但否认他们不入侵古巴的诺言，而
且也否认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有不进行侵略的义务。此外，他
们还暴露出美国统治者的强盗和海盗的本性。

“帝国主义者表现出某种乐观情绪，这反映在他们的估
计中。我并不认为这种乐观情绪有任何根据，它只不过是过低估
计了世界的现实，过低估计了各国人民的力量。”“当然，他们希
望在拉丁美洲建一个指头都不动一动，他们希望各国人民不
要起来斗争。例如，委内瑞拉人民的英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
一场可怕的恶梦。他们希望能让他们在更加惨无人道的剥削的基
础上平坦无事地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基础。⋯⋯

① 多瓦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
版社1965年版第12—14页。——译者

20
“……也有个别的人批评我们。很自然，有些好心的、感到困惑的人，或居心不良的人，自古巴自危机发生以来，在观察和海防飞行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批评统革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在这些人看来，似乎我们应该让人来观察，应该授权帝国主义者指定什么武器我们可以有，什么武器我们不可以有。似乎我们应该让这个国家退回到普拉特统治的时代。”

“接受观察，就是意味着我们同意向帝国主义请示：在我们领土上，哪一类武器我们可以拥有，哪一类武器我们不可以拥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等于放任我们治权，等于承认我们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低人一等。我们是不接受这一点的，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这一点。

“以为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人，还认为应该让他们登陆而对我们的不发一枪，因为这条道路正好是导致这个结论。但是，走这条道路，就不能在吉隆滩保卫住革命。这一切得以实现是由于走了一条道路，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的道路。

“这些人似乎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飞机在我们高射炮头顶‘俯冲飞行’，而不下令开火。这一点，我们是永远办不到的。因为敌人必须估计到，我们永远只能在战场上，而决不能在叛变中见面。

“我们要的是拥有权利、拥有主权和拥有尊严的和平。我们要和平，但决不会放任革命者的立场，决不放弃革命。

“向侵略者投降是导致战争的道路，是使各国人民遭受奴隶的道路。我们为保卫我们的主权和权利而斗争，正就是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当我们将拉丁美洲人民谈话，向他们说明存在着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在保卫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越腐败，它的危险性和侵略性就越小。各国人民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斗
爭，就是爭取和平的鬥爭。

“我們是爭取的敵人，正是帝國主義者把爭取強加給人類。帝國主義者愈是覺得自己強大，他們愈是具有危險性。因此，全世界各懷著爭取自己主權和獨立而鬥爭的人民，都在保卫著和平。”①

政治局違背了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決議
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共产工人都立声明

分析一下政治局以及追随它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方针和工作，就可以看出，自从列日代表大会以来，在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的斗争方面，党的领导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越来越走上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证实了，并加深了这种倾向。

尽管领导上有这种错误倾向，许多党员和党的组织仍然忠于我们的原则，在反对战争危险，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进行着广泛的积极的活动，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如请愿、派出代表团、游行示威，在工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中提出决策草案、罢工等等……

我們特別指出如下一些活动：

——反对在比利时的德国基地，反对驻扎德国海军。

——争取柏林问题协商解决。

① 参见《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14—19页。——编著

32
——争取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
——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
——反对在比利时驻扎携带原子弹的空军，反对建立原子基地的危险，
——争取削减一百亿军事开支，
——反对延长兵役时间，
——积极参加“5月3日运动”，
——拥护支援古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等等。

2. 武器的性质能否决定一切？
——修正主义的矛盾

修正主义者提出一个“巨大的发现”，热核武器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提纲草案第六条）。

根据专家们的看法，上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所拥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已具有消灭大量人口的威力。

当然，现有的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足以造成空前的毁灭。描绘世界热核大战的恐怖情况，那是容易的。

但是，面对着威胁和危险，怎么办呢？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唤起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可怕罪行的警惕，因为如果帝国主义并不由于害怕会受到人民惩罚和受到彻底失败而被迫住手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犯下这种罪行。

各国人民的这种警惕性，应表现为经常的，坚决的行动，组成最广泛的联盟，以便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泼冷水，削弱他们，并且明白地警告他们，发动侵略就是自取灭亡。

修正主义者大肆宣传核武器的恐怖，神秘，令人丧失信心和
毁灭性。

众所周知，杜鲁门曾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过原子弹，他并不是为了消灭那几乎已经是屈膝投降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威胁苏联和革命运动，尤其是威胁正在向前发展的中国革命。

美国的原子讹诈，作为政治武器和思想武器，就在那时候开始了。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屈膝。在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垄断着原子武器和军事上占压倒优势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胜利。

联合国支持下的、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被打败了。

在美国的大门口，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古巴解放了。但是修正主义却企图制造混乱。在所谓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事实上只是为帝国主义原子讹诈帮忙。他们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贩卖投降主义和怯怯思想。

不仅如此，例如，当中国人民拒绝向原子讹诈屈服时，他们竟指责中国人民是“好战分子”，是想打原子战争。

谁看不出这等诬蔑有多么荒谬和可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要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现在并不是一个“原子大国”，它自己不掌握原子武器，却受到帝国主义热核武器的威胁。

修正主义者所恼怒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帝国主义的讹诈面前，毫不屈膝，正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旗帜。

战争的性质是否在本质上起了变化呢？
说穿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有
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方面的已经过时了。修正主义者认为的新发现是：战争现在只具有这种性质了，战争的性质取决于武器的特性，而不再取决于政治的阶级内容了，尽管政治是战争的基础。

在一个世纪中，有些工人破坏机器，而不去打击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主张，工人要对技术屈膝，而不要去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打倒帝国主义。

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最终解决社会对抗矛盾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群众。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武器的特性，而是人民群众。反之，修正主义者的意见，实际上是对革命力量悲观失望和丧失信心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最终只能是错误的毫无出路的抉择：要么投降帝国主义，要么自杀。这种观点，一方面把修正主义者引导到冒险主义，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引导到投降主义，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战争的性质已在本质上改变了”的“理论”所产生的矛盾。

提纲草案第七条说：“战争性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一点对帝国主义也同样有效。帝国主义的某些领导人，从那时起，也终于勉强承认：战争已不能用作解决根本对立的手段，因为一场热核战争，也许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危险。

这种倾向虽然还是犹豫的、不确定的，但是它也成为当前形势中的新因素。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为它有助于孤立最富侵略性的集团，并有助于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妥协。”

因此，提纲草案的修正主义起草人认为，引起战争性质发生
“本质上”变化的核武器的存在，就其本身性质而言，是积极的因素，因为它有助于“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妥协”。”

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论点，从逻辑上讲，禁止和取消核武器将会扩大战争危险，因为核武器的消灭将会减少资本主义集团的恐惧思想。

请看，关于战争性质已在本质上改变的修正主义“理论”，会导致多么荒谬的矛盾，这种理论和恐怖平衡法同流合污了。

但是，好比变戏法似的，就在同一提纲第七条中，又若无其事地谈论起“有监督的普遍裁军是当前行动的目标”来了!

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动摇性在作祟，一忽儿幻想现在全世界普遍和解，一忽儿又吓得目瞪口呆，摇摆不定。

修正主义就是这样引诱人们放弃进行有效斗争，争取实现两项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可以在斗争中团结全世界巨大力量的目标，停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限制军备!

这样，修正主义的立场事实上接近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最近斯巴克在答复社会党议员格尔利纳时，还重申了这种政策，他说：“这个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数成员国家一致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比利时政府认为，只裁减核武器的计划，对于西方国家的安全是危险的。”

比利时政府的确认为：这种计划旨在转移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使他们忽视目前人类尖锐地面临的安全的真正问题，有监督的全面裁军问题。

在提纲草案第五十四条中，很清楚地暴露出，修正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概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在第三段中写道：

“……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作为一种符合目前条件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革命手段。”(1)

在这里说什么“革命手段”，这是冒名顶替，这是欺骗。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和平共处，素来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并不是一项适用于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压迫者的关系的原则。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不能代表别的阶级斗争形式，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否认别的阶级斗争形式。

而且，别的形式的阶级斗争，由于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加强人民力量，却增加了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中，经常是只谈和平共处而“忘了”加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这不是偶然的！

此外，当让·特尔夫(在1963年2月5日《红旗报》上)继别人之后，重复说：“组织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时，他也在国家政策上注入了同样的修正主义观点。

对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这就是说，应当包含下列各个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间，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
——为反对反革命输出、反对侵略而进行坚决斗争；
——坚持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尽一切力量援助和支持
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利益；
——为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而斗争。

提纲草案第十五条的特点是充满修正主义理论的紊乱和他们企图散布的幻想。
这是一种主观主义推论的典型，是无视革命斗争现实的假理论的典型。让我们来叙述这段提纲吧：
“说和平共处是牺牲各国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那是不真实的。
“恰恰相反，避免一场世界大战，就为仍然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解放，为巩固已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各国的民族独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作为和平共处的决定性因素的普遍裁军，并不解除那些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武装，而是解除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因为正是要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夺下那些他们用以阻止进步的武器。因此，普遍裁军只会加强各国人民的反帝正义斗争。”

关于第一段，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不能反对、更不能牺牲仍被压迫的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修正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事实上是牺牲这种斗争，其结果恰恰是危害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本身。
第二段中，“和平共处”仅满足于防止世界大战。
但是第三段中，却说“普遍裁军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这事实上是设想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
世界难道是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吗？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实，也即不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当帝国主义还继续存在的时候，难道能够设想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吗？

没有武器吗？武装力量是国家的根本特征。难道能设想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吗？正是由于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所以资本主义，出于它的本性，是不会放弃武器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侵略战争和压迫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存在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只有当帝国主义被推翻，当人剥削人的制度被废除的时候，才能有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

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压迫着、并剥削着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他们所以能够如此，正是由于他们有武装。由于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剥削，每年有千百万人饿死、累死和由于缺乏治疗而病死。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帝国主义的枪弹和其他杀人武器之下。

然而，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却向这十亿争取解放的人民讲述一些荒诞的故事和寓言，如果那些掠夺你们、压迫你们的强盗放下武器，你们看，那多好呀！……你们看，这些修正主义的传教士在传布一种新的教义，一边是原子弹等大灾大难的威胁，另一边是坏人裁军的天堂；于是请耐心地忍受痛苦吧！这就是修正主义新教义麻痹人民的鸦片。
3.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

借口和平，斯巴克于1938年为在法西斯威胁面前实行“中立”政策辩解，为他的“不干涉”政策，即为拒绝援助遭受侵略的西班牙共和国辩解。

借口和平（也是害怕），斯巴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他参与帝国主义加速准备战争的政策“辩解”。

借口和平，他现在追随肯尼迪的政策！

借口和平，达拉第和张伯伦曾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军队打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门，从而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态演变。

借口和平或绥靖，殖民主义者过去干了，现在还在干着强盗勾当。

借口和平，美帝国主义建立了许多侵略各国人民，特别是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子基地。

借口和平，帝国主义者干涉了朝鲜和老挝，现在又干涉南越和文莱，并威胁古巴！

借口和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引入歧途的活动，分化世界和平力量的活动，削弱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服务于美帝国主义。

借口和平，党的领导中的修正主义者宣扬他们的投降主义和麻痹群众行动的观点，诬蔑党内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说他们是“好战分子”，修

---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全集》，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编者
正主义者就是这样和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唱同一个调子的。

面对这些迷惑和欺骗群众的勾当，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更需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方面，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4.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险的活动的指南

战争是帝国主义最骇人听闻的、最无人性的、最野蛮的必然产物，即便没有公开的冲突，军费负担也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劳动人民是这种资本主义产物的受害者。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一貫谴责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来反对战争，反对备战。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战争并不是人民注定要遭受的不幸命运。

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有所区别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及个别国家里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根源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真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1960年八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这种战争或那种战争的可能性。

“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9页。——编者）
“没有战争的世界”只能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废除了人剥削
人制度的世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我
们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正义战争，支持被剥削者反对
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民族
解放战争。这些正义战争都是对剥削者一贯进行的侵略的回
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谴责1914年至1918年战争的交战国，
并称这次战争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曾号召各国人民变帝国主
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曾反对
希特勒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以苏联
为首，事实上领导了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支持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
利亚、安哥拉及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我们曾揭露了，
并反对了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侵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由
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由于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由于一
切和平力量，面对着因矛盾重重而四分五裂的帝国主义，在斗争
中警惕和团结，所以现在有可能防止世界大战了。

维持和巩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是一项可以实现
的目标。

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组织有效斗争，其条件是要揭露这
种侵略，要揭露其性质和内容，为了防止和避免这种侵略，也必
须准备去迎击它。
目前，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在它的帮助下，德国复仇军国主义已成为一个侵略性的大国，成为欧洲和平共处的头号敌人。我们应当揭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本质，揭露我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统治政策，它尽管有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矛盾，愈加了这种侵略政策。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在这一斗争中提高必要的觉悟，
——为了能够制订出正确的宣传、鼓动和行动的目标，
——为了区别当前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
——为了正确地确定行动方法，
——为了实现一项正确的联合政策，
——为了利用敌人的矛盾，
——总之，为了保证斗争的效果，

上述揭露是必要的。

目前，在比利时，在这方面有效行动的目标要求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划清界线。这些目标是：

——减少比利时军事预算一百亿法郎，
——不延长兵役时间（十二个月），
——不在比利时设立外国基地，
——不在比利时有原子武器，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倡议（腊帕茨基计划，无核武器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承认目前边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条约，取消一切外国基地和国外驻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同华沙条约成员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裁减军备，提出揭露和孤立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普遍裁军建议，
——停止核试验，禁止一切原子武器和核武器，销毁现存的原子武器，
——支援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支援反帝革命运动。
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组成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为实现上述目标而进行胜利的斗争。

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是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同资产阶级合作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八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被抛弃）

1. 刚 果

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项迫切的基本任务。这种团结应该特别表现在具体支援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

对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还压迫着殖民地的那些国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种团结就包含着采取下列明确的态度：

“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1)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编者
口头土承认国际主义，表面上承认各民族平等，会超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一样，满足于改良主义政党习惯奉行的民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和起义同时，能够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

紧张时期，例如我们在刚果事件时所遇到的这种紧张时期，再一次显示出是机会主义的‘一面镜子’。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1960年6月30日以前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1958年，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59年1月爆发的事件说明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危机。对比利时殖民当局来说，继续用老一套办法来维持统治，如果说是不可能的，已经是危险的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至少这是当时殖民主义者中的主要倾向）想试一试新的手法，即采用新殖民主义的形式。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他暂时窥伺着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来分享特权。

伊斯坦格政府的计划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一种事实上的“比利时—刚果共同体”，可能的话，则实现一种得到法律承认的共同体。

比利时垄断资本手中掌握的王牌是：一方面刚果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解放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经验和思想锻炼；另一方面，当地有一套强大的殖民统治机构，包括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

但是，由于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深刻危机，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完全有希望的。特别是考虑到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
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各国人民对运动的支持和声援，以及我国工人阶级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我们党本来能够并且应该在用行动支持解放运动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的党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大帮助散布对局势和对“圆桌会议”意义的幻想。

让·布魯姆（在1960年10月11日的《红旗报》上）显然违反事实在地说：

“终于举行了圆桌会议，而鉴于当时我们政府的实际情况和，它听命于宫廷和大资本家中最反动的阶层。6月30日宣布的刚果独立，在当时其条件算是尽可能优越的了。”

在1960年10月20日的《红旗报》上，他又说：

“自6月30日起，比利时和刚果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地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新阶段。……”

但是比利时的强权资本和他们的政府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刚果的解放运动愈来愈声势浩大。涌现出一批立场愈来愈坚定的刚果领导人，其中有伟大的人物——卢蒙巴。

其他有一些人事实上证明是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自从1960年6月23日卢蒙巴政府成立以来，随着解放运动的愈益高涨，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们即施展各种阴谋，并准备反击。通过这些事件，又一次证明了人民群众不可能“利用”压迫者的国家机器，证明了革命的民族运动不可能利用殖民主义者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面必须粉碎这种国家机器，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国家。

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是怎样的呢？它说：“独立实际上向卢蒙巴政府立即提出了控制国家机器的首要问题。主要
的控制手段是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

这又是改良主义的荒谬言论！不是摧毁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控制”殖民主义者的国家机器。用什么手段去控制呢？用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也就是说用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支柱！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后来就是用它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特别是“治安部队”来向刚果解放运动和卢蒙巴政府发动进攻的。

治安部队的比利时军团单试图把他们的部队投人反对解放运动和反对卢蒙巴的斗争。但事实上，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中，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治安部队里的一部分刚果人甚至投到了卢蒙巴政府一边，反对殖民主义者。

党的领导，在当时和在工作报告中，对这些事件作出了估计，这是在“混乱状态”面前惊慌失措的机会主义者的估计。

比利时的军事干涉

1960年7月9日。星期六，上午十时，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董事长兼通用公司经理吉勒特先生向政府进行了一次交涉。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因治安部队阴谋失败而忧心忡忡，并担心他们的统治地位有失掉的危险。在当天，就开始了比利时对刚果的公开武装干涉。卡米纳军事基地的比利时伞兵投入行动，而且还从比利时本土派出了援兵。

1960年7月11日星期一的《红旗报》参与了比利时官方宣传的造谣，说什么干涉是应刚果政府的请求而进行的。

同一天的《红旗报》发表了政治局的一份公报，强调“在刚果的比利时人的安全”和在刚果“恢复平静”。这个公报不但不号召用行动来反对这次殖民战争的开端，反对派军队到刚果去，争取撤回这些军队，反而借口“向刚果政府提供它认为必要的人
力、物力上的支援，来帮助它击败叛乱者”，它继续写道：

“比利时工人阶级（而且是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容忍一支人数比任何时候更为多的军队在刚果领土上暂时耽一个尽可能短的期间。”

在同一天的简报里又说。

“所以，保证比利时和刚果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一旦恢复平静，就准备把所有在刚果的比利时军队撤回。”

“一旦恢复平静”！对武装干涉一点也不加谴责；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侵略，干涉刚果人民和卢蒙巴政府的比利时军队在刚果的出现，都被描绘成为可以和恢复平静相容的了！

这显然是在资产阶级面前投降，是放弃阶级斗争，是害怕而不是勇敢地斗争。

可是对坚持斗争立场，反对殖民主义干涉的共产党人却怀恨在心。7月10日共青团发表一份简报，要求：

“1. 立即召回被刚果政府撤职的比利时官员和军官；
“2. 立即停止派遣和立即撤回未经刚果政府同意的军队。”

政治局事实上否定了这份简报。有一个中央书记竟在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恬不知耻地说，这种简报“缺乏政治勇气”。

刚果和联合国

1960年7月13日，政治局建议联合国干涉刚果。正是这次干涉断送了卢蒙巴和他的战友们的生命，断送了卢蒙巴政府。在消灭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在刚果建立了新殖民主义的（即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者，主要和美国之间的）新的“力量均势”。

《红旗报》不断为联合国干涉刚果进行辩护，而工作报告也肯定了这一方针。
1960年10月13日，让·布魯姆在《比利时和刚果有着同样利益》（！）的一文中说：

“但是联合国制止了比利时殖民主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谋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再在讨论时期中，并没有打仗，而这已经是一个可贵的收获了。”

就在这个时候，殖民主义和反革命恐怖笼罩着利奥波德维尔、下刚果、加丹加、卡萨等地。

成百的刚果爱国者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进攻下牺牲了。在联合国的掩护下，刚果议会无法行使职能。合法政府不但无法管理国家，而且实际上已处于非法状态。而像卡隆吉、邦博科，伊利奥，蒙博托，冲伯，卡隆吉之流却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尽管如此，政治局在1960年11月3日谈到刚果问题时却仍然说什么是“在1960年6月30日以前就已证明了其有效性的和平道路”。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和平共处”？

同年10月11日，让·布魯姆在《红旗报》上以《诚实和经济扩张》为副标题的一文中说：“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积极分子，为了制订一种健康的政策，必须考虑历史事实及其发展……

“为什么对经济扩张如此关心的比利时资本家们（如果人们认为可相信他们这一点的话）未曾看到，和刚果维持诚实的关系，可以使他们的贸易繁荣，使工厂开工，可以保障成千上万的比利时劳动者和技术人员的前途？”

如果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要求资本家诚实，要求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积极分子，制订一种“健康的政策”，向资本家献策，如何在受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里发财致富，这就意味着
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成为资本主义的谋士了。

在已经提到过的1960年10月13日以《比利时和刚果有同样利益》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让·布鲁姆还说过，

“和平共处是对世界生活和人类发展的现代的观念。”

“寻求和发现一项解决冲突的真正文明的方式，一项既民主又得人心的、为改造社会和世界而斗争的新方法——和平共处，应归功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

同列宁主义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概念相反，让·布鲁姆在这里谈的则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和平共处，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样的和平共处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被压迫人民来说，是进行革命斗争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途径。反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和压迫者合作，是麻醉被压迫者。

采取这种立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谴责革命斗争，说它是“暴力行为”，“不耐性的反应”，“左倾主义”，甚至说是“好战”。

1960年11月3日在《红旗报》发表的《刚果：和平与经济扩张》为题的一篇政治局决议中说：

“如果这种形势延续下去，可能在刚果会出现一些不耐性的反应，一些采取武力的暴力行为以解决一些主要是政治性的问题的、绝望的企图，而这些问题可以并且应该通过政府机构的正常工作和政党之间的明智谈判来解决。”

加丹加的停战

1961年12月12日，共产党议会党团竟至向议会提出一项和极端分子立场一致的，关于加丹加停战问题的提案。中央委员
会的工作报告对此未加评论，而是认为这个提案可能被误解。

难道真的是误解吗？算了吧！

最后，共产党议员们终于对主张干脆停火和谈判，从而对政府表示信任的多数派决议案投了案权票。这次案权的理由是：
“事前，加斯东·穆兰是这样说明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投票理由的：议会对党团不投票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重提谈判和停火的主张，但是也不投票赞成，因为这个提案支持政府政策，而议会党团是批评这个政府的。”（《红旗报》，1961年12月18日）

共产党议会党团最后的投票证实了这个党团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立场，这有“停火”问题上，追随了比利时殖民主义的立场。

帝国主义对刚果的“新政策”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一点也不揭露美国新殖民主义在刚果的公开和无耻的干涉政策。中央委员会也不谴责驻比斯利巴克所执行的比利时垄断资本统治的“新政策”，即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仍不免有重大的矛盾和同殖民统治刚果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工作报告第二章第二节描绘美国在刚果的政策如下：
“华盛顿也知道，它在整个非洲的威信日益下降，它在加丹加分裂问题上非常明显地是个同谋。”

这是错误到极点的观点：实际上，华盛顿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为了加强在刚果的地位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加丹加问题上，遭到了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殖民主义者有时是很猛烈的反击。接着，中央委员会又说：
“阿杜拉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在政治策略上的一种改变，但对于殖民主义世界来说，并不是个胜利。然而垄断资本家们却利用这个政府的财政困难和经济困难，企图把它推向错误的方向。”
 tête de l'opposition, c'est-à-dire de la famille d'Algerie, qui a fait preuve de beaucoup de courage et de détermination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2. 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古巴——中国

阿尔及利亚

政治局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勇敢的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不是大胆地号召群众为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而采取行动，具体地帮助组织这种行动，而是停留在纯粹的精神同情的立场上，即使这种同情，也极少表示过。

1962年2月17日，当法阿谈判接近尾声时，让·布鲁姆在《红旗报》上“发现”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行动目标，
“坚决请求外交部长斯巴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法阿谈判的结果以一项稳定的保证。”

要比利时殖民主义的代表斯巴克干涉阿尔及利亚事务，对这样可笑的建议，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但是，1962年3月26日《红旗报》甚至还这样说过：对于被派去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法国）士兵们说来，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种痛苦的，流血的职责……”

把参加镇压、参加反革命的殖民战争看成是痛苦的和流血的职责，这便是修正主义者的立场。
西班牙

一次巨大規模的罢工，动摇了佛朗哥政权。西欧工人阶级声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行动，本来很可能促使法西斯独裁者垮台的。但是为了缓和西班牙经济瘫痪的紧张情况，曾不断地向佛朗哥的西班牙供应煤，特别是电力。改良主义者阻挠我們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有效地表示同情，虽然是如此巨大的同情。政治局满足于空空洞洞的口头支援保证。

罢工在 4月 23日就开始了，他們却只是在 5月 14日才发表一项决议。

政治局事实上不愿意积极参与大规模的实际支援行动，因为这种支援很可能会“转移”我们如此“重要”的目标，参加订立一个“比利时的良好社会纲领”。

古巴和中国

我們在上一章已清楚指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背离了工人阶级立场，沒有支持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局在中印边境冲突問題上，竟支持对社会主义中国，拥护反动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对苏帝国主义有利的侵略。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骇人听闻的态度是经过长期准备的。

美帝国主义又一次发动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运动。肯尼迪说过，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最最重要问题就是对付“共产党中国政权”。

占整个社会主义陣营三分之二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成为帝国主义及其僕从最恶毒的（不仅是口头上）攻击的目标。

对中国同志卑劣的诬蔑，特别是为让·特尔夫在他的1962
年1月的文章及1962年2月22日所谓政治局的“意见书”中所发挥的谬论，支持了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及其御用报刊所发动的这次反华运动。

资产阶级报刊，包括外国报刊（尤其是《外交世界》和《纽约时报》）兴高采烈地抓住让·特尔夫和政治局的言论来支持他们的反共谬论。

难道这才是我们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吗？
难道这是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路线吗？

这里，让我们向那些不顾这种阴谋而继续像共产党人那样斗争的党组织和同志们致敬。

3.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呢，还是新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殖民主义国家不会把自由恩赐给殖民地人民，也不会自愿放弃被它们剥削的国家。

“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坚信，消灭长期以来状态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人民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摆脱剥削、贫困和饥饿。在解决这一根本的社会问题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现代修正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面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群众这支巨大的革命力量，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

让·特尔夫在他1962年1月的文章里及中央委员会（提纲草案第二条）都谈到了“第三世界”，这样来涵编就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内容以及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系作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

特尔夫说，

“在很遥远的将来，社会主义世界一定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必须给那些为真正独立而斗争的国家，为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新束缚而斗争的国家以它们所要求于它的帮助。为准备胜利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所必需的沉重的负担依然压在社会主义世界头上。只有当它自己能从这些沉重负担下解脱出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世界才能大规模地帮助这些国家。”

中央委员会提纲草案第三条提到新殖民主义时说：“它必然把后者（指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引到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它们一定会迫切地提出政治上、经济上和财政上真正独立的问题。”

特尔夫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概念是附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捣乱立场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早已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价值。修正主义者故意否认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矛盾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但是动摇不定，而且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甚至同帝国主义勾结，与之合谋。

修正主义者企图不承认这一事实，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
該在民族解放運動中起領導作用，以便使運動能進行到底，直至社會主義革命。

特爾夫在1962年1月的一系列公開地、惡意地攻擊中國同志的文章中，對經他歪曲而加以譴責的革命立場的所謂客觀根源，作了如下的“解釋”：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骨干，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發展程度是不一致的。許多地方，工人無產階級迅速壮大了，絕大部分新成員來自農村。他們的階級覺悟歷史不長，往往還不很牢固，他們缺乏革命鬥爭傳統和經驗。

“有些國家，如阿爾巴尼亞、越南、甚至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比起整個人口來仍然是微弱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過程必然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同的傳統和影響，不同的覺悟水平。

“群眾內部存在的這些不同情況必然會對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產生深刻的影响，並反映到共產黨內去。

“因此，這種不同情況可能成為各國共產黨之間觀點分歧的根源。”

特爾夫的思想本身才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階層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這些國家的托拉斯和壟斷資本從殖民主義剝削中獲取鉅額利潤。這就是輕視所謂“不發達的”被压迫民族的、“文明人”（資產階級文明）思想。

他的理論與社會民主黨頭子們的簡單概念是相吻合的。那些頭子們輕視俄國革命，輕視一個農民占壓倒多數的國家內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強調在這種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難道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是歷史不長、不是很牢固的嗎？難道中國工人階級缺乏革命鬥爭的傳統和經驗嗎？難道他們沒
有同农民组成出色而巩固的联盟，并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吗？

谁能无视中国人民悠久的革命传统，无视中国工人运动胜利的丰富的斗争，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斗争？

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列宁曾重申，保卫和发展关于下列问题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世界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的国家里，依靠工人阶级同其他阶层，首先是贫农阶层，结成的联盟，社会主义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即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比起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要少。

在我们的时代，怎么能否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呢？

根据特尔夫和政治局的这些“理论”，从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出发，那么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已处于死胡同中了。

“对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组织起来，以便这些国家的居民能有充分满足他们最起码需要的生活水平”

“由于这些国家无法自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转向国外要求帮助和支援”。（让·特尔夫，1962年1月11日）

让·特尔夫跟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很快地建立起关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的理论，这是一种变相的阶级合作。对他来说，这样简单得多。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这种援助，必须等待普遍裁军。这就和前面研讨过的提纲草案第十八条在政治上、经济上接近了。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个期间，被压迫人民应当耐心地忍受痛苦。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和支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新殖民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反动民族资产阶级及腐朽阶层的帮助下，实际上将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阶段。然后来点安慰
（提纲草案第三条），由于，而且无可争辩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而只有发展，那么终有一天，

“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既然只是殖民剥削形式的改变，为什么称前殖民地附属国？）必定会走到这么一个阶段，那时他们将迫切地提出关于经济上、财政上真正独立的问题”。

你们看，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好心？他们背弃革命斗争，他们向被剥削人民鼓吹忍耐，但是有朝一日被剥削人民总会提出他们的解放“问题”！民族解放运动势不可挡，修正主义者想要阻拦和压制它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修正主义者完全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重要性及革命意义的根本观点。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各个阶段

关于这方面，还必须作些解释。

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的。这一革命的胜利，以及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成立了共产党，这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一阶段的特点。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以及它的附庸，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被击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全世界革命运动的飞跃发展，东欧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

第三阶段的开始大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人类四分之
一获得解放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那时候起，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比原来多三倍的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以更为波澜壮阔的形式发展着。美帝国主义，依靠了其他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帮助，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于 1950 年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占领台湾。这是一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对所有为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侵略。但是由于朝鲜人民，它的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抵抗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美帝国主义终于遭到了失败。

这样为防止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为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为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新的条件。

越南人民击败了法帝国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了决定性作用－－表明了亚非国家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了向帝国主义效劳，加紧了他们的捣乱活动。

他们借口“置身于两个集团之外”，主张建立所谓国际第三力量。实际上，早在 1958 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就已跟希腊和土耳其一起，参加了巴尔干公约。这是一个和美国一手制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有联系的军事政治集团。

他们从美国手里领取了总数达一千五百亿比列时法郎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帝国主义援助铁托决非为了帮助社会
主义

修正主义者利用自称的“社会主义”作为招牌，把国际局势中存在的危险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而是归咎于集团的存在；这就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等量齐观；他们企图起伊波伊等的作用。他们企图转移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的斗争。

他们的作用是依靠各国被压迫国家的反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腐朽各层的支持，帮助帝国主义和平地把殖民主义旧的形式改变成新殖民主义。

他们企图维持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被奴役状态，以便让帝国主义保有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让它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保持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

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已规定的反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会依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上层的势力，来破坏被压迫者的大团结。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

修正主义者的阴谋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帝国主义必将被彻底打倒；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和十亿忍受着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剥削的人民联合起来发动的革命攻势下，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像社会主义阵营十亿人民所已取得的胜利那样，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三、为当前的要求，为民主自由和为有利
于人民群众的改革而进行有效的斗
争，还是长入社会资本主义

1. 反对单一法的斗争和百万人大罢工

紧缩政策

1960年，垄断资本家和他们当时的伊斯更政府在刚果的
行动遭到了某些挫折。

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经济在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露出了
了衰弱的迹象。比利时资本决意执行原来的政策，即，不仅在反
对民族解放运动中，而且也在对付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方面保持
它在刚果的阵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加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金融资本为了保持它的利益，想要劳动者为它的政策付出
更大的代价。

它甘冒较量实力的危险，提出“单一法”案。政府把希望寄
托于工人阶级的分裂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上。它企图利用刚果事
件，但是，沙文主义运动迟迟没有奏效。资产阶级实际上高估了
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劳动者的斗争意志，比利时社会党以为通
过“真理运动”找到了太平门。社会党主要使工人阶级注意议会
的反对和未来的选举结果，它利用人们反对单一法的情绪，进行
一种纯粹的选举活动。

党的政治局在其“和平共处”的错误观点推动下，对资产阶级
的殖民主义刺激运动压力让步了，它低估了劳动者的斗争意志。它看不到这个运动应由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经遭到失败，看不到无产阶级不愿意为了比利时垄断资本的政策而付出代价。

像布鲁姆那样，在《和平共处，反对紧缩计划》的标题下，说什么是（见10月10日《红旗报》，大约在反对单一法的大罢工开始前两个月）。

"在刚果的比利时人的安全和活动是目前的关键问题。" 这是出奇的脱离实际。

这是从维护民主观点的前提出发，而这种民主观点是具体组织斗争反对紧缩政策这一同样具体的威胁所必需的。

百万比利时罢工工人在给紧缩政策的辩护士以严重打击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的大西洋联盟和殖民主义政策以打击，增加它的困难。

劳动者对自己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相对薄弱，同时作了证明。他们的行动对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力量，低估劳动群众的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打开了缺口。

百万人罢工的准备工作

党的领导清醒过来并提出了两条行动建议：
——11月5日举行全国性示威。
——11月8日，即议会开会的一天，为全国抗暴日。
这两条建议虽然有号召斗争之功，但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

11月5日举行全国性示威，这个口号并不附合当时所达到的动员水平，它并没有使得在最有可能迅速发动地方性行动日的地方，——即通过比利时总工会的各地方工会和地方业余工会，为斗争的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因而，这口号显得不结
合实际情况，太难于马上做到；所以，它没有得到响应，实际上也无助于“粉碎工人运动中右派分子的抵抗”。

另一方面，把全国行动日和两会会日（11月8日）联系在一起有坏处：那就是把先进劳动者的活动对准两会的活动，而不是对准具体准备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分子效劳。

列日的先进劳动者们就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在他们的推动下，列日“共同行动委员会”于11月9日决定采取一个具体计划，规定在11月21日举行地方性行动日，并全部停工两小时。继列日“共同行动委员会”会议之后，政治局于11月11日号召把11月21日作为“全国第一个群众性行动日”。

可是，这次纠正是太晚，列日劳动者的行动没有在指定日期，遍及全国其他各地。

中央委员会于11月26日向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局发出呼吁书，其中建议召开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紧急会议以便决定立即向全国发出总罢工预告。宣布：

“在会开始公开讨论灾难性法案的当天，将发动全国总罢工和强大的群众示威。总罢工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该法案被撤回或被否决为止。”

在1960年11月29日《红旗报》上发表的同一呼吁书规定，通过地方性行动日，工厂停工，工人群众集会来准备这一行动。

这项决议非常积极的外表并不能在我们面前掩盖它的弱点。决议谈到发出总罢工的全国性预告和通过地方性行动日，准备总罢工，于是就引起一种想法，即举行地方性行动日必须以预先发出全国性预告为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呼吁书势必成为一个鼓动性文件，而主要的应该是组织这次行动。但是，只有由工人阶级通过地方行
动日的阶段，表示出它的斗争意志，才能冲破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局和全国委员会的右派多数的阻挠。幸而，后来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由比利时总工会许多地方组织参加的12月14日行动日为此后开展行动创造了条件。

党的骨干事实上是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在这个时期里，他们为组织好的地方行动日而斗争，为发动各行业罢工工作准备；而不让地方行动日的筹备工作受到总罢工预告的限制。

公用事业总工会的“市”全国都于12月5日，通过了一个决定，主张在议会开始公开讨论单一法那天，在本部分发动总罢工。这对罢工的发动具有重大意义，自12月20日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罢工核心，例如，安特卫普港即被瘫痪。

12月16日，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多数（其实只是微弱的多数），连反对单一法的全面行动这种想法也拒绝考虑。

12月1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工人会议决定于12月20日开始行动。

罢工

果然，从这一天起，罢工在“市”的范围内和其他范围内有力地展开了，首先是在沙勒尔瓦，安特卫普，列日等。它迅速地扩大到整个瓦隆地区，弗兰德的许多工人区以及布鲁塞尔的许多企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共产党的干部表现出无限忠诚并表明是罢工的先锋战士和组织者。

反动势力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反对罢工。范・罗曼主教谴责了罢工。政府没收了社会党和共产党报纸和传单，它布置镇压部队，对进行斗争的工人实行镇压。

在这次镇压中有四名工人遇害。
好些地方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无论在哪里，罢工委员会，都在扩大和巩固行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惜这种委员会不够多，而且往往不能发展成地区性联合委员会。因此，没有代表全体罢工工人的机构，来进行全国性的协调工作。

比利时全国总工会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发布过总罢工的口号。哪里是右派领导人统治的地方，哪里就宣布取消比利时总工会地方工会的资格，以便阻碍各行各业联合罢工。在1月的最初几天，尽管政府为了阴谋拖垮运动，已中断了在议会的讨论，但仍然有一百万劳动者罢了工。

对罢工工人的压力愈来愈加强，特别是在反对罢工的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力量较强大的地区。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开始散布涣散人心的所谓强大部门和弱小部门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主要是让“强”的部门，即码头工人、矿工和冶金工人，从地理上分，则是列日、沙勒尔瓦，安特卫普等坚持下去，其他部分，尤其是布鲁塞尔在罢工中的作用是不重要的。

于是，即使工会组织已决定罢工，一些工会领导人仍单独地成群地去瓦解某些部门的罢工工人的斗志，分裂罢工，试图剥夺罢工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从而实际上孤立“强”的部门。

这种“分阶段”投降的阴谋愈益发展。1961年1月9日夜间到10日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教育”部门执行局的一次所谓会议上，在继续积极进行罢工的地区好几个成员缺席情况下，决定向穆洛大臣的所谓征调令屈服，并下令政府教育工作人员复工。

1960年1月10日，布鲁塞尔铁路工人地方工会，在一次突然召开的、参加人数极有限的会议上，右派分子策动于翌日复

(1) 献为1961年。一编者
工。从此以后，罢工工人的团结迅速瓦解。同一天（10日），范·
阿克尔搞了一次可耻的背叛阴谋，他宣称：
“对于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治安，这一点，我是非常理
解的，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我们了解国家的财政情况。政
府得找出一个解决办法。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任何政府都
会遇到的。”
比利时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深。
瓦隆地区社会党某些人士提出成立联合组织的要求。要求
本身是对的，但是在混乱中，这就显得像给罢工以另一个目标，
而不是为了反对单一法。
有些工人就因此迷失了方向，比利时总工会的右派分子的
分裂阴谋，特别是在弗兰德地区和在布鲁塞尔也因而得到方便。
1月15日，比利时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的领导向国王递交了一
份“备忘录”。这备忘录同意对单一法进行修改，同意增加间接
税，即商品流通税共六十五亿法郎，为期一年（但这项增税规
定至今还在执行）。
这份备忘录提到一个税收改革法，提到把单一法的其他条
款交给各个委员会研究，还提到其他的所谓“改革”的建议，这
样的改革在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的政纲中，也可以或多或少
地找到。
尽管有这些阴谋和叛变，瓦隆各大工业区还坚持斗争到
1月23日。

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的错误

在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犯了某些错误。
正当百万工人罢工的时候，“特别强调组成代表团去意见
员”，这并不是足以使斗争达到更高水平的口号。在这次罢工的
情况下，派遣代表团去见议员，可以作为一种次要的行动方式来考虑，而“集中于一天内派遣代表团对议会施加压力”，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冒险主义的口号。事实上，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代表团向议会“进军”，让代表团面对集中于“中立区”的警报，和冒一切可能因而造成的挑衅的危险。

对于当时应该组织、扩大和推进到更坚决形式上的群众运动来说，这完全不是一种严肃的和对运动负责的态度。

此外，意味深长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对罢工的困难时期进行分析时，不是强调右派分子出卖罢工的企图，而是强调所谓“极左的”倾向，说什么“这种倾向使敌人有机会喘息，和重新恢复他们对某些阶层的罢工者和对中等阶级的影响”。那么，谁是极左倾向的代表呢？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主要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不顾党的多次警告，而仍拥护向布鲁塞尔进军这种想法的信徒们”

还有那些“大肆否认工具的列日工会分子”，这个建议是“在圣保罗广场集会的四万名列日工人所一致通过的”

对于许多社会党左派工人寻求新的行动方式以迫使政府让步的做法，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

在一定时期，适宜采取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那就必须能够提出其他能够团结斗争中的工人，加强运动的建议，并清楚地表达出来。

如果没有政治局的错误，党本来能更有效地起到它的先锋队作用。从地方上来说和从全国来说，并不是没有行动的可能性，以便进一步发展罢工运动，把它提到更高水平。应该对来自群众战斗力的创造性意见，给以更多的注意，而不应不分是非就予以否定。

应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以便严肃地研究各种斗争方法和
研究怎样实行这些方法，或者摒弃那些失败主义的，绝望的或挑衅性的解决办法。

应在这基础上安排发展斗争和增加更大压力的各个阶段。

党的领导人批“极左”口号时，却不是那样。这些批“极左”口号时，却不是那样。这些批评，实际上，如拿来同下面的讲话对照一下，那就更加清楚了。

《同多数派代表的交涉和谈判》。《同多数派代表的交涉和谈判》。（1961年1月8日雷纳·贝

利在列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在这情况下，这种“批评”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它构成一种完全是消极的，右倾的和分裂的态度。

从1月5日起，政治局的两个委员认为政治局的庇护下，就在布鲁塞尔，借口罢工工人在某些企业和公用事业中只占少数，劝告同志的“团结”，不要“硬充英雄好汉”；不要“当小喽啰”；不要“自寻烦恼”（？）。他们就这样在某些部门（其中有社会保险全国局、比利时航空公司、政府各部、邮政部门）的同志中制造了怀疑和混乱，并按照右派分子的压力行事。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是一个一贯的政治观点所造成的后果。这可以从政治局反对1961年12月1、2、3日布鲁塞尔地区党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第二节内下列一段得到证实：

“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一贯立场是勉励共产党员要当工会的模范骨干，要站在战斗的前列，来执行工会的行动决议。这种立场是有效的。

“地区委员会的一贯立场是着重指出，罢工者，即便居于少数，他们的团结一致对全国性罢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领导机构在需要的时候每天都同表现得犹豫不决的同志进行讨论，这些同志害怕孤立，既看不到全国总的斗争，也忘了自己工会组织的口号。”

概括来说，如果人们研究党在百万人大罢工的准备，发动和
开展过程中的行动特点，那么，可以得出下列几点：

——党的骨干无限忠诚。政治局一方面合理地提出了总罢工的正确口号，这是符合当时工人斗争的需要和可能的，但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有时是轻率的，甚至是冒险主义的口号，有时又是明显地落后于运动需要，妨碍和分裂运动的口号。

——罢工发动起来后，政治局没有起到它作为先锋党的领导机构的作用，而鉴于比利时总工会领导的态度，实际上，展开全国规模的行动的全部责任落到了党的身上。

——政治局的某些委员在实践中采取了明显的机会主义态度。

——多数地区领导机构都同罢工运动密切联系，一般地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治局的失职。

* * *

罢工的后果，选举

大罢工未能阻止通过“单一法”。工人仍复工了，但是他们并有没有丧失斗志，相反地，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天主教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破坏罢工者的面貌暴露了，这就使许许多多天主教劳动者的觉悟起来；这种觉悟后来在他们要求同比利时总工会劳动者统一行动的意志中表现出来。沃冷罢工和公用事业两个工会组织的斗争协议就是例证。

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和总工会右派的面目同样暴露了，广大阶层的社会主义工人抛弃了改良主义；这种觉悟甚至对总工会国家一级的某些干部的态度都产生了好的影响。他们对于反对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行动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和比较言行一致的立场。
这全部事实促成了瓦隆人民运动的成立和巩固。壟断资本遭到了狠狠的打击。因而产生了“新政策”，这种政策一面保持壟断集团的基本目标，同时被迫注意到在劳动群众中表现出来的更强的战斗性。

议会解散了，并进行了立法选举和地方选举。

工作报告对8月28日投票结果的分析相当深刻。同样地对国内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百万工人罢工也含糊其词。

党是带着一个正确的纲领去参加竞选的。这就是“十一——二十——五十”个十亿法郎的纲领，
——节约军费十个十亿法郎，
——征收大资本利润二十个十亿法郎，
——由银行提供五十个十亿法郎。
可是工作报告也未提及，为什么？
是否因为这个竞选纲领符合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扣压起来呢？

让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1961年9月26日的投票结果。

天主教社会党，即伊斯更新的党，它是无耻地投靠托拉斯政策的代表，这个党，到处后退，失掉了1958年所得选票的11%左右。

自由党退步不前，比1958年才多了七千票，它大开空头支票，但实际上并未招徕新的选民。

其他各极右派候选人名单，这些“小”名单多得了十一万八千票。工人运动领导的弱点，使得极右派政党能够蒙骗一部分对伊斯更新政策极为不满的中等阶层分子。

然而这种现象是相当有限的。资产阶级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训：自由党后来就改变成一个新党——进步自由党，它没有边
际空虚谎言的纲领比天主教社会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党搜集各方面的极右派分子。

它眼前的政治目标是清楚的：鼓动极右派这个投机手段、来为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领导人的投降行为提供“借口”。更长远的是打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基础，以备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班子“过时”后之需。

天主教弗来米人民联盟由1968年的十万零五千票上升到1961年的十八万两千票左右。这个现象可以同上面所分析的现象相比。为了这次选举，天主教弗来米人民联盟的右派和极右派领导人巧妙地把弗来米全国联盟的遗产置于第二位，而笼络人心地提出表面上反对资本主义的要求。

社会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数比1968年增加大约四万二千票，这是由于天主教社会党在1958年的选民抛弃这个党而投了“左派”的票。

这表明，由于反对垄断资本的行动，把天主教工人从反动势力掌握中争取过来的道路是打开了。

比利时社会党一共丢失约二万票，在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最为明显的地方，如艾诺，布鲁日（有范·阿克尔）、布鲁塞尔（有斯巴克）等，选民损失得特别严重。

我们党几乎在它参加竞选的所有地区，都取得了进展。比1958年多得六万两千票以上。在我们1958年参加选举的全部选区中，进展达31%左右。然而这个进展在各个区域是很不平均的。如果在蒙斯、安韦尔、沙勒尔瓦、都因、奈佛耳等选区，这个进展超过总进展的平均数的话，那么另方面，在惠伊一伐雷姆选区的进展是微不足道的（1%），在土尔内一阿特才10%，列日选区是17%。

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认真分析这些结果，以便判断党的政策
的效果。

诚然，同以往的选举相比，党取得了进展（自1945年来这是第一次），这一点值得特别指出来。

但是，在估计这些成果时，放任任何批判的立场，那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党通过刚刚展开的斗争是应该赢得选票的。但让我们进行一些比较吧。无须说，情况不是绝对相同的，但有某种程度之处。

党从1932年到1936年的选举期间多得了116%的选票（从2.81%到6.08%）。

还有一个也许更有意义的例子：党在1932年竞选中比1929年增加了45%的选票，这基本上是通过它在一次罢工中的行动而取得的。但是那次大罢工的规模和意义都比1960—1961年罢工要小得多。

事实上，尽管党的骨干在罢工里忠心耿耿，但是党却为领导机构在前几年和在这次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后果付出了代价。

列日工业区选举结果特别差（17%），也从这一事实得到明确的说明。

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

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采取“新政策”，但是根本内容不变。外交政策方面，依靠北大西洋集团的老政策增加了一点比那位维尼的盛气凌人扣人心弦的话。

德国的军事基地正在比利时建立起来。用原子武器装备比利时军队问题事实上也已决定了。

政府对刚果的政策确实有某些改变，但这个政策决不是尊重刚果真正独立的。它只是承认美国新殖民主义者渗入刚果的事实，承认必须同美国帝国主义共同剥削刚果的事实。

在内政方面，许多罢工者被关进监狱，而杀害罢工者的凶手却逍遥法外。

政府事实上企图把“单一法”“分段”零活出去。本应在一年期满后就废除的增加商品流通税的规定仍一直有效。所谓“税收改革”却在巩固着反动的税收制度。国家的绝大部分税收压在劳动群众肩上。

纪耳松、维尔梅伦大臣，提出了一套所谓“维持治安法”草案，极其严重地侵犯了罢工权利。所谓结构“改革”（煤炭领导机构和国家投资公司）加强着国家资本主义，而唯一地有利于托拉斯和垄断资本。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个坏政府的态度有利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布鲁姆在1962年5月26日的《红旗报》中说，“勒菲弗尔－斯巴克的妥协并未使右派满意。后者梦想的是另一回事”。

雷纳·贝伦在1962年9月1日断言：“大资产阶级摆脱不了那些使它感到碍事的大臣们，尽管这些大臣的政策不得人心。”

伯内尔1962年10月底在《争取对政府纲领进行民主修改》的题目下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也是从同样的思想出发的。此外，伯内尔强调的这个所谓民主修改，其内容之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听命于垄断资本，它的坏政策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这个坏政策的斗争如果局限子“不得使政府垮台”的范围内，那么，人们怎样能为反对这个坏政策而斗争呢。至于说如果政府倒台
就会使更右的政府上台。这种虚假的论据，正是历来改良主义者所持的论据。

问题不在于要提出“要政府垮台”的斗争口号。但是要反对政府的坏计划，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就需要谴责勒菲弗尔－斯巴克班子的活动和纲领。如果斗争加深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它的政治人物，那么我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遗憾。如果政府因劳动人民的更大规模、更坚决的斗争而垮台，那么，就会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去阻止成立一个可能更反动的政府、和促使劳动人民的正义要求得到满足。

政治局的立场只能制造对目前政府的幻想，只能掩盖对其本质的揭露和阻碍群众的行动。

但我们也注意到机会主义者的作法并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的。伯内尔在1962年9月5日突然揭发斯巴克，纪耳松，范登－鲍埃南，范·奥登诺夫为“极端分子”，把他们说成是一丘之貉。……

2. 关于工厂的、职业的、职业间的纲领

百万人大罢工将各行各业工人、公用事业职工等广大群众团结在共同的斗争中。百万人大罢工使所有靠工资生活者，在阶级敌人面前，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对团结一致的认识。

从此，在各业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继续团结全体工人阶级的可能性增强了。

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工厂的纲领，忽视各个行业的或各部门的要求。这些要求仍具有其重要性；特别是在须要为团结一
致行动打下初步基础的时期。例如，紧接在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成立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各行业间的共同要求不应成为一种借口来妨碍这个或那个工厂，这个或那个行业在行动的可能性已成熟的时候发动斗争。

但是为实现个行业间的共同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是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它为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为更进一步的团结一致，更强大的力量，更高的觉悟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要求权利纲领本身的价值，取决于为实现纲领而采取的行动方法是否有效。

大罢工以来，曾屡次有必要提出各行业间的共同要求。这种必要主要反映在总会公一主教工会联合会关于税收改革的备忘录中，反映在反对反罢工法的斗争中。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工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大罢工翌日友方破坏工会自由的企图的失败（例如沙勒尔瓦的铁路工人和沙勒尔瓦电机制造厂）；1961 年底公用事业工人和 1962 年矿工的斗争的胜利；在对于的出色的、情绪高涨的罢工（在这次罢工中起耳聋的暴力是相当突出的）以及最近正在发展的冶金工人的斗争；这些都是这种斗争性的明证。

3. 行动和谈判

工人要求权利的斗争和所有的斗争一样，也提出了目标的问题，采用什么行动方法的问题，群众斗志和动员程度的问题，他们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声援和支持的问题。

谈判只能是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斗争实际准备工作所造成的压力的结果。
在1961年中，党为工人提出了私营企业工人的和公有事业工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能构成各行业间的总纲领。召开一个包括公私企业工人代表，资方代表及政府代表的全国劳工会会议的想法被提出来了。当时这个建议可能有如下意义：所有有关的劳动者在行动中团结一致，应当能迫使资方和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和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明确的诺言。

但是只有行动才有希望召开这样一个全国劳工会会议，并使会议获得积极成果。

然而在践踏当中政治局却企图拿全国劳工会会议本身来代替斗争手段。

让・布鲁姆在1961年11月27日《红旗报》题为《年终限期》一文中最清楚不过地表示了这种想法。下面是主要的摘录：

“事实上很明显，我们关心的任何一个迫切问题除了尽可能平心静气的谈判外，是不能得到合理解决的……”

“所有这些题目太复杂了，纯粹的劳资冲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再谈反动派也正因此才希望劳资冲突。”

这是把“和平共处”用到一个资本义国家内敌对阶级间的关系上。这是把谈判与斗争对立起来，把谈判当作行动的最高形式。

在劳资经常的冲突中，不应当宣扬这种一种谈判的意义。谈判和“妥协”的情况一样，妥协可以是胜利或失败，可以是有利或不利的，也可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也可以是屈服和叛变。

谈判取决于现有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意志和取决于斗争本身。谈判的结果也取决于劳动者的代表们的态度，要看这些代表是否坚决依靠群众斗争，是否号召加强斗争，还是主张弃扬阶级合作的思想，惧怕或要求斗争（即“纯粹的劳资冲突”）。

宣言“我们关心的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劳动者的要求），除
了尽可能平心静气的谈判外，是不能得到合适解决的”，这正是采用最宽泛的改良主义的语言。

正当1961年11月底行动的进展表明公用事业总工会特别是铁路工人要求他们提出要求六万两千四百法郎和取消第五条规定的斗争的情绪正处于“高峰”的时候，政治局还继续提出召开全国工会议讨论公私企业工人的全部要求的口号。在这个行动的新阶段，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右倾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公用事业人员原应根据私营企业工人的斗争是否成熟，来决定自己的斗争。幸而政治局的口号对公用事业同志的斗志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总的看来，对这个部门的劳动者的斗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众所周知，他们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成为私营企业工人斗争的榜样和鼓舞。

4. 税收改革

这个问题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实行的税收制度特别有利于收入多的人而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身上。间接税的部分是相当可观的，而且由于税收额“不根据指数折算”，劳动人民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而付出越来越多的税。

每次因指数上升而按规定增加的工资，按理应恢复购买力。可是每次这种按规定增加的工资却被国家增加五亿多法郎的税收。这样，购买力非但未恢复（且不谈生活费用指数的作用是大致问题的），实际上反而遭到损害。例如最近按指数规定提高的工资平均征税15%。工薪和薪金总额在1939年到1961年之间增加五六倍，而由劳动人民负担的从收入中直接扣除的捐赠总额却平均增加二十六倍。另一方面，大有产者的偷税漏税估计每年约一百五十亿法郎。
党本应在政府声明一宣布就以一个具体的税收改革草案为中心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该草案主要应具体规定减少间接受税多少，规定以万五千法郎为免税基数，制定税收的指数，不恢复夫妇双份收入的家庭所得税，可是党的领导完全不是这样做。当政府提出大体上制定一个不利于劳动人民的税收制度的坏草案时，党的领导却确定了下面的目标：收入不超过十五万法郎的家庭所得税不增加，或收入不超过二十五万法郎的家庭的所得税不增加两种说法（1962年2月24日《红旗报》）。这样一个目标丝毫不能动员劳动者，也不能使税收法得到有利于靠工资为生的职工的真正改革。

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在1961年采取的一个立场，尽管很不够，但它规定惩治大有产者偷税漏税，规定税率按生活指数递减，以5％为一级，对低于十五万法郎的收入实行递减税，低于九万法郎的收入要减得更多。

怎么来评价，怎么来形容党的领导在这方面的态度呢？只能是这样，即它急于通过“尽可能平心静气的谈判”寻求一个资产阶级能接受的虚假要求，以便能够在这个美满的成就上高唱胜利，高呼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因为“力量的新对比”和政治局“思想家”的“革新”。

只有在工会组织开始动起，社会党左派对劳动者发出了警告的时候，党才有所转变。但要使群众的行动具有足够力量地展开起来则已经太迟，太迟了。

而迄今我们在提纲草案（第三十八条）里仍看不到以我们上面重新提到的，已经深入人心的口号为基础的明确的“税收改革”纲领。它只是泛泛地提出：“减少低收入者的直接税，减少加于日常消费品的捐税。”
5. 社会纲领

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就资方对制定纲领的态度，给我们作了一个颇为自相矛盾的叙述。工作报告（第三部分，第二项）中说：

“然而资方终于能避开1962年的三方面制定纲领的全面计划。”

另一方面，提纲草案第三十一条说：

“垄断资本被迫应付工人们要求权利和要求改革结构的压力，于是尽力要制定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纲领，以阻碍群众民主活动的发展……”

但是提纲草案第三十一条认为需要在上述一句的后面加上这句话：

“和对制定民主的经济纲领的期望进行诋毁，而这种经济纲领是能够促使制定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纲领的。”

另一方面，雷纳·贝伦在1962年6月23日对记者谈话中却不愿把“订立经济纲领”作为“订立社会纲领”的条件。

这些都是不一致的。

党的骨干在读到工作报告（第三部分，第二项）中以下一句时，也会非常惊讶：

“1962年底，为争取制定一个良好的各行各业共同的纲领的斗争正在进行中！”

实际上，1962年底，社会党工人，社会党左派骨干，瓦隆人民运动的骨干，冶金工会等已抛弃了为制定社会纲领进行谈判的想法。

雷纳·贝伦和政治局没有看到或不预看到工人阶级所表示
的正当的怀疑，工人阶级不情愿像过去一样，受有价的协议所骗。雷纳・贝伦把“制訂社会和经济纲领”跟“计划化”混淆起来。

在資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会有完整的计划化，除非是在考茨基想像中的那种超帝国主义下。

幸而这种世界的、唯一的国家資本主义托拉斯，这种骇人听闻的烏托邦，这“铁蹄”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然而，提纲草案第三十条丙项却提出了烏托邦的而且确实是改良主义的目标，这就是：

“每年按现代技术水平，制订一个经济计划。这计划应保证劳动者和他們的家庭从国民收入中得到日益增張的一份。”

对雷納・貝倫来说，“制訂綱領”就是“制訂计划”，而且：

“資本家自己也愈来愈坚决地谈论制訂綱領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已經取得成就的反映。这也是全世界和我国工人运动高涨的结果。”（雷納・貝倫，見1962年6月23日《红旗报》）

让・布魯姆也說：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許多反共分子）都在不自觉地搞共产主义!”（見1963年2月11日《红旗报》）

这种“反映”和“结果”是同“促使”法国資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称呼他們的党为“激进社会党”，以及甚至“促使”希特勒称呼他的党为“国家社会党”的那种“反映”和“结果”相类似的。

雷納・貝倫认为：

“如果说，老板們現在只好同意制訂某种社会‘綱領’的话，他們背地里却打算尽可能少丢掉一些，打算限制社会进步，把这些进步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

“在劳动者看来則相反，制訂綱領應該有利于社会进步，保证他們的生活条件随著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日益增长而不断得到改善。”

80
如果說，雷納·貝倫认为，老板們把社会进步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内，我們則认为，雷納·貝倫把他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把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对立和阶级斗争，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

雷納·貝倫所介紹的就是“社会資本主义”的概念，照他看来，这种資本主义，通过某种組織工作，通过某种網領的訂立，似乎就能保证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照他看来，“老板們”的作用简单地就是“阻碍”社会进步，并把这种社会进步“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而劳动者的作用则是“促进”社会进步。

实际上就是这样，資本主义制度的法則完全不能容許社会进步，而是恰恰相反，它是走向社会退化的。

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够阻碍并限制这法則的作用，甚至从資本方面取得部分的改善。

老板們的作法，例如談論訂立網領問題，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少丢掉些”和“把社会进步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也是为了在他們可能的时候，根据情况，也就是说，根据工人們表現的战斗性的強弱，設法什么也不丢掉，甚至还要收回来。

设想实现階級間的和谐，這是階級合作論者的梦想，事实上是不可能把資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階級間的关系，予以计划化或“網領化”的。現在冶金工人的斗争戳穿了資方的“網領化”阴谋，从而又一次明表了这一点。

“制訂社会網領”并不是工人阶级在它反对資本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什么“新”手段。这仅仅是垄断資本家用来迷惑工人阶级的招子之一，目的是使工人阶级把争取权利的斗争置于資本主义经济动 изменения的影响下，和宣扬階级合作思想。

垄断資本家企图得到的不仅是眼前的最高利潤，而且是长
的和比较长远的最高利润。在这方面，社会和平是垄断资本家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付出一点代价来权买。

垄断资本家所要的，是要工人阶级出卖它争取切身利益的权利，以换取至多是一盘삼두汤。可能的话，则仅是几句甜言蜜语。

工人们从自身经验中认识到，只有靠他们的斗争才能改善他们出售劳动力的条件，就是说才能防止降低他们的地位和改善生活条件。“很狭窄的范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出自老板们的意志。

这样一种战斗立场并不等于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对待谈判漠不关心。如果这种谈判是在“訂纲领”的招牌下进行的，那么工人应该揭穿一切骗局，进行干涉，提出自己的切身利益，提出自身权利的纲领，并确定为达到目的而需采取的斗争手段。

因此，谈判的名目不应该影响工人们的行动部署，不管这个名目是“制訂社会纲领”、“全国劳工会議”还是“对等協議”。决定性的因素总是行动，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合作）。

6. 把工资同生产和利润联系起来吗?

先进劳动者反对提纲草案第三十八条乙项所阐明的观点。这一项谈到“把工资同生产和利润联系起来的工资協議”，它把“定期調整”工资協議作为各个行业争取权利斗争的目标。（黑体是作者标明的）

把工资同生产和利润联系起来的工资協議，即便定期调整，也不过是把工资的水平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及其动荡变迁的需要联系起来，而不是同争取权利斗争的需要联系起来。这是
对劳资关系的一种改良主义观点，甚至是（雇佣关系上的）温情主义观点。

7. 反罢工法案

从1962年春天以来，政府准备反对罢工法案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先进党的责任是立即有力地促使劳动者警惕这一危险。但是政治局在很长时间内对这问题保持沉默。在上面提到的1962年6月28日鲁纳·贝勒向记者的谈话中，连一点暗示也没有。直至9月1日那一天，正是杞耳松—维尔梅伦草案提出的那一日，贝勒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自称要描绘出一直到1962年年底的政治远景，但对这个问题仍保持沉默。

但是反对这些反罢工法案的抗议浪潮在扩大。在1963年1月25日《红旗报》上，伯内尔是怎样提这个问题的呢？光是标题就很有意思：《争取工资的斗争和捣乱阴谋》。

伯内尔一面承认：

“反抗反对罢工法案的斗争确实开始了。”“不应该允许把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和为镇压反罢工法案的斗争对立起来。”

接着又说：

“为制定1963年的社会纲领而斗争”（?）。

同时他又说，提出“维持治安”法案是“旨在对工人草拟一个新的要求工作进行捣乱的阴谋计划之一”。这就使标题的意思明白了。如果反罢工草案是一种破坏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捣乱阴谋”的话，那么只有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才是唯一有效的斗争。

这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吗？是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在云雾、混乱中，在自相矛盾而最后是涣散人心的言论中游来游
去。
提纲草案把資本主义国家的狀況，尤其是我国的状况描写得安宁幸福，对反罢工法案只用四个字提了一下，并且忘记把反对这法案的斗争规定为任务。保卫罢工权利的斗争应该是工人阶级首先关心的事。

8. 争取改革的斗争——有各式各样的改革

我們将在后面第四部分来研究争取改革的斗争在工人及資本的总行动中的意义問題，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区别所在。这里，我們仅研究一下争取某些改革的斗争的当前具体情况。

共产党人主张进行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改革。

共产党人谴责資本家所期望进行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他們得以增强資本的权力与力量，进一步损害劳动人民来增加他们的利润。

1935年創立的“銀行委員会”；战后，斯巴克一伊斯更斯政府任内，国立银行章程的修改和国家工业借贷公司的成立；勒菲弗尔一斯巴克政府任内，钢铁经理处与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有利于資本的典型的改革实例。

我們主张劳动人民通过自己反資本的斗争而赢得的改革。

我們主张实行確保免费医疗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保险。我們主张設有全国卫生部门。

我們主张贯彻“同工同酬”原則，并以法律保证。

我們主张实行四十小时工作制。

我們主张进行稅收改革，减轻劳动人民的捐税负担，打击巨
額收入者。

我們主張進行真正的教育民主改革，有效地保證勞動人民的子弟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

在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斗争情況下，在揭發修正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局勢中，特別應該注意正確地估計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國有化。

修正主義者掩蓋或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即政權問題。

他們把資產階級的國有化和加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改革。

當中央委員會在黨章第二條的新條文中說：

“一系列結構改革的實現……將标志着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途徑中的一些階段”時，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修正主義的觀念。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難道是：

“工人運動的力量日益壯大”（提綱草案第三條）的結果嗎？難道是：

“社會主義制度鮮明的優越性”（提綱草案第六十四條）的結果嗎？

不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本质上來自法律、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这里面既沒有壟斷資本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也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為社會主義本社會。這裡只有壟斷資本家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只有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合併成為統一的加強剝削和壓迫的機構。

在世界上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义已经存在和成长。

真实的情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

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深刻化的确加快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特有的趋向。

劳动群众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剧。

这些矛盾的加剧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以便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润。”

这是1960年八十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中所说的。

社会主义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权创造出来的，它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国有化实现“对剥削者的剥削”，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生产资料变成全民所有。

国有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完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国有化终归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主义，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
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1935年，雅克莫特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深信比利时的经验将会向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表明，社会民主派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只能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进一步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比利时目前正在经历一种管制经济的经验。其初步结果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第十三次全会上所说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管制经济’只能加强金融资本，加强它的统治，并为法西斯主义准备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在国有化的形式下，证实了列宁主义的估计。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的例子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国有化的作用和意义。

同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非但不能减轻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只能加剧它的矛盾。

列宁也曾经指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它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换句话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更

---

(1)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7页。——译者

(2)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9页。——译者

87
加有利的客观条件。它一点也不标志着“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这是向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草案”中所用的词句。

列宁曾经严正地揭穿了这个骗局。他说：

“目前最普通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

列宁就“计划化”问题继续说：

“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主义国 家预先考虑到本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

这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给我们用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决不是用来否定这个必要性，或者用来像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竭力吹嘘什么资本主义的进步。

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企图混淆资产阶级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时候，妄想使群众接受资产阶级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企图遮蔽社会主义国有化，从而遮蔽社会主义本身。

我们可以仿照列宁的话来说，在比利时那样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生产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9页。——译者
② 同上书，第430页。——译者
资料的（社会主义）国有化。

至于把“结构改革”，也就是例如把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有化，说成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一个阶段”（党章草案第一条），那就是欺骗劳动人民，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指示之一，就是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且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性的第一件事。

因此，共产党人必需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说明资产阶级国有化的真正含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忽略保卫劳动群众当前利益的必要性，正如他们必须经常展开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来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尤其应该宣扬和保卫必要的措施，来尽可能维护国营企业中劳动者的条件，他们的自由权利，他的工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劳动人民作为消费者的种种利益。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重新拾起了改良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这种理论认为：

“一系列结构改革的实现将构成民主的扩大，将标志着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党章第一条的修改意见）

这是以改革来代替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因此，对政治局来说，改革就是党在我们时代、国内问题上的一切行动的目的。起草草案不着边际，而且对于应该具有实际具体内容的这种或那种改革，这种或那种国有化完全起着消极作用。

中央委员会曾在1961年12月16和17日召开一次党的全
国会议。議題是: 《让我们在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中树立几根标竿吧！》

然而，我们在这些“伟大的新思想”中，在这些小阶段中看到些什么颜色呢？

——“情报权”，并以“确实的企业检查员组织”（不过需根据法律规定！）为小阶段。

——“公布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营业成本和物资的买价”；

——“控股公司、银行及大的有限公司等须按各该单位的有价证券、储备或存款的百分之十的比例强制购买国家投资公司的股票”；

——“制定外国资本在比利时经营企业的保护（？）条款”；

——“限制自供资金”；

——“使设在瓦隆区的企业把一部分储备用于弗兰德区的投资上”。

这就是大部分“杰出的”“新思想”的例证。

这就再一次表明了修正主义者的空洞无物，空洞无物。谁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谁就终归要放弃进行真正实际的争取切身权利和争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改革的斗争，成为“资本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第三节第四点提到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往往把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和寻求结构改革的道路单纯寄托在议会的发起倡议上”。

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对这个“弱点”表示惊讶，而应该从这里面得出唯一有价值的结论。政治局和1961年全国会议的所谓“结构改革”完全起不着党的群众和积极分子的兴趣。这种现代修正主义实在太幼稚，决不能使劳动者脱离他们实现真正阶级要
求的斗争。

现在来阐明一下修正主义的一种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需要划分为若干阶段。例如，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与宣传密切相关的，然后进入鼓动，进而为了成为行动的动力，需要组织、发动，发展并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更高的水平，然后转入实现新的目标。

一定的行动口号，既可以符合仍然属于宣传鼓动范围的目标的部分实现，也可以为达到新的发展而创造更好的条件。

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应该考虑到斗争的防御方面与进攻方面，它应该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它应该是运动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辩证的。

确定阶段与进行妥协都是这样的。一个既定目标本身并不因为它被称作“阶段”就是好东西，正如妥协本身并不因为它被称作“明智的妥协”就是好东西。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定“阶段”，树立“标竿”，提出“分期解决方案”（提纲草案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七条）和“试探办法”（提纲草案第四十五条）都不是总斗争的一个“片刻”，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用这些东西代替了斗争的目的。因此，这些阶段与小阶段就成了实现真正目标的障碍，束缚着行动，而最终将转移开争取有效目标的行动。

我们在前面已举出了几个例证（如放权缩减一百亿军费的口号，主张税收改革，制定社会保障等）。

修正主义者厌恶斗争。修正主义者以确定阶段和推出试探办法为借口，掩盖了真正的奋斗目标，代之以“迁就性”的、完全能为阶级敌人所接受的“改良”。在有利于敌人的情况下达成的“妥协”，竟被称作劳动人民由于修正主义的“现实”政策而获得
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改良主义者惯用的欺骗手法，政治局现在也经常加以使用了。

9. 联邦制

我们党在上次大战很久以前，就曾主张实行联邦制。十多年以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显然是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也罢，右倾机会主义也罢）的决议，改变了这个立场。短时期的和特殊的情况被他们用来当做抛弃正确立场和目标的辩解。

直到1961年瓦隆区掀起强大的运动，并在纲领中明确要求实行联邦制，中央委员会才重新赞成这个民主要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联邦制的原则立场，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列宁对待争取民主斗争的立场。（详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

“正像不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财政资本的统治，也和一般资本的统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民族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财政资本的这种统治，丝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任何一种政治民主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实现’的一切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对资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关系和基本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1)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8—139页。——译者
“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打乱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狭隘的民主目的。”

列宁在讲过这段话以后，强调指出：

“必须为争取这一要求（民族自决权）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我们认为，要想有效地进行反对垄断资本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的斗争，尤其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实行联邦制则有助于瓦隆，弗兰德和布鲁塞尔的劳动人民的团结。

实现联邦制，可以为劳动人民开展经济与政治的权利要求的斗争创造更好的条件。

实现联邦制，就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两个民族和三个“共同体”（弗兰德，瓦隆和布鲁塞尔），这正是比利时资产阶级的“统一国家”所力图否认的事实。

我们所主张的联邦制，虽规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享有最大限度的“自决权”，但它本身并不消灭，也无法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国家。持有相反的说法则是散布幻想。但是这种联邦制却动摇着百年来资产阶级旧秩序的结构。

它不仅可以把广大的工人群众，而且可以把其他劳动阶层的广大群众卷进政治斗争中来。尽管其中有些阶层对此运动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偏见，但客观上，这个斗争在打击着资本，打击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编者

② 同上书，第150页。——编者
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及有觉悟的先锋队应该团结起来，并将这一庞大的联盟引导到更坚决地进行反垄断资本、反垄断资本的国家的斗争。

* * *

政治局对联邦制的态度的特点是混淆不清。1961年初，让·特尔夫在关于瓦隆人民运动的短文中说道，

“我国有两个种族和文化各异的地区，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和愿望，经济发展也不相同。这有利于进行掩盖阶级对立的系统分裂政策。”

“种族”观念与我们应当对局势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让·特尔夫指出了文化不同（当然如此）和经济发展各异，却未对两个民族、三个“共同体”的各自特点和切身要求作出任何分析，因此在他的短文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却是瓦隆区期望实现联邦制的基础之一——即瓦隆区和弗兰德区具有不同的政治特点：瓦隆区大多数人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尽管其中大部分人至今还未摆脱改良主义的幻想）；弗兰德区却有一大部分人受着天主教政党（今为天主教社会党）和宗教的影响，这种情况已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只要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无视这些特点，或者对于这些差异、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愿望（包括具有民族性的愿望）采取轻视的态度，那么，它就会“有利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掩盖阶级对立的系统分裂政策”。

让·特尔夫所谈的这种“系统分裂政策”，并不是注定由客观形势造成它一帆风顺的，这一政策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有觉悟的先锋队对此问题采取的态度。

让·特尔夫和政治局重犯了社会民主党在对待正当的民族
（或具有民族性的）愿望上所犯的“錯誤”，表面上似乎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錯誤”。

事实上，改良主义者控制下的比利时工人党，也同样忽视工人运动所要求的捍卫弗来米族正当权利的政策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重要意义。

改良主义者所抱的这种态度，表面上激进得很（将“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实际上，由于他们没有为自己提出革命的前提，遂“缩小”工人阶级的作用，否认这些运动在力量配备上的可能性，而客观上（即使不始终是有意识地）这些运动都在进行着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让·特尔夫在他的短文里说道，“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混为一谈是威胁着联邦制运动的重要障碍之一”，这是在“混淆”中重复着同样的观念。

瓦隆地区的广大人民阶层，都渴望进行革命改造。虽然他们在至今尚未完全丢掉改良主义的幻想，但是，他们日益坚决地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令人萎靡的陈腐公式，他们要求采取行动以便达到粉碎复足不前的现象的目的，而这种现象正是比利时社会党右派想让这些阶层的人民维护着的。

形势逼人，政治局不得不承认必须实现联邦制这个奋斗目标。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矛盾了，因为政治局对具有民族性的权利要求采取的既是机会主义又是宗派主义的态度，它对行动也是感到厌恶的。

让·特尔夫在短文里说道，“清楚地说明发生疑问的并不是否决比利时国家（具体例子是作者指的）是国家的支柱适合与否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四部分第二点（关于联邦制问题）谈到共产国际提的法案，法案要求在弗兰德区和瓦隆区建立
经过选举产生的介于中央政权与行省之间的地方权力机构。

提纲草案第四十四条称：
“联邦制是确保比利时更趋稳定与平衡的一个手段。在这个比利时的内部，垄断资本将无法再利用民族的对立。当前的比利时国家的统一形式则使民族对立愈演愈烈。”

上面所谈的比利时是指什么呢？上下文表明，是指比利时国家。

瓦隆的劳动人民支持实行联邦制，当然不会是为了确保比利时资产阶级的国家更趋稳定，一旦实现联邦制，资产阶级的国家也绝不会更趋稳定。

要想实现瓦隆劳动人民，尤其是瓦隆人民运动成员所期望的真正的结构改革，问题应该在于，而且必将在政体问题和工人阶级行使政权问题，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劳动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一定会认识这一点。

让·特尔夫和中央委员会却把这个国家“稳定”的加强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支柱的适合”。

在政治局的文件里面，正像在特尔夫的文章、中央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里面一样，都显露出对布鲁塞尔区和对该区的一百二十万劳动人民的忽视。

工作报告在谈到上述那项法令草案时，谈到在弗兰德区和瓦隆区建立起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难道布鲁塞尔区的人民就没有权利享有代表吗？

提纲草案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认“两个民族和三个共同体”这种实际情况，而起初说“弗兰德区”和“瓦隆区”，接着又转口为“布鲁塞尔居民点”或“特殊的钱鲁塞尔整体”。

在上述的特尔夫短文中，又在阶级激进主义的外表下剥夺
了布鲁塞尔的一切资格，

“某些会讲法文，受过法国文化教育的重要阶层，或可作为实现联邦制的同盟军，但他们的阶级利益使他们更接近于主张统一的资产阶级。”

布鲁塞尔区一百二十万居民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由银行家、企业家和高级官员组成的，而是由几十万工人、职员、小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都有可能支持联邦制这一民主要求。布鲁塞尔区的瓦隆人民运动主要是由这几类劳动人民所构成的。

对于占全国人口14%的人持这种态度，究竟它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是甚么呢？

在我们看来，这种态度并不是单纯地由于瓦隆居民某些阶层的自由主义余孽作祟而造成的简单化观念的反映。这些阶层很可能把布鲁塞尔的劳动人民与建立在该市的大托拉斯、大垄断资本等同对待的。

实际上，除了在首都、多少有些国际性的“比利时”托拉斯和垄断资本外，在比利时还有所谓弗来米金融势力，因为它们的主要经济基础是位于弗兰德区（如布卡尔公司、热瓦尔公司、安特卫普沿海与港口利益公司等），还有所谓瓦隆金融势力，如波爱家族以及最强大的家族德·洛努瓦集团。长期以来十分剧烈的对抗，过去使、现在仍然继续使德·洛努瓦集团与某些“布鲁塞尔”的金融势力互相对立，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

毫无疑问，德·洛努瓦集团的目标是成为“炼钢大王”，这会使它与卢森堡大公国，洛林、萨尔、甚至鲁尔的某些霸王们勾结起来。“反布鲁塞尔”的激情正波，这完全符合在托拉斯欧洲的范围内进行“超国家整编”的目的。当然这样做决不会使托拉斯的欧洲感到不愉快的。
而这种反布鲁塞尔的态度是与先进的劳动人民所维护的那种联邦制的要求截然相反的，是与工人运动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这一正确政策背道而驰的。

今天，实行联邦制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已经非常明确了。联邦制受到了全国先进劳动人民和瓦隆广大群众的支持。问题在于确定能实现联邦制的手段和行动的方式。

在瓦隆区，联邦制的口号应从目前的鼓动范围内摆脱出来，进入行动方面。这是使弗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某些地区的联邦制口号，从宣传口号变为准备采取行动的鼓动口号的条件。

不容置疑地，这就是瓦隆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在筹备上次列日代表大会时的意图，尤其是叶尔纳同志还强调了有待组织的“直接行动”。资产阶级没有弄错，它极力反对叶尔纳和瓦隆人民运动。

但是，提纲草案第四十五条的谈法是甚么呢？它主张“阶段性”的解决方案和“试验性解决方案”，其性质是纯粹是使瓦隆人民运动在现阶段钻到裹足不前的死圈圈中去罢了。

它所提供的概括方案是：
——“建立由民主选择的（？）、真正具有群众代表性的机构”；

在各个“民族集团”中
——由上述这些机构“进行必要的谈判”……“以寻求最适当的解决办法，维护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

——“从而为联邦概念的逐渐成熟创造条件，并采取措施实行筹备联邦制”。

根据这个概括方案，党的领导将使瓦隆人民运动一味等
待一个“有效的谈判对手”。

这还不清楚吗? 谅建立起“各民族集团经民主选择，真正具有群众代表性的”机构，其先决条件是在弗兰德、布鲁塞尔以及甚至瓦隆的某些地区“联邦概念的成熟”。

只有当希望实行联邦制的瓦隆人民群众的行动创造出这种谈判的条件，并将这样谈判强加于统一国家的拥护者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个“必须进行的谈判”。

同时，还应该把争取实现联邦制的行动同反对“统一”政府政策的具体表现（如反罢工法案、所谓纪耳松“语言”法案、选举改革等）的行动具体地结合起来，同进行争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权利要求和改革的行动具体地结合起来。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工厂和街道中（它们是行动的组织者）建立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机构。这些机构互相联合，可以成为筹备联邦制的机关。

* * *

同样，人们不能对提纲草案第三十二条表示同意，因为这一条仅仅揭发了企图“把弗米米右翼民族主义者和瓦隆人民运动等量齐观”的阴谋，而没有明确指出，对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这班右派分子说来，实际上必须打倒而且唯一应打倒的是瓦隆人民运动。

* * *

工人阶级与瓦隆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建立了为反资本主义而奋斗的联盟，而瓦隆人民运动现在就是这一联盟的组织形式。

最近几个月来，瓦隆人民运动在关于劳动群众当前的主要问题上（如税收改革、生活指数和反罢工法案）采取的立场是完
全正确的。同时，它还善于进行维护弗隆居民（他们是纪律松放的牺牲品）和木斯克龙一高放居民（他们受到了不能容忍的任何侵犯的威胁）的正当权利的斗争，以及善于进行维护布鲁塞尔区的民主自由的斗争。

先进的劳动者，瓦隆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应该意识到加强瓦隆人民运动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同改良主义断绝关系，必须积极估计瓦隆人民运动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的努力和已经做的事情。

瓦隆人民运动产生于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罢工运动中瓦隆区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它由此而联合了抛弃改良主义而拥护斗争的劳动者。

但是，这个真正的并且极重要的“激进化”并不一定马上彻底地坚决地同改良主义的思想决裂。这是一个过程。它反映在瓦隆人民运动的发展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应该是持久的。

重新坠入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这种危机依然存在。这将是宣布瓦隆人民运动的死刑。对整个工人运动也将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所采取的态度恰恰是在瓦隆人民运动内部提倡最不利于实际行动、最不利于具体组织斗争的、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

瓦隆人民运动体现瓦隆劳动人民的意志，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瓦隆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的进攻，争取劳动群众经济政治的正义要求的典型战士。

关于联邦制度，瓦隆人民运动的先进积极分子将在每天的斗争中向群众解释口号的意义。他们应该在企业里和地方上创立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组织，以便组织斗争，从而把基层的联邦
主义机构卷进战斗。

共产党人同瓦隆人民运动的其他全部先进的劳动者一道，努力一步一步地明确当前的目标，总的目标，应该采取的斗争手段和需要团结的同盟。

这样才会在行动中，通过群众的切身经验，逐渐成熟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等根本问题。

10. 帮助左翼社会党劳动者摆脱改良主义呢？还是挽救左派分子呢？

提纲草案第五十条承认：
“(社会党)右派正以其反民主的行径制造分裂条件，而且正准备把分裂的责任推卸在左翼力量的身上。”

提纲草案在提出这一事实之后，竟抽象地感到有其事地说：“共产党认为，不让右派分子得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成立一个社会党反对派只会有利于右派。此外，它还会削弱工人行动的可能性，妨碍反垄断的斗争。”

上述段落的总标题是：
《社会党内部的分裂仅仅有利于右派》。

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清楚地表明想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与右派的团结。

我们就来实际地（而不是抽象地）看看形势吧。让我们提出最乐观的假设，假定右分子由于拒不低头而在比利时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孤立、被击败。

社会党党员应否在这种局势面前屈服呢？在右派的分裂欺诈面前应否退让呢（不幸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难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劳动者采取坚定的态度“将会削弱工人行动的可能性
并妨碍反垄断的斗争吗？

我們再提出另外一个假設：假定社会党左翼在比利时社会党内已竭力维护自己的斗争立场，但实际上右派却对左翼社会党的劳动者采取了开除措施（根据比利时社会党的結構和活动，甚至可以使用代表大会决议这样的所谓“民主”形式，因而采取开除措施是可能的）。

我們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例如，宣布不得同时属于比利时社会党和瓦隆人民运动。

左翼社会党劳动者应否屈服，应否“忠实执行”这种代表大会的决议呢？这种态度会不会增加工人阶级反垄断资本行动的可能性呢？

值得注意的是，提纲草案第五十条，没有从对改良主义和右派的态度进行任何原则批评出发，而是想把社会党党员的行动局限在“要求比利时社会党的党内民主和忠实履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政治局的观点，实际上沒有给社会党劳动者指出任何出路。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政治局已放弃了使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立场，政治局本身在实践中已日益走向右派的立场。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本来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一贯的阶级立场，把广大社会党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引起对日益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来。

共产党和应该反对改良主义右派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影响，反对他们在比利时社会党内部并通过比利时社会党进行活动的基本力量。

但是，政治局的立场不仅有助于解除劳动者武装，使他们逐
失方向，而且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国家、反兄弟党的运动作出了贡献，客观上还有助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反对左翼社会党员的行动。

1962年初《红旗报》上刊载的皮埃尔·儒瓦的一系列文章、杜夏多的一篇文章和卢扬的一篇文章，都成了《人民报》的好材料了。

1962年2月27日《人民报》写道：
“共产党人的转变。
“皮埃尔·儒瓦先生在《红旗报》上骤然间扬起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了……
“这是姗姗来迟的褒奖。
“我们自然是以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记下我国的一位共产党领袖的这番懊悔的……
“经过这番转变，可以期待其他的转变。总有一天，许多共产党员会对多年来工人阶级内于下的分裂勾当感到遗憾。”

1962年3月10—11日的《人民报》写道：
“共产党人的转变。
“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转变仍在继续中。昨天，皮埃尔·儒瓦先生已承认列宁的某些论点已经过时，今天又轮到了卢扬先生……
“人们将有机会注意到该党的修正主义，该党已承认它刚刚‘从某种禁锢中摆脱出来’。”

1962年8月16日的《人民报》写道：
“修正主义与宗派主义左倾主义”
“……好，我们几乎可以同意这位共产党人（杜夏多）的意见。他善于巧妙地掌握思想意识的平衡。为了给他一点安慰，我们想再奉告这一点，宗派主义左倾主义同样也是各社会党内的
不良因素。”

格里巴同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事，为比利时社会党右派提供了新武器。1962年11月22日《人民报》的社论——题为《格里巴被开除》——是对社会党左翼的一种隐藏的威胁。

人们特别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把对付‘异端分子’格里巴的措施的十分之一用于比利时社会党（哪怕情节更为严重），保证人们立即看到共产党的报纸又该义愤填膺了，并且竭力从中捞取资料。”

1962年12月13日《人民报》在一篇题为《派别活动》的社论中对瓦隆人民运动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文章的出发点是以特尔夫在瓦隆人民运动列日代表大会“竞选起草委员会”上的一次发言为依据的。

“前部长、前共产党议员让·特尔夫在步入瓦隆人民运动竞选起草委员会会事大厅时声称，

“这个竞选对比利时社会党未免有些过于苛刻了。应本着‘客观’的精神来加以修改。瓦隆人民运动仍然应是比利时社会党内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反对派系。”

恰恰相反，这份竞选草案是完全正确的。它对政府政策的批判、对比利时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的批判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让·特尔夫看来，这份竞选“未免太过于苛刻了”，它是不客观的……因此，让·特尔夫在瓦隆人民运动代表大会上急忙援助了比利时社会党的右派分子。

提纲草案第五十二条大肆“宗派主义过激主义”、“左倾主义”、“教条主义”，却未作任何说明。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对那些在党内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立场的同志时，还是使用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历来对革命者所惯用的策略。”

104
列宁在整整一生中饱尝了这类辱骂。提纲草案却对社会党左翼也加以指责了。

“这种左倾偏差在社会党左翼有所反映，有时在我们党内也有所反映。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偏差是非常可怕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某些同志和社会党左翼的某些同志都犯过一些左倾错误。

而今天，主要威胁着我们党的致命的政治危险肯定是修正主义的危险。

至于社会党左翼，其中某些参加者的左倾主义也绝不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

事实上，社会党左翼思想不一致，有各个派别，但没有一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倾向于靠近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最能标志这些不同派别的，不是带有改良主义幻想的残余就是受到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花样“翻新”的引诱，再不然就是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变种。

但是，总的来讲，大部分社会党左翼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在朝着比较一贯的阶级斗争立场转变。

这就触怒了修正主义的政治局。它与右派分子站在同一立场上说什么“左翼危险”，“谨防左翼”。

如果这还不算是阶级合作思想，还不算是数十年来所散播、鼓吹、培植起来的改良主义，那么，照提纲草案第五十二条的说法，究竟现在什么是“对我国特别可怕”的危险呢？政治局否认这是阶级合作思想和改良主义，因此，这只能证实政治局本身已经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

但是，改良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已经气数将尽，即便“在我国”也是如此。
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已经受到狠狠的打击。这种影响将愈来愈受到这样的打击，尽管我们现在领导人的中途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阶段，而这个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11. 群众行动呢，还是议会述？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统合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多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深刻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军事戒严或摧残蹂躏。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策分歧时，摧毁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说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

“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制度’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限制。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败和虚伪。为了准备群众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要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

“然而当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向着革命，赞美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妙处⋯⋯

“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
議會從來沒有解決過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層層阻隔着，所以工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到，看到和体会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少數剝削者的機關……”①。

我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提綱草案曾談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

十三大摒棄了這個觀點。然而政治局毫不考慮這一警告，事實上，他們的行徑似乎是向社會主義邁進具通過議會道路似的。

政治局秉承这一方針，而將“到議員家里請願”作为一种高級的行動方式。

我們並不反對到議員家里請願。

當一個企業的劳动者即將或準備轉入爭取權利要求的行動之前，往往派遣一個代表團找領導，向領導遞交一本勞動者的要
求書並表明他們的決心。這就是一種強制性要求，是行動的發
端，是行動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示威”，如果進行得好，它還是動
員群眾的補充手段。

勞動者也深知到工會領導那裡去請求或要求組織鬥爭的意
義，當然，這些請願團不能代替真正行動的本身，但可以為行動
作準備。

根據不同情況和對象，到議員家里去請願並沒有或只能有一
個與我們上述各類型的請願團相似的意義。然而，對政治局
來說，這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議員家里去請願”成了劣
藥方，或者正如1962年7月28日《紅旗報》所說的。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政權考覈》，見《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27—229頁。——譯者
“……如果工人运动懂得它终于从这里获得了它过去所缺乏的手段，获得了可使议会生活同国家合拍的方法，那么，工运面前必将展开一片料想不到的远景。”

难道这不是散布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幻想，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

这是“赞美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美妙”。

中央委员会在提纲第三十九条中，再次以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来代替维护与扩大民主自由的具体斗争。提纲草案第三十九条写道：

“根除比利时议会与劳动群众的分离……”

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诚然，群众的压力可以强制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和改革。然而，只有行动才能施加这种压力。政治局时刻感到的这种压力就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使这种压力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议会与劳动群众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对抗性的经常性矛盾的表现之一。

政治局及其追随者——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三大的立场。

12. 共同市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

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纲草案第三十七条）曾严厉明确地谴责过共同市场和欧洲煤钢联营，因为它们是“托拉斯的欧洲”，并且同样谴责了它们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性条约
的政策勾结在一起。

提纲强调指出：欧洲一体化不但不能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反而为更加深刻的矛盾和加强对非欧劳动者的奠定了基础。

这次的提纲草案按照政治局自十一大以来奉行的实践路线着手进行“分析”，得出了同十一大全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提纲草案承认某些难于否认的证据。

“在垄断资本庇护下实现经济一体化，如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共同市场，主要是企图加强超等大托拉斯的威力……

……然而，经济一体化并不因此就消除分裂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矛盾。

它更加激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提纲草案第三条)。

提纲草案第四十六条又说：

“国际经济一体化就算在本质上并不一定反动、倒退，但只要是在垄断资本庇护下实现的，就必然会引起极坏的后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正是这样。”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戏法的第一幕。

当前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正在于它受着垄断资本的庇护。

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说法，从阶级观点来说，等于这样说：

“工业集中就算在本质上不是反动、倒退的因素，只要是在垄断资本庇护下实现的，就必然会引起极坏的后果。”

中央委员会情愿受修正主义的迷惑，无视现实，以便只看到些表面的和眼前的东西。

修正主义者每逢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便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从短暂的现实出发，承认所谓资本主义矛盾的缓和并加以一般化。例如，提纲草案第十条说：

“经济一体化并不仅仅靠它自己来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也
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发展、衰退时期和经济危机。”

“并不仅仅靠它自己”，这句話岂不明明白白意味着它也有一份功劳么？

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根本矛盾日益深刻化的基础之一，而且还引起了新的矛盾的产生。

然而，提纲草案第二条却连“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都不谈了。它说，

“军费的过度膨胀虽然使军火托拉斯发财，但也妨碍了经济的平衡发展……”

照修正主义“理论家”看起来，只要避开战争的费用，资本主义经济就保障能够“平衡发展”了！

同样，提纲草案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共同市场是旨在对不发达国家加强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尝试。

列宁早已作过说明，而且仍然完全适用于今天。

“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①

我們則仍然站在１９６０年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上，

“在‘整体化’口号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組織，实际上在加深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組織是最大的資本家集团

①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１９页。——编者
之間瓜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新形式，是較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向其較弱的伙伴实行經濟滲透的新形式……

帝國主義者結成以美國为首的各種軍事政治聯盟，共同進行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進攻，扼殺民族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

提綱草案第四百六十四條也指出不要局限于揭露共同市場具有的危險，竟然說：“今天共同市場已成事實，必須予以考慮，对其进行改革，以便改造它；給它指出其他方向，或以其他機構取代它，使經濟整體化為社會進步和組織和平共处服務。”

當印刷这几行字的油墨未干的时候，共同市場已接近破滅了！提綱却没有对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與日俱增的現象作出任何分析，尤其沒有分析使美英帝國主義之間、英帝國主義與巴黎—波恩軸心共同統治的野心之間、巴黎—波恩軸心本身與美國之間、以及共同市場成員國之間相互對立的矛盾。

中央委員會認為應該進入共同市場——这个托拉斯的歐洲——以便：

“在里面发生影响，予以改造。”

中央委員會奮起直追，趕上了歐洲社會民主党的改良主義者的立場，這些忠于自己的—貫观点的改良主義者已完全“—体”到這個資本主義的新机器中去了。

勞動群眾的代表參加某些機構，雖然不應該一概加以反對，但他們參加這些機構只能具有下述內容，例如，忠于本階級的工人代表參加代表額對等的委員會或議會，不是要“改造這些機構”，而是要在這些機構中當充勞動者的權利要求的代言人，利
用这些合法的可能性越发强有力地号召展开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政治局关于共同市场问题的“大转变”还表现在其他更广的观点上。

提纲草案第四条称：“(“社会主义”)针对把世界分成经济竞赛集团，主张在有计划地实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经济援助，恢复世界范围的统一市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将在这统一市场中和平地进行较量。”

这就是现在有人想给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指定的奋斗目标，“恢复世界统一市场”，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必将带来政权一体化，我们面前呈现出的是一个“更新”的怪物，包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世界。

两个阵营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是恢复“世界统一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统一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一体化，只能是建立国际范围的阶级合作，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变质，只能是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

认为通过一体化，社会主义就能将资本主义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比改良主义的理论还要空想，还要错误，因为改良主义理论还主张通过生产合作①与合作社来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

这些“新理论”企图使人相信，采用一些经济法术，仅靠依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竞赛（某些人还提和平合作），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① 生产协会（Phalanstères）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提供的理想共产体制。——译者

112
这种理论的唯一目的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作用的理论，否认关于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必须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些修正主义理论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工人阶级丧失斗志，因此，客观上是为保存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

政治局及其追随者——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导致国际范围内阶级合作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始终站在各国无产者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伟大的阶级斗争的最前列，这一斗争日益扩大，正接近最终的胜利。

四、要革命呢，还是要社会改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还是要修正主义？要共产党呢，还是要改良主义的政党？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呢，还是要在修正主义基础上的假“团结”？

1.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吗？

1962年2月22日《红旗报》上登载的所谓政治局的意见书”中说：

“普选建立社会主义并不是战略目的。它是社会发展本身
的基本情况和客观法则。

“不是由共产党人在其制定的政治路线中来确定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必然的转变是社会本身的表现，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和幸福的演进结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它存在的理由是使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由秩序的形式，使它适时接近，缩短实现它的阶段，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教训和经验来避免摸索和错误。总之，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人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阐述了修正主义的根本的典型的观点。修正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自然发生的，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党的作用不过是“有助于”或者“便利”终会自然产生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是资本主义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自动论”观点。列宁在1908年4月所著《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书中写道，

“修正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们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流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本质。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求一时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本质上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锐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
的修正主义。”

在1904年列宁所著《怎么办》一书中，我们看到引自“经济主义”（这是机会主义的变种）刊物《工人事业》杂志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与政治局的“意见书”有无同工之妙（人们可以看出，某些所谓“新”思想，不过是半世纪前的旧货色而已）。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要以自己的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客观发展过程。……但是因为《火星报》（列宁主义报纸）对于策略持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意见，竟使《火星报》在实际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

这份“经济主义”报纸竟责备《火星报》，“把自己的纲领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纲领当作翱翔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精神。”列宁用极其锋利的语言驳斥了这种被他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观点。

他随即指出：“单是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互相比较的意义的估计’这个说法，就已经暴露了完全缺乏自觉性的事实……

“难道社会民主党（即当时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的‘精神’吗？”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为革命形势创造客观条件。然而，只有当主观因素与这些客观条件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产

（1）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20页。——译者
（2）疑为1902年。——译者
（3）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译者
（4）同上书，第362—364页。——译者
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我们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都是历史上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是指，产生这种情况的客观条件必将存在，工人阶级，或广而言之，劳动人民，必将找到道路，必定会决定获胜的手段，必定会创造必要的主观因素。

这是不以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唯一“作用”是企图妨碍、延缓和阻止主观因素的行动和革命的行动。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6月）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

“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行动，没有不是根据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的需要来决定的。即工人阶级进行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我们与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修正主义者所追随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资本主义的立场。

2.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否必要？

我们已经看到，政治局不仅拒绝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与实现当作党的行动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9—190页。——译者
阶段），而且否认应该如此。

在另一个文件中，我们也已说明，党章修改草案的作法也一样。

从这个立场出发，政治局仅仅给党指定，发生有益的作用而不是必不可少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取消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观念。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现存政权，如果你不去推它，它绝不会自己倒下去。革命的胜利也绝不会自己到来，而应该去准备和争取。

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能够保证这个条件。

工人阶级要想采取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行动，那么，就必须和必不可少地要有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应该是有觉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够率领并领导群众的先锋队。

3. 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写道，

“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它将造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几个阶段。”

伯内尔在1961年12月16—17日全国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国内进行的斗争。”

所有这些改革，都“使比利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跨进一大步”（提纲草案第三十九条）。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的争取当前权利要求的斗争，产生着新的权利要求。它日益清楚地显示出，必须实现旨在监督、限制和（如有可能）粉碎垄断资本主义政权并给予（？）劳动群众以实权地位的深刻的结构改革。”（提纲草案第四十一条）

“应该通过扩大民主来使当前的政治结构适应新的需要，以使群众更直接地参与制定所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决定。”（提纲草案第四十三条）

“劳动人民日益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以及国家利益迫切要求进行的深刻变革，将破坏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阶段的标志。”（提纲草案第二十条）

在题为《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一节中，提纲草案第十九条写道，

劳动人民“要求过问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我们则认为，工人阶级的根本愿望是取得政治权力并行使这种权力。

所有这些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①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②

① 列宁：《论两个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译者
② 列宁：《论策略书》，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译者
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修正主義者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一最終目的。
他們的奋斗目标越縮越小而變成了：
劳动者要“過問經濟生活和公眾事務的管理”这样一个卑躬屈膝的要求。
除了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改革並保持資產階級民主外，他們不願指出任何其他的遠景。他們力圖使劳动者產生幻想，說一旦一定數量的改革將保證逐步“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不但不提出政权这个根本問題，而且硬說有可能，
“給予(?)劳动者以實權地位，監督、限制和(如有可能)粉碎壟斷資本權力”，并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利用資本主義的國家——即壟斷資本的國家本身！——作為行使這一“實權”的工具！
他們不但不提出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这一长远目标，反而希望“適應當前的政治結構”。
他們冀想以此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修修補補”辯解。
在修正主義者看来，爭取當前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权利要求斗争和爭取改革的斗争，客观上就是实现“走向社會主義”。
我們在第三部分已經看到，修正主義的邏輯已經使他們削弱、甚至拋棄了真正進行任何爭取權利要求、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有利于勞動者的改革的斗争。
修正主義把工人階級在行動中樹立起自己的領導作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聯盟的观点，變成了使工人階級附屬於它們的可能的(甚至自封的)同盟軍的觀點。
修正主義借口“講究成效”，提出了一些甚至能為关心“社會
安宁”阶级敌人所接受的“目标”。

旧根未除，修正主义高估了资本主义力量，而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修正主义在实践中为了不顾事实地替自己的观点辩解，在策略上“不得不”置入主观主义，散布一些涣散斗志的幻想，把恶劣的妥协说成是胜利。

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不稳定性，在实践中，他们时而低估、时而高估资本主义的力量，以致会做出冒险主义的行动。

修正主义者把他们的“走向社会主义”说成是“有效的”、合理的可靠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改良资本主义的观点。

修正主义者提出这种观点来和“急性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所谓“罗曼蒂克”观点相对立。他们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宗派主义者”、“左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主要危险”。

他们对最凶恶的敌人非常谅解（“应加强肯尼迪所处的地位”），对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同志和党却满怀怨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然是革命者，就能够始终不渝地站在争取当前权利要求、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有利于劳动者改革的最前列。

这一斗争是我们日常必需进行的活动，因为它可以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可以在行动中结成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联盟，可以使得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正出路，夺取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总之能使无产阶级（他
們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因素)做好準備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認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在每個國家中奪取政權。

我們認為，
“只有確信階級斗争、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4. 国家是否为阶级的国家？

在1961年12月伯內爾向全國會議所作的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到如下段落。

“希望看到國家在經濟動向（事實上經濟是由國家資助的）方面顯出能起到有益作用的要求正在高漲，這是很正常。全國進行鬥爭以便使這個國家發生民主變化并在自己的創議中反映比利時人的要求和全國利益，這也是很正常的。”

什麼比利時人？什麼國家？國內的什麼利益？

提纲草案第五十三条批評了修正主義的國家觀點，說修正主義者認為國家：“超然於階級衝突之外。”

實際上，修正主義者否認國家有階級性。中央委員會在下列段落中剛好拾起了修正主義的理論作為自己的東西：

“這些（修正主義的！）錯誤觀點……在確立改變國家內部力量對比的任何行動，妨礙進行改變政權結構並將此結構變成監督壟斷資本和剷除它們威權的手段的任何行動……。

“這就要求群眾不斷對國家及國家機構施加壓力。國家機構本身無力抵抗壟斷資本，無力掙脫壟斷資本對它施加的控制。”

① 列寧：《國家與革命》，見《列寧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9頁。——譯者
根据这种说法，如果这不是把国家看成是不幸地受到了垄断资本的压力，因此应该以群众的“压力”把垄断资本的压力抵消的一种超阶级的“中立”国家论，又是什么呢？

老实说，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还稍微“改进”了修正主义的传统观点呢！传统观点主张，劳动者可以占据国家机器，用它作为劳动者自己的政权机构。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应该予以改变的是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

改良主义者曾经用“通过选票”来夺取政权的乌托邦远景来欺骗工人阶级。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就更加温和了：“只要与多数派的代表进行接触和攀谈”以及派其他代表团到议员那里去，就能实现“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专政的工具，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统治整个社会的工具，而这个统治是直接依靠暴力的。

在我国，现今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对全民专政的工具。哪怕这个专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行使的。

工人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打碎这个国家机器。

提纲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条第一段的提法就与最明显的现实绝对相反，但它是我国修正主义者“理论”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国际上和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在发生着迅速和广泛的根本变化。”

什么叫“国际上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呢”？

这种变化只能在统一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显然这里谈不上这个问题）——的世界内发生，或者只能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一体化”的世界里发生，而这——
体化”的观点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我国的修正主义者所珍视的观点，我们已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第12节揭露过了。

那么，每个国家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正在发生的（迅速而广泛的！）“根本变化”变在哪里呢？

“结构的根本变化”应该指生产关系的变化，如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应指国家的阶级性的变化。

但是，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阿登纳德国、英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中，这些“根本变化”在哪里呢？

提纲草案的出发点完全是建立在骗局的话上面的。

工人阶级是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显然，只有当人民时刻准备回击资产阶级的暴力时，才有这个可能。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当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时，却向无产阶级宣扬不要通过非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显然，这只能是投降和叛变。

我国修正主义分子又是怎样说的呢？

大约一年以前，皮埃尔・吕瓦曾说过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即采用和平方式）来实现这个过渡是大有良机的。”

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看来，今天的问题仅仅在于“比利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当比利时劳动人民起来反对利奥波尔三世再度登基时，镇压机器是残酷无情的，造成五名死亡。
当劳动者进行反法西斯的“单一定”斗争时，死四人。

当一年前巴黎劳动人民举行和平示威反对法西斯危险时，死八名。

当米兰青年发出和平呼声声援古巴时，死一名。

当意大利劳动人民过去起来和平地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塔斯希罗尼政府时，街头死了好些人。

这里所谈到的还仅仅是我国和我们邻国而已。况且所有这些行动，所有这些斗争，都不是直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特权的。

再如比利时的宪兵费用，虽然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下议院逐年增加，施压手段得到了加强。这个政府竟敢提出“反罢工法案”来武装政府，反对劳动人民。

给工人阶级造成歌舞升平的假相，或到“本国的结构和上层建筑”正在和平地（而且只能是不平地）发生着根本变化，这岂不是麻痹工人阶级，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吗？

5. 修正主义者的“民主”手法

政治局的“民主观念”的含义，已经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章修改草案中有所透露。政治局的“民主观念”是官僚集中制的观念，这个党中，讨论只能在“同辈”间进行，与下级讨论会“有失身份”（具偷术的词，见《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一号文件》）。

这些都是比利时社会党最坏的右派分子的观点。
我們通過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政治局的作法。

* * *

1962 年初，在黨內和黨刊上開辟了一個《論壇》。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說，開辟這個《論壇》意在:

“努力估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更新因素”……

“總結我黨為了使比利時工人運動更加有效而在党的政治和民主職能方面進行的改革”

伯內爾在1962年1月19日的《紅旗報》上進一步指出:

“目前國際上正在廣泛地進行着交鋒，我們應該懂得它的意義并作出評價，以便比較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格里巴同志于1962年1月21日《論壇》寄出了自己的文章。政治局決定在2月22日的《紅旗報》上予以發表。政治局并在這篇文章之前冠上一頂“帽子”，指責格里巴同志說:

“從文章一開始就歪曲了中央委員會決議的精神”

這個論斷使人聯想到有位校官在觀察時問新兵“湯是否好喝”的典故。有位倒邏的軍人倒邏地答了一句“湯很難喝”。這位校官暴跳如雷地說：“沒問你湯是不是難喝，是問你湯是不是好喝。”

格里巴同志文章的後面，緊跟着政治局的所謂“意見書”(都在同一天報紙上)。在“意見書”中，政治局“深入”地批評了恰恰是格里巴同志所批評的那些修正主義觀點。

此外，這份“意見書”還輕蔑格里巴同志“斷章取義，悍然不顧這些引證的上下文”。

然而，任何細心的讀者都會看到，正是政治局歪、增和歪曲了格里巴同志的文章。尤其是，政治局的文章竟然篡改了格里巴同志引證过的讓·布魯姆的一篇文章的原文，以便指責格里巴同志的“論壇”文章。
巴采取了篡改的手法！（参阅《在刚果的比利时人》一章）

在这篇“意见书”中，政治局对一个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无耻的、恶意的、诬蔑性的攻击。

政治局以为在这篇文章里应该试图诋毁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结果，政治局自己反倒弄得声名狼藉了。我们将来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几天之后，格里巴同志寄去了对“意见书”的答复。众所周知，政治局没有予以发表。

政治局可以允许自己在党刊上谴责党的同志，后者却没有回答的权利！

许多同志寄去文章批评党的组织领导。这些文章同样也没有被发表。

党刊上开辟的《论坛》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党的领导很可能通过真正的政治讨论而澄清真相。

政治局仅仅要使人们相信格里巴同志的意见是孤立的，个别的意见。

过了几周，格里巴同志被撤消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1962年11月6日，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通过了两项决議（我们已提到），这是声援社会主义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这两项决议都遭到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攻击。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决定把这些决议寄给党刊。

《红旗报》未予发表！11月17—18日的中央全会还谴责这两项决议“违背党的路徳”！

格里巴同志当时被置于两种境地，其一，必须不赞同“这些作法”——即把这些声援性决议寄给党刊——，其二，除在
“同辈”间（即在中央委员会）维护自己的观点外，不得在党内维护自己观点。

格里巴同志拒绝接受这两项要求，因为第一个要求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反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国家声明和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个要求违反党内列宁主义准则，违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格里巴同志在拒绝这两项要求后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 * *

这些事件过后，政治局利用党的常设机构，组织了对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真正的暴力镇压。

——违反常规，不得举行干部会议；
——不准召集地区委员会执行局；
——越过地区委员会行事；
——把讨论分散到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的区委会；
——这些会议的当然报告人系——根据“官僚集中制”的准则——坚定不移地赞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中央委员。

大概这些还嫌不够，于是决定，凡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地区委员，除在自己所在的基层组织维护自己观点外，禁止到地区委员会所属各党委会去维护自己的观点。

* * *

这条绝对违反民主的“准则”在今天讨论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草案的时候还在贯彻执行中。

中委和地区委员必须起来维护的“路线”就是“草案”的路线。这样一来，在代表大会之前，“草案”就已成了“路线”了。

因此，目前，地区委员或中委被禁止去维护仍然有效的现行
党章，禁止他們去維護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線！

* * *

1963年1月15日于克勒市委大会决定将一个修改党章的反革案及其说明通告地区委员会的各市委会、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格里巴同志和兰多尔夫同志，由于没有反对这一决定，并且表示赞同，因而遭到了地区委员会的斥责。

2月6日，于克勒市委以三十五票对二票，两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驳回了这个斥责。我们从决议中摘引下面两个看法。

“此外认为，尤其在地区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党员，特别是同一地区委员会的党员，均有权获测足以阐明目前在地区委员会内部展开的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的一切情况……

“我们认为，于克勒市委正是履行了与党员的这项权利完全吻合的义务，……

“我们认为，事实上，这个斥责是针对所有通过此项遭到批评的决议的同志。其真正目的在于与那个古怪的第一号决议（这项决议‘谴责’并‘拒绝’了于克勒市委的建议。本市委大会拒绝考虑此决议）一起对目前进行的讨论及其前景施加不能容许的、令人遗憾的压力。”

按照党章的规定，地区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它原来的几项决定。但是，地区委员会的多数断然坚持了这个斥责，重犯了它在对待把党的各项文件寄往党的某些组织一事上所持的那种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态度。

* * *

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作法’。在这方面，他们同比利时社会
党右派比起来是毫无逊色的。

6. 是“后退”了，还是从十一大到十四大

政治局的所谓“意见书”(1962年2月22日《红旗报》指控格里巴同志是“后退”，想“退到十年以前的路线”)

今天这样可笑地指责格里巴的政治局委员，差不多只有一名例外，几乎都是十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一再犯党所谴责的那些错误的人。记得在1954年维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布鲁塞尔地区代表大会上，怕内尔以党的领导机构的名义宣布，停止德洛提同志党籍，等候开除，因为他维护了在几周以后被通过的路线。

维耳沃尔德代表大会表示反对政治局的政治立场和它的官僚集中制方法，反对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政治局采取的包庇态度。

当时格里巴同志已不是中央委员，他在1951年代表大会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当时维护了后来在1954年维耳沃尔德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两个重要立场，它们正好说明政治局今天所抱的态度。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确定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解放后，我们在忽视工人问题和忽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明显的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这些错误在左倾词句的掩盖下，一犯再犯，实际上导致了近几年的宗派主义立场。”

（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纲第三十二条）

“这种错误的民主集中制观念曾存在于整个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会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忘记了集体领导原则要求人人
对党负起个人责任。”

（同上，第三十六条）

“为使基层的批评得以壮大发展，应鼓励并促进之。应使每个提出健康批评的人确信，他决不会因提出批评而受到责备，而是他的批评会受到欢迎，他所揭发的缺点和错误将实际上得到纠正。此外，党的领导也应作出批评的榜样，进行这种批评的训练。”

（同上，第三十七条）

对于1954年以前所犯错误共同负有责任的人，犯下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人，曾在党内实行或容忍独断专行与命令主义的人，于维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前不久，甚至在维耳沃尔德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拥护维耳沃尔德方针的姿态。

当时这批人还不过是潜在的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当维耳沃尔德之后，他们也没有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残余真正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68年的匈牙利事件向党敲起了警钟，警告党警惕政治局的危险的投降的倾向。

但当时大部分党员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偶然的错误。然而，任何自我批评都未作。1958年4月22日的《红旗报》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这个现代修正主义的大作）“无疑包含着一些丰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观点。”

政治局从未对这个论断做过任何说明。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局正日益公开地采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观点。

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纲草案”中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提法。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纠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局更日益公开和系统地发展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场观点。
政治局现在谈到退回到十年前去，事实是政治局退回到五十年前，退回到已被历史所唾弃的修正主义理论中去了。

7. 政治局与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危险

现在大家都知道，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深刻分歧。

目前，把这些分歧简单地看成为“主观因素”，就是说只是由于对局势估价的不同而产生的，那将是错误的。

实际上，这些分歧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内容本身，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分歧还涉及兄弟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也不想谈到导致目前局面的发展过程的所有因素。

在这场辩论中表示态度的各国共产党——目前，大部分都公开表示了态度——公开发表了许多重要文件，我们的同志们应该极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因此，一般讲来，我们希望同志们自己通过研究这些文件来了解各方面的立场。

人们都还记得，早在1956年，多承美国国务院的“一片苦心”，各兄弟党和公众舆论得悉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上述“做法”的结果，是在所有共产党中引起了一场很大的
混乱。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报告的内容本身并没有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波兰在1956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和同年匈牙利的反革命阴谋，都起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屡次被置入一些公开肯定的政治立场的既成事实面前，而这些立场却是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损害1957年共同宣言的，损害1960年八十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的。

有些党的领导企图把这种单方面意见和决定看作是全体共产党的人都有约束力。照他们看起来，这些东西应该作为大家的法律，并且置于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声名之上。

这些做法违背了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权利平等的原则，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坛上，未被邀请出席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遭到了许多党领导人的公开、片面的攻击（当时我党未参与攻击）。

一个代表大会的讲坛被用来斗争另一个兄弟党，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种攻击的欺骗性，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他们攻击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所谓的“破坏”。然而，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实际上，他们所攻击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政治立场，尽管他们没有提到这点。
此外，还有某些指控涉及1959年以前好几年的事情。1959年正好是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的那年，苏共代表团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机构签署了一项共同声明，赞扬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的正确政策。

赫鲁晓夫在二二大的讲坛上竟然说：“看来，他们（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指望用这种方法来准备条件，以便博得享有帝国主义者的施舍的权利。帝国主义者随时准备给那些分裂共产党人队伍的人支付三十枚银币。”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

反之，参加巴尔干条约的南斯拉夫（其他两个成员国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接受了大量的援助（总数达一千五百万以上的比利时法郎）和美国军事装备。但是，铁托却在1962年12月最高苏维埃的讲坛上享受到了莫大的荣誉。

尤其显得毫无道理的是，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本身进行的攻击是来自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现任直接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设在意大利的火箭发射台和所有武装力量的威胁。

意共领导人与其诋毁一个长期受到来自意大利国土上的威胁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便利帝国主义的觊觎勾当，倒不如把自己的这股劲头用来动员意大利劳动者反对这些侵略基地。

后来，又愈来愈多地发生了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许多兄弟党的攻击。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起初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些
国家关系上的措施，片面中断了百百的贸易协定，召回技术人
员；放棄了发罗拉（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基地，事实上斷絕了与阿
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等等。

这种态度竟发展到与帝国主义者一道，向侵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尼赫鲁的印度提供军用物资。

目前，造成这种极端危险的局势的人，一面要求停止他们自
己所挑起的这场公开論战，一面却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继续进行攻击。

也就是说，有些同志應該繼續听凭虐待和羞辱而不能为自
己辩护。

关于分歧的政治內容，可以概括如下：要么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因而必须遵守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要么陷入修正主义。

某些共产党（包括我們党在內）的领导人，对于受到八十一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1960年11月）严厉譴責的南斯拉夫修
正主义者所持的态度是很突出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丝毫沒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們公开
地这样宣称。

但是，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的领导人看成是一些曾經犯了一些错误，但目前正在纠正错
誤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兄弟党的这些領導人在向铁托的立场看齐。
我們則執著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同意八十一个共产党和
工人党声明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
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 1957 年宣言相对
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
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附美国帝国主
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所谓的‘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
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
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悖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
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
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
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

我們党的领导很不光彩地成了首先公开造谣诬蔑中国共产
党中的一个。

在此以前，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只是提供了经歪曲和篡改的情况。

1961 年 12 月 7 日，布魯姆开始在《红旗报》上对中国同志
公开提出“批评”。

1962 年 1 月间让·特尔夫以其特有的笔调发起了进攻。

1962 年 2 月 22 日政治局的所谓“意见书”竟达到了毫无根
据的谩骂、诽谤和诬蔑的少见的程度。
“人们（即中国同志）全盘否定了批判个人迷信的重要性和有置性。”（政治局文件）

在1956年和1967年中国共产党曾发表了两个文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个文件是至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迷信”）所作出的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有人攻击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可能的和有益的论点。”

由此而“逻辑地得出”这种理论：

“‘局部战争’对世界和平，必然是无害的，没有危险的。”（政治局文件）

这种毫无根据的谰言实际上是在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诬蔑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好战”。这个国家尽管经常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却依然每一天都证明着它的和平意志。

我们早已习惯了对敌人的这些诬蔑了。

不幸，我们看到，某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却在支持帝国主义进行的反共心理战。

中国同志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批驳了这些诬蔑。

中国同志的实际行动，正是坚定不移地为和平而不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表率。

政治局文件指责有人：

——要求“不断地、无限度地进行派别活动的权利”。

——“反对党与党之间兄弟平等的原则，死抱住‘领导党’的错误观点不放。”

进行派别活动？这是修正主义者和右派对于那些不屈在他
们的打击下屈服的人常常提出的指控。
提出这类指控的人，都是那些不愿进行真诚的讨论，企图对党员封锁消息，害怕真理的人。

“党与党之间的兄弟平等”吗？修正主义者所实行的兄弟平等到底怎样呢？政治局“意见书”的草拟人已树立了榜样。

中国同志在国际声援方面做出了巨大牺牲，足以表明他们是在贯彻党与党之间的兄弟平等。

几年来，他们受到了其他党领导机构所发动的真正的、有组织的围攻，但他们所表现的耐性和观点的宽阔，足以表明他们多么关切共产党人的兄弟友谊，多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其他党的所作所为则恰恰相反。

“领导党的观点”吗？真是贼喊“捉贼”！

攻击中国同志的那些党的领导人表明，他们事实上的跟随主义已经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政治局文件称：“有人对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意义提出了异议。”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斗争和行动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榜样。否则，中国共产党人怎能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呢？

我们倒是始终在等待着修正主义派的“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意义”呢！

政治局文件谈到有人：

“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及其先锋政党——共产党……的深深不信任，把这些党看作纯粹是辅助力量……从而导致反马克思主义的‘输出革命’的观点。”

“输出革命”？这一向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运动的无耻诽谤。修正主义者却把它重新拾起来加以发挥！

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可耻诽谤的基础上输出反革命的。
这就是警察进行迫害的“口实”。
妨碍帝国主义者及与帝国主义者站在一起的修正主义者
的，正是革命者活跃的道义援助，他們决不允许反革命的输出。
他們支持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和斗争。

中国同志称：

“我們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們一直
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
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
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誰也不能不许別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
能用‘燗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別国的革命。”①

政治局的无稽攻击是不可原谅的。

在提纲草案第二部分里，中央委员会恬不知耻地歪曲了坚
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立场的党和同志们的主张。

中央委员会照抄修正主义分子对这些党和同志们的攻击。

提纲草案第五部分談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用什么
词句来谈的呢？

提纲草案再次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诽
谤。

这两个兄弟党被指控为反对1957年和1960年国际会议的
宣言和声明。

正是在政治局的所謂“意见书”（1962年2月22日）里攻击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那些人，发出了这个新的谴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30页。——译者
在我们所提起的那篇文章中，政治局泄露了自己对这份声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所抱的真正态度。实际上，政治局把它看作一张废纸，把它看作：“一个如此四平八稳的声明……这样就可能使人在依据这个声明来阐述、维护和执行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或者往往是具有极大分歧的政治论点作辩护。”
政治局还进一步指出：“声明的普遍价值遭到了损害。”

今天政治局的路线，必然就是受到一个共产党党和工人党声明所谴责的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
政治局日益明显的修正主义态度受到了其他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潮流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正在为击败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和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的真正团结而斗争。
我们欢迎并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修正主义潮流的具体倡议和态度，因为修正主义潮流制造分裂，而分裂活动使得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者心花怒放。
我们欢迎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并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团结（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具体倡议和态度。
我们认为，只有在执行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使帝国主义者的目的破产，从而满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最后，我們向黨員发出一个号召。

我們业已指出，政治局在所有根本問題上都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极为严重的局势使先进的劳动者——共产党人——感到痛心。

政治局所抱的态度严重地损害了我們的党，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我国整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

約瑟夫·雅克莫特和儒利安·拉奥的党的共产党人，一定会勇敢地面对当前的考验的。击败我們党内的修正主义并赋予我党以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線的斗争，无疑是艰苦的。

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排除一切困难而取得胜利。

約瑟夫·雅克莫特曾經說过：
“必須作出抉择：是完全与有产者站在一起，还是完全与被剥削者站在一起。”
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63年3月1日完稿）
第二部分

社会革命党, 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章修改草案
1963年1月份的《红旗报》上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比利时共产党党章修改草案。文件的开头是首书记雷纳·贝鲁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这是中央委员会为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第一个文件。

手法是很巧妙的。的确，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新的第一条是新改良主义的真正原则声明。党的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者希望，这个总纲领会获得全党的赞同。这样，他们过去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就可能在“理论”上得到掩护。而他们的修正主义论点这时也就成了对新党章的具体执行。

继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和组织被指控为“反党”。

此外，其它各条的修改表明了篡党要使凭借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党的活动方面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取得“合法化”。

一、一个修正主义的总纲领

我们把中央委员会为准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条的新提法全文刊载如下。

“比利时共产党是劳动人民有组织的、战斗的联盟。他们承认，必须把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作为保证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物质与精神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比利时共产党要求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城乡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工人阶级周围，向着这些目标前进，并实现它们。

“比利时共产党在它整个的活动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吸取比利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教训和经验。它在此基础上，根据比利时国内和国际上斗争发展的条件，制订它的政策，并严格执行之。

“比利时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正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贡献。它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为保证人类能得到他们所渴望的一切方面的幸福而进行经常的斗争。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进步的规模，这种幸福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在争取人类幸福的斗争中，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比利时共产党的中心目标。维护和平是走向进步的条件。

“维护和平，争取和平共处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斗争，同大垄断組織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活动相抵触。

“走向社会主义要通过监督与缩小大垄断組織的权利的斗争。它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改革，这类结构改革将构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阶段。

“比利时共产党认为，联合受垄断組織势力威胁的整个力量，组成一个反垄断阵线的条件是存在的。它把致力于这个阵线的组成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准备同其它进步的政党与組織结成持久的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实现限制与监督垄断組織权力的结构改革，通过扩大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力，以保卫和平，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条件。”
二、是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对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条的批判）

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党章修改草案的第一点批判，也是最根本的批判，是关于第一条的政治内容。

同原来的条文相比，新的第一条取消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概念。

它还取消了“比利时共产党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的步骤——作为自己的目标”。

把党规定为“劳动人民有组织的、战斗的联盟，他们承认，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而不是把它规定为工人阶级为实现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所必需的先锋队。党章一开始就否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

第一条似作为一个原则性的声明。然而它却对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字不提。

这当然有它的原因。新的第一条写道：

“走向社会主义要通过监督与缩小大垄断组织的权力的斗争。它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改革，这类结构改革将构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

这个说法在第一条的末尾再次谈到了，并且谈得更加清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比利时共产党）准备同其它进步的政党与组织结成持久的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实现限制与监督垄断组织权力的结构改革，通过扩大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力，以保卫和平，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条件。”

145
这样，被塞入党章中的不是社会革命党的领导，而是社会改良民主党的领导。

党章的说明报告证实这个方针。

因此，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的第一条是不能接受的。

领导机构要党抛弃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抛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胜利的最终目标，它想把党的目标引向保卫和和平，实现社会改良，放弃引导工人阶级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坚定、自觉的意志。这样作是要取消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理论教导我们，而且实践也证明，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抛弃彻底的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会导致无法再正确有效地进行保卫和平、争取改革的斗争。

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批评意见，我们认为，以党章《绪论》的形式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宣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纲领，同党章第一条中阐明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总纲领对照比较一下是必要的。

三、党章绪论（我们的草案）或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内
团结不可缺少的基础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是今后人类和各民族发展中一个不堪容忍的障碍。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本性是它自己无法克服的、深重矛盾的基础。
帝国主义本性的基本特征——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经常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是：
——小撮财政资本寡头垄断着基本生产手段；
——千方百计地寻求最高利润；
——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
——生产无政府状态；
——发展的不等和不平衡；
——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总危机和周期危机；
——凶恶的军国主义发展成为侵略战争的阵地；
——几乎整个人类生存没有保障；
——寄生衰落和生产力与物质财富的浪费；
——精神和道德的堕落；
——民族压迫，兼并倾向，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资产阶级国家作用的加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这样，帝国主义一方面创造着自身灭亡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创造着利用这些条件摧毁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以及无产阶级的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所有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灾难性的不幸后果痛苦的人们，总之，几乎全体人民。

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社会分成阶级的现象。
换句話說，共产主义社会将同时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切方面与一切形式。人类将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整个力量用于同自然进行斗争，用于发展和加强人类自身的集体威力。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兄弟般友爱的组合，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再也不会遇到社会的限制。社会生产将按照一项总的计划自觉地、协调地发展，以便满足社会和社会上的每个成员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需要。

这个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在实现了对剥削者的剥夺之后——一切生产资料成为整个社会所有，其特征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永远消灭一切战争的社会根源和民族根源。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当个人服从劳动分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之后，当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人们对不可少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人的多面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之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将滚滚而来，到那时候，真正完全的民主将成为习惯，国家将消灭，社会的大旗将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回避的胜利

抉择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要么灾难，要么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因为不存在可能改良的资本主义。

抉择只能是：要么是带来周期灾难的资本主义，要么进行社会主义解放革命。
总而言之，反对其果是不够的，必须打击其因。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两者都是历史必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阶级，更广泛地说，劳动人民，将会找到道路，会确定取得胜利的办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开辟必经之路，确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创造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斗争取得胜利所需的主观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根本不是建立在某个世界改革者臆想或发明出来的理想与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是现存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的总的反映。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说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

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其性质来说，是国际性的，只在形式上，是民族性的。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思想、经济和政治两条战线上进行着。

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垄断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它建立一种“秩序”，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并使之更坚固，以便缓和阶级冲突。

国家施加于劳动群众的巨大压迫——这个国家越来越同强
大的壟斷集團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正日益明顯地表露出来。

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一種制度，國家的代表機關和選舉原則只是一些裝飾品。在資產階級議會中，人民的意志遭到踐踏。

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和斗争形式，取決於反動派對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麼程度，取決於這些反動派對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某一或那一階段是否使用暴力。

勞動人民希望社會主義革命用和平的方法進行。但是，這種前景只有在人民隨時准备回击資產階級的暴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用哪一種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實可能性，由每個國家的具体歷史條件所決定。

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在每個國家奪取政权；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

這就是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聯合勞動人民的其它階層，也即是說，建立最完全的民主，過去任何民主都不能與之相比擬的民主，這種民主是對勞動人民的，由勞動人民享受，對國內外反革命的企圖則實行鎮壓。

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即國家—公社，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組成領導階級。

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機關將是執行機關，同時又是立法的機關，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意志的代表機關。

在这种情況下，議會——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這是由于議會制的緣故——可能變成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工具，從而改變其內容。
工人阶级政权结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民族彻底解放，社会成分阶级的现象消失，从而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政府将从事事务管理和生产活动的领导。

那时候，国家本身将会消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表明，工人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一个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充满战斗力的、战斗的先锋队，把工人阶级和人民中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起来，根据时间和地点的具体与特殊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这个党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

它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它支持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支持世界上的任何劳动者与人民为人类进步所作的努力。

共产党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并参与群众经常的与当前的斗争，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争取恢复、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争取有利于群众的、削弱垄断资产阶级，即削弱帝国主义的改革；保卫和加强群众的胜利果实；争取劳动者之间相互团结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以便提高人民的觉悟，实现最终目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

各国共产党保卫整个工人运动和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把它放在前头并使之更臻完备。
通过共产党人这种自觉的活动，同劳动人民其它组织相比起来说，它将实现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最高形式的职能。

为了获得必要的认识和经验，为了教育并提高群众的觉悟，党必须经常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

共产党及其党员必须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克服缺点和错误，达到教育自己，教育人民的目的。

共产党重视维护自己的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它在制订政策时以国家的具体情况作为出发点。

共产党反对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渗入它的队伍中来；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由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权利平等的。

每个党对工人阶级负责，对本国的劳动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负责。每个党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具体实践。

比利时共产党

比利时共产党是在1921年，由以约瑟夫・雅克莫特为首的先进的劳动人民的联合，在比利时和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在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它们曾使比利时工人党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导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比利时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驱逐国家的占领者，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劳动人民的权利要求等一系列伟大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比利时共产党曾经通过下列活动和斗争起了这个作用。他们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揭露工人运动中的投降派和改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影响，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争取工人阶级战斗的团结和全体劳动人民行动的联合。

我們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我們时代的基本内容，是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們的时代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制度消亡的时代，是新兴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大大促成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在苏联，确定了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目标。

其它一些国家的人民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有利于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相互支援，相互帮助。
社会主义国家为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反革命输出，坚决反对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揭露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卑劣的诽谤，按照他们的说法，共产党人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需要输出革命。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取得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支持并帮助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国际斗争的利益，为了推翻世界上一切资本家而忍受最大的牺牲。

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加强，促使殖民奴役制度崩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战斗力的壮大，造成了新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为局部的日常斗争和打倒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斗争开辟新的可能条件。

战争不是注定的。今天，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一切反对战争的国家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世界战争是能够防止的。

已经把人类卷入两次战争浩劫的帝国主义是今天另一次更可怕的灾难的威胁。美帝国主义是主要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西德帝国主义对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正在加重。

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正在增加。比利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损害国家主权，威胁我们的生存。

和平也不是注定的。

为和平而斗争，就是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动员群众，实现最广泛的联盟，反对战争贩子，反对
军国主义和军备负担，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就是强调指出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指出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束缚帝国主义和削弱其手段的可能性；就是有效地声援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就是准备通过群众斗争坚决反击帝国主义者及其同谋者的任何侵略行动。

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殖民奴役制度趋于崩溃，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它仅次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对这个运动的国际支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特别重要的责任。

如果团结工人阶级，实现奋斗目标基础上的最广泛的联盟，孤立反动的力量，开展有效行动，把主要打击指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及其政权的话，那么，进行争取满足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当前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斗争的更大可能条件和争取满足有利于他们的改革的斗争的更大可能条件同样是存在的。共产党为保卫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反动派的进攻和一切法西斯化的企图而斗争。

所有这些战线上上的斗争都是必要的。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斗争都不仅单独代替其它斗争，也不能否定其它斗争。它们必须相互支持。

只有通过所有这些斗争，群众才能准备决定性的战斗，才能形成推翻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

共产党不依附于隐瞒自己的见解和计划。在我们时代，党的活动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比利时的劳动人民所希望的和他们将要作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四、民主集中制，还是官僚集中制

我們現在對中央委員會制訂的黨章修改草案提出第二點批評。這實際上是關於党的活動的概念。

自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实践越来越表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也追随他的作法）往往用官僚集中的观点代表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准则，甚至党章条文，都遭到了破坏。

领导机构的政治观点同它的組織活动的实践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是工人阶级的組織，特别是共产党的組織的话，那么，当领导机构的政治观点滑向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去的时候，这些观点就必定同阶级斗争的日常实践相抵触，同党的成员的生活经验相抵触。

在这种矛盾面前，希望維持其錯誤路線的領導机构，不願作自我批评，以行政的、反民主的和官僚主义的措施，对待党员和党的組織。

这是党在1945—1954年期间非常熟悉的现象。一会儿实行右倾机会主义，一会儿又实行“左”倾机会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越来越陷入反民主的、甚至专制独裁的行动。

1954年的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开展了谴责当时占优势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也开展了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官僚集中制为基础的，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的斗争。

現行的党章就是出自这次代表大会的，它标志这方面的严肃努力。对这个党章的修改，只有在有新的改进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
工人战士們非常了解，在各組織中实行民主的人，不一定是談論民主最多的人。

如果實踐是反民主的話，那麼，關於民主的談論只能是高談闊論和掩盖事實的煙幕，而不能是別的。

當由于錯誤的觀點、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和對民主集中制的破壞等所引起的危險是領導機關的行為造成的時候，這種危險就特別嚴重，因為那會給黨帶來損害。

**

雷納·貝倫在他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把他对党的活动的看法作了如下表述，

“关于这点，有必要說明，當各級組織的黨員向下級提出一些以后要經他們所屬組織的最高一級討論的問題時，他們這樣作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他們錯了，他們勢必要回到可能已經被他們說服了的同志面前，‘糾正他們提出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誰会否认我們的經常定期的选举制度為黨員提供选举由最好的黨員組成的各級領導机关的可能性呢? 因此，當有重要問題要提出的時候，自然要向人們所屬的最高組織提出，因為，只有在那一級, 問題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討論。

“我們认为，在比利时社会党内和其它党内, 流行着不同的作法是有它的理由的, 因为在这些党内, 反对事实上的終身‘教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在我們党内，這些不同作法就没有理由了。

“只有下述这类领导人才会奉行社会党的那种作法。这类领导人与其說喜歡同他們的‘同級’忠实地进行意見交锋，不如說他們更喜欢在曾經投票选举他們的同志面前滥用其威信。”

157
这样，党的同志对于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在关于领导人同党的关系，特别是同党的基层的关系方面的错误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这种观点是，在“最阶级”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不能向基层提出问题，他们不应该使自己有可能处于在基层面前“纠正他们提出的问题”的境地。可以这样说，由于他们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人，所以他们就应当表现成那样。

讨论只应该在“同级”之间进行。否则，要是同基层讨论的话，这就是“降低身份”。

雷纳·贝伦所主张的这样一种态度恰恰是人们对自称要谴责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一种不容置疑的教条主义更加恶化了；对这一点有谁能看不到呢？

这样一种态度导致一个闭塞的领导集团的形成。

与此相反，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党政党不但注意来自领导机关对基层的监督和意见，而且还注意来自基层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和意见。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政党注意到，制订、贯彻和检查党的路线不仅是几个领导机关的事情，而且也是全党的事情。它不仅把每个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立场提交“同级”审议，而且也提交全党审议，定期同全党商量，向全党报告实在的情况。因此，党可以在掌握情况下发表意见。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还注意到，基层的创造性活动和批评是要受到鼓励的，而不是受到责难的。

党在行动上的和为了行动的统一与政治团结的条件是：

（1）党的整个活动和政策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指导的；

（2）党的活动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且是以民主集
中制为基础的。

雷纳・贝伦和政治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先锋党的实践，同时也反对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准则和民主集中制。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作法是不会令人惊奇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装作一些表面上民主的条文——正如人们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中经常碰到的那样——然而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规定实行这些条文的方法。这种作法的目的是：使“同级”高于党的活动准则“之上”。

当一些同志想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使大家，包括领导机构，尊重这些准则的时候，于是便被无中生有地指控为进行“分裂活动”。

政治局似乎有权继续进行分裂活动，似乎有权不断进行修正主义的横行霸道的活动和对同志进行诽谤；而党，党员及党的组织似乎只有说“同意”的权利。

我们现在已经从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对党章的一处修改中，举出一个违反党员最起码的权利的、有意义的例子来。过去的党章第五条所定：“每当对党员作出决定时，党员本人有权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

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新第五条中，这个保证不见了，而代之以：“有权以个人身份参加任何对其活动和行为提出疑问的讨论。”

而参加这种讨论也只是：“在他所在的党组织的大会上，在他所属的党的机关中，在他定期参加的或定期作为代表出席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上。”
总之，党的领导“慷慨地”给予党员以参加他所在的组织中的讨论的权利。

很清楚，任何他不参加其中的委员会不但可以对他的活动和行为提出怀疑，而且甚至可以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对他作出决定！

修正主义的政治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谈论是很多的，但是，这是为了掩盖官僚集中制的观点，为了掩盖政治局集团活动的完全专制的实践。

我们必须保卫并为劳动人民说明真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原则。所以我们提出党章中的一条条交来（我们建议中的第六条），这一条是：

“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党的活动的具体方式应该尊重这个原则。

“民主集中制要求：

“1）所有党的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是选举产生的机关；

“2）党的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收集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3）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定期对它所领导的组织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任何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定期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活动报告。

“如果在活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党的领导机关作出决定的问题，那就必须坚持向上级机关提出来，并要求作出答复；

“6）各级党的领导实行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160
“(6) 各级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监督党的决定的贯彻执行；
“(7) 上级机关的决定对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带有强制性；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
“(8) 遵守第一条和第二、四、五各条的内容。”
(第一条规定共产党的性质；第二条：“谁能当党员”；第四条：“党员的义务”；第五条：“党员的权利”。)

关于我们的党章草案，政治局说，它“表现出了一种以根本不同的方向同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相对抗的意志，表现出了一种要使另外一条政治路线胜利的意志”（1963年3月1日《红旗报》）。

由于政治局如此地攻击我们的《绪论》中已经提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它事实上承认企图把一条与这些原则根本对立的路线强加于党。

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党章草案的目的在于要把比利时共产党由社会革命党改造成为一个受官僚集中制和修正主义领导机构专制统治的社会改良民主党。

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争取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准则从事活动的共产党而斗争。
第三部分

愈来愈深地陷入修正主义

从政治局的暴力行为到它的制造分裂的阴谋手段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及其后果
一、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手法

现在党的某些活动方式与组织方法是与修正主义的政治内容相适应的，是与作为一个先锋队的党的列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

修正主义者对党采取的“战略”如下：篡夺领导机构，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斗性上瓦解党，采取置之于既成事实面前的策略，以便强制实行日益修正主义的政策，最后达到完全专断，以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

这是历来改良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段。

一个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

现今的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4年夏季。当时，在大多数党的干部都要求终止独断独行，要求恢复民主集中制，要求肃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个宗派主义集团却从中破坏，以此来夸耀。

该集团从来没有真正想要肃清专断的方法，对于1954年以前所犯的政治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检讨一番。该宗派主义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当时都属于上届领导机构，他们不止一次地与“左”倾机会主义者狼狈为奸，向一贯维护革命立场的同志展开进攻。这就是1954年比共第十一届代表大前几个月，比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随后几年的情况。

该集团对党采取两面派手法，掩盖了自己的真正意图。

该集团长期以来秘密地进行着瓦解和消灭党的活动，使党
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这个宗派集团，特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竟明目张胆地宣扬自己的政策。

**既成事实**

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遵循着同一个策略。某某领导人的一席演说、一篇文章，或者政治局的一份“公报”，竟公然决定着一种政治立场，领导机构就把这种立场当作党的“路线”，哪怕它与代表大会决议、与前几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与国际决议相对立也在所不计。

事后，中央委员会则要影射地或明确地谴责那些反对用这种方法来“决定”“党的路线”的人。

那些没有对这种作法进行反击的中央委员，并不都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同时也应该指出，在领导机构已经公开说明这是全党的路线以后再来讨论，是一种虚伪的讨论。领导机构最终将把讨论引导到运用反民主的“信任案”的故技。

政治局在近年来的所有政治问题上，几乎都采用了修正主义者的打击手法，将中央委员会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

兹列举如下：
— 1956年匈牙利事件，
— 自 1957 年起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 1960 年 7 月刚果事件，
— 诬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 百万人大罢工，
— 税收改革，
— 制定社会纲领，
— 反罢工草案，
——语言学草案，
——中印边界冲突，
——“加勒比危机”，
——支持肯尼迪和斯巴克。

这种置人于既成事实面前的作法，也是符合蓄意分裂的企图的，因为，政治局在一味发展修正主义主张，千方百计想把修正主义主张强加于人，把那些拒不在他们的专横行为面前无条件屈服的人说成“反党”分子，说成是“宗派主义者”。

对政治局来说，为了达到修正主义的目的，用最无耻的手段也是在所不惜的。

要么在指挥棒下完全地、无条件地屈从于修正主义教条，要么辞职，这就是政治局想强加于人的东西。

**修正主义者的政治讨论**

《红旗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作是“打进核心的破坏分子”，“宗派主义分子”，“破坏党章分子”，“分裂主义者”……，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这些形容词用在政治局身上倒是恰如其分的。

党的领导机构所以提出这一连串的“指控”，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真正的政治辩论。

他们认为，党员应该只是普普通通的执行者。在党内哪怕简单的了解情况也是遭到禁止和应予取缔的。八个月来，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连一次介绍情况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

一名党员可以收到社会党、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的报刊，但是却禁止他收到和看到其他委会的政治讨论的文件。

我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党的组织、机构和党员应该了解党的活动、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最全面的情况”，修正主义者
則把這種說法看成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與党的合法性決裂”。

政治局極其注意禁止了解情況。根據這些標準而策畫的兩次《論壇》（1963年1至3月的《論壇》和1963年2至4月為籌備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而著的《論壇》）算是一出滑稽戲。

1963年4月10日《红旗報》也承認，“委員會（《論壇》的主持者）认为，對於它所收到的某些文章不應予以发表”，也就是說，正是這些文章揭露了修正主義，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

即便寥寥地發表幾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也要伴隨著評論、解釋和無遮掩護。

對於这些东西的答复却未見发表。

1932年罷工以后被工人營救出獄的党的締造者亨利・格利納同志，被政治局的說謊家在报刊上誹謗地加上了“造謠”的罪名，讀者甚至無法知道“造謠”了甚麼“謠”，因為那篇文章是在被檢查後刪去了。

領導機構中修正主義分子的行為好似教士一樣，用他們的代表之一動米・吉利斯的話來說，他們把“政黨一制度”視為“宗教”。

他們不僅不让了解我們黨的許多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而且連某些兄弟党的文件也是橫遭禁止的。

《红旗報》的讀者始終期望能了解到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朝鮮勞動党和越南勞動黨的文件的確切文本。相反，《红旗報》讀者所“獲得”的關於中印邊界衝突的“新聞”，來自印度反動資產階級，讀者“有權”得悉的是不附任何評論的鐵托的反共報告（見1963年5月20日《红旗報》）。

《红旗報》在4月22日列寧誕辰節保持緘默，同時卻用大量
篇幅报道若望二十三世的荒诞言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遭到排斥，斯巴克的许多言论却受到推崇。

在政治局看来，修正主义就是党的政治“路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算共产党人。

分裂主义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政治局的分裂勾当不仅表现在对待比利时共产党上，而且也表现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

政治局站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尤其是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履行具体的义务时，诸如匈牙利事件、刚果事件、古巴事件和中印边境冲突等，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

政治局在国际上进行分裂勾当始于1961年底公开对兄弟党进行诬蔑，这种诬蔑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所发展的就不单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立场，而是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殖民主义，与最不结面的反共产主义，它事实上反对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虽然它不敢明说，实际上是从采取了种族主义。

政治局在1962年2月22日的《红旗报》上攻击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从而使自己声名狼藉，它否认了过去它曾虚伪地赞同的东西。

政治局就这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态度。

党员的真正党纪在于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于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付诸实践，在于遵守并贯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并于必要时，反对
党的领导的阴谋活动和倒行逆施行为。

修正主义者的恐慌和“四人”的被开除

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三十六小时，德洛涅、格里巴、马索兹和兰多尔夫等同志才接到通知说，关于开除他们一事已在进行。

这个建议毫无道理可言，而是基于他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上诉。

按照党章的规定，根据党正常生活的起码的准则，建议开除某人须经各当事人所属基层组织加以研究，但这一步根本无法做到，这些组织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

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取消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布鲁塞尔代表团如下的任务：鉴于他们持“反党章的态度，进行宗派活动以及图谋以同样方法继续进行这种活动”，乃提请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他们开除出党。由于党的领导机构的阴谋活动，该代表团是由修正主义分子组成的。这个阴谋活动是背着这四位当事人进行的，代表团没有听取他们的申诉。

在安特卫普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四名遭到“开除”威胁的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党员被禁止进入代表大会会场，反之，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的记者却接到了邀请。

这四位同志多次请求代表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是格里巴同志，他于4月13日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向大会主席团寄去了一下面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准许我参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全部讨论和大会工作，并将我此请国求自大会开幕时起提交代表大会。“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的请求是正当的：

170
“1. 我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我需要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负责。

“2. 根据现行党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并且按照法定时间，我已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反对将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认为，政策局所持的反面意见及党中央委员会似乎也重弹这些反面意见是错误的。

“3. 范·吉伊同志在1963年4月5日的《红旗报》上提出了‘他们是否真想让代表大会听取自己的意见’的问题。

“这个问题特别地针对我提出来的，因此我请求能使人听到我的意见，借以答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4. 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我受到了名的人身攻击，在《红旗报》上刊载的许多篇文件和文章中我也受到了名的人身攻击。在几乎每天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论坛》上更是如此。毫无疑问，代表大会期间也会如此。根据现行党章第五条的规定，我认为有权亲自参加这些讨论。

“5. 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在4月11日晚间会议时，即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三十六小时，正式提出开除一事，其他三位同志，莫里斯·德洛涅，莫里斯·马索兹和雷纳·兰多尔夫也同样提出被开除。

“我呼吁全国代表大会反对这种作法。

“显然，如果地区委员会请求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除，是对党章的精神与条文的肆意破坏。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雅克·格里巴(签名)”

下午四时许，格里巴同志再度提出自己的请求。六时半，他接到了如下的一封复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研究了你希望参加代表大会并
在会上发言的请求。主席团决定驳回你的请求。

此致
敬礼

阿·德贾宁克（签名）”

此外，这四位同志还请求主席团向大会代表散发一个概括了他们立场的文件，也是毫无所获。

面对这一系列蓄意封锁消息的作法，这四位同志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余名党员的帮助下，于4月14日星期日大会代表步出会场时，向他们散发了上述文件。

这也说明，所谓在“大庭广众”之下散发这个文件是个决定性的进攻信号的指控，是多么虚伪，多么荒唐啊！

请看，政治局是怎样出其不意地使代表大会通过“开除”布鲁塞尔这四位同志的，

——未听取被告意见，被告甚至没有正式目睹代表大会上犯下的这个打击罪行；

——被告所属的基层组织事先未被征求意见，甚至不知此事，

——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开除”中成了初审和终审的机构，没有上诉的可能，而实际上全国代表大会应是审理对开除提出的申诉的组织；

——破坏了党章所规定的关于开除的期限与手续的条文与精神；按照党章规定，开除须同时经基层组织与地区委员会的同意，否则中央委员会则需在基层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因为被开除者仍然有权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申诉。

人们很少看到这样层出不穷的不能容忍的反党章的作法。不仅这四位同志是这种作法的牺牲品，而且全党都在遭受着在整个运面前暴露而耻到这种地步的领导机构的专断之苦。
党的领导机构的分裂活动与日俱增

布鲁塞尔地区的党员们听到这个打击后，反应异常强烈。该地区的许多组织都认为开除这四位同志是无效的，并纷纷要求举行一次地区特别代表大会。

早在4月30日，这些组织已被地区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按照党章的规定，地区特别代表大会需于5月份举行。但是，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不仅企图向该地区的其他组织掩盖这一要求，而且宣布这一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种再度破坏党的行为，曾经要求举行地区特别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共推举四十二名代表，于5月10日举行了会议，组成了地区特别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共同声明。声明要点如下，

“签署人于1963年5月10日在“铁路工人”党委政治书记维利·德·瓦艾勒同志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注意到：地区领导机构（书记处及地区委员会）不顾许多机构的极力请求，竟悍然拒绝。

“1. 考虑上述机构作出的关于安特卫普代表大会采取反对德洛涅、格里巴、马索兹和兰多尔夫等四名布鲁塞尔地区的反党章、反民主的措施的决意。

…………

“此外，签署人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得知，党章规定的召开一次地区特别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自1963年4月30日起已经达到。本地区赞成召开地区特别代表大会的人数已超过全体的三分之一。

“为弥补地区领导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职，下述签署人兹决定：

“1. 根据党章的要求，自己组成布鲁塞尔地区特别代表大会
組織委員會；

“2. 于 1983 年 6 月在布魯塞爾召開上述代表大会，市党委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者选代表一人，組成各市委的代表团。”

5 月 16 日，在“組織委員会”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有四十二位干部出席的干部会议，这是近年来地区委员会举行的出席人数最多、最热烈的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出席 1983 年 5 月 16 日在莫倫貝克市委书记韦斯·莫倫
努主持下的干部会议的四十二名干部，在听取并討論了罗
歇·範·根同志代表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組織委員会所作的报告
之后，

“发现，此次干部会议是布魯塞尔地区最近几年来出席人数
最多的一次会议，

“确：地区领导机构的失职，六个月来，特别是从 3 月 15
日地区代表大会以来，也沒有举行干部会议或报告会，系统地
忽视向本地區党员提供情况；

“通过，以組織委員会名义所作的报告，

“指出，赞同1983年5月10日赞成召开一次地区特別代表大
会的各市委政治书记和市委以及其他組織通过的‘共同声明’，

“向所有关心党的领导的共产党人发出紧急呼吁；呼吁你们
坚决行动起来，以求终止党的机器以及某些屈从于党的机器的
干部的反党章的专断的作法；

“表示绝对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决定贯彻八十一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决心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百四十二名出席者，除一名案权、四位同志
未参加表决外，全体一致通过”

目前，领导机构想要求每个組織和每个党员，无论过去、现
在将来，都赞同自己的修正主义政策和独断独行的行为。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并重申坚决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战士的人愈来愈多了。布鲁塞尔的绝大多数党的干部都是这样。

在其他地区委员会中，长期以来党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良景象，随着政治局所执行的“路线”和作法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后果，变成了日益增长的不安。

政治局则以层出不穷的分裂主义的专断行为来进行反击。
直到本书付印时，他们所作的上述行为已经有多项。
——“撤消”于克勒常委、埃特贝克常委和沙尔贝克常委的市委会和大学生支部，“解除”铁路工人党委政治书記的职务；
——解散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干部党委的全体大会；
——“停止”埃特贝克共青团三名青年的团籍“六个月”；
——将圣吉尔市委的十三位同志“排除出党”；
——“拒绝”把共产主义大学生支部的三位书记“看作是党员”；
——“无视”德罗让博市委会的存在；
——一般说来，以“开除”来威胁一切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谴责政治局独断独行措施的人。

正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局所吹嘘的“更新”，主要表现在发明了一整套新词汇来修饰自己的分裂措施。

所有这些所谓“制裁”，对于热情开展自己活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员和组织来说，都是无效的。受到这种或那种“决议”制裁的同志的人数达到这种地步，以至在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中修正主义分子自己陷于孤立，事实上是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地区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5月20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一项公报。

公报说：

“中央委员会请注意：根据党章第二条的规定，比利时共产党自由地接纳‘一切接受其纲领、章程和决议的人’，今后凡属支持开除四人的分裂勾当的人，不能再视为属于共产党。”

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伯内尔、特尔夫、布鲁姆集团及其党羽，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了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党章，奉行着修正主义和专制的作法，并进行威胁说：

“你承认这就是党的纲领和准则吗?”

“你答应谴责那些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站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立场上的遵守民主集中制而斗争的同志吗?”

“如果你不答应，你就不能被看作是党员。”

党员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会对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个最后通牒给以应有的回答的。这样修正主义者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竖起白旗，投降，叛变，自己把手束缚起来。

修正主义者绝对不能再比利时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

......

政治局所持的态度多么令人想起1920至1921年间，社会民主党人对约瑟夫·雅克莫特及团结在《被剥削者》杂志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态度啊！

我们还记得约瑟夫·雅克莫特曾代表出席1920年12月11日至12日比利时工人党限制性特别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团，所宣读的如下声明，

“我们过去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运动的最高利益为依据的，始终是以比利时的社会党的团
結和执行我党的国内、国际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展社会革命行动为依据的。

“我们在不断地为了比利时工人运动内部执行并将继续遵循唯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策略而进行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所有阵地上反对资产阶级，不妥协，也不谅解。决議起草委员会多数派提交議案，极共严重地损害了少数派的行动自由。我们认为該項議案使我們无法在比利时工人党内进行社会主义活动。

“我们声明：我們把通过此项議案看作是一项开除措施。我們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我們的观点得到了国内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支持，尤其是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作出一项规定，确保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享有必要的、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

“只有通过此项議案才能使我們完全自由地，正規地继续在党内进行我們的活动。值此庄严的时刻，我們提请目前支持起草委员会动議的人密切注意他們所承担的沉重責任。

“他們应就此問題作出决定。

“我們方面已尽了一切努力避免分裂，分裂的责任应由他們来承担。”

在当前的情况下，党员們无论現在或将来都会向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及其代表提出下列問題。

——“你們是否答应遵守并貫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呢？

——“如果不答应，我們就沒有必要和你們进行討論，共产党内沒有你們的地位。

——“如果答应，那么，为表示你們的誠意，则应正式地、无保留地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谴责政治局，谴责政治局的思想和实践，谴责它对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各兄弟党进
行的攻击。你們應該宣布，你們開除並採取反黨國措施反對忠
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是無效的。

“如果你們拒不這樣作，由此而表明你們的兩面手法，我們
也就沒有必要對修正主義宗派分子提出的警告，作出回答。”

那时，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会坚决地坚持自己的原則。
他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开展战斗活动；
为目前的权利要求，为維护遭到威胁的民主权利，為保卫和平、
反对世界大战危险，为反对以世界主要的侵略和战争力量——
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資本帝国主义，剥削者和战争贩子，为反对我
国的托拉斯、壟断資本和控股公司，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社会
主义革命，而进行斗争。

他們将为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們党的主要危险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争取遵守和
贯彻十八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为維护并加强我們党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进行不
调和的斗争。

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与政治局
相互支持

我們曾經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这种相互勾結是多么公开，
多么为众人所知呀！近来这种勾結又进一步加强了。
1963年8月16日，《人民报》以《左派的錯誤》为题，利用
《红旗报》上刊载的一篇署名让・杜波施的文章来反对社会党左
派。《人民报》把让・杜波施看作是新改良主义者，並作如下評
論：“当一个共产党人提出真理时，我們就赞同他。”
1963年4月17日，《人民报》以《派系权》为题，夸奖般地引
了一段伯内尔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企图把社会党右派的立论“辩护”。

1963年5月9日《人民报》的一篇题为《右派和左派》的社论，再次对社会党左翼发起攻击。这篇社论明确地、公然地重申社会党属于“改良社会主义”，反对它所谓的“已过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且随即指出：“俄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十分了解这一点，它为其他国家共产党非常及时地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行动和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行动作了区别，并且为发达国家表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党的传统的改良主义者和自命为共产党人的新改良主义者，都利用了苏共二十大的某些方面，并作了同样的解释。

社会党主席列奥·科拉尔，在总题为《改良主义与革命》的三篇文章中（见5月15、16、17三日的《人民报》），重申了传统的改良主义观点。《人民报》上进行的这场论战的重要性和恰恰表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面对着劳动群众日益强大的潮流，不得不加强他们维护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

比共领导机构对此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比共主席伯内尔在5月29日《红旗报》上的一篇题为《真正的两段论法》的社论中，拒绝在思想意识上和“学说上”进行论战，他说：“……列奥·科拉尔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我认为这很可惜……”。

继而又进一步指出：“两段论法不是在改良主义与革命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总之，伯内尔不反对科拉尔和其他社会党右派的改良主义，
只是对科拉尔所提出的辩解性的论据提出异议，并代之以新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

但是，不幸，对于改良主义说来，其表现没有比科拉尔的表现更具有说服力了。

伯内尔说：“真正的两段论法如下：要么左派力量（包括天主教劳动者）采取统一行动，要么反对派获胜”。

统一行动的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统一行动呢？

按照上述说法，仿佛劳动人民要想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战争危险、对民主自由及生活水平的威胁——的真正胜利而搞统一行动，并不需要提出论据来揭露改良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似的。

伯内尔走得更远。伯内尔文章批评的锋芒指向“社会党左派”，实际上是指向企图从改良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党劳动者。他写道，

“请允许我在这里批评一下社会党左派。实在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左派的许多分子对于开展行动想得不够，而且隐居在学说中，无视统一斗争的必要性。”

科拉尔说过，“讨论是劳而无功的”，伯内尔也随声附合。

所有这些谬论都无法掩盖真理。

在反对新殖民主义和传统改良主义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劳动者的推动下，已经有效地展开了反对战争危险、反对比利时政府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单一法”、反对政府的税收改革、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反对反罢工法律等斗争。

政治局并不满足于支持右派反对社会党左翼的运动，而且还想造成最富战斗性的劳动者队伍的分裂。
三、第十次代表大会“路线”与实践中的修正主义

目前党内进行的政治斗争使人想起当改良主义在比利时工人党领导机构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我国工人运动所经历的那场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比利时共产党的诞生。现在进行的这场政治斗争还令人回忆起各国共产党与托派“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搏斗的时代。这些冒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最后都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了。

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因此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今天这种现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关键时期一样，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弗朗索瓦·皮佑（见1963年4月28日《人道报》）竟干预我们的党务，公开支持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分裂行动，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无原则的小集团”的活动！

在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中，这个小集团代表着绝大多数干部！

说我们是“无原则”吗？我们的读者自会作出判断的。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弗朗索瓦·皮佑倒是与共产共政治局的修正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

瓦德克·罗歇在1963年5月9日的《人道报》上，再次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公开进攻，因为中国共产党犯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大罪”。瓦德克·罗歇是以曲解《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来开始“阐述”问题的。

要维护修正主义立场，势必要使用不光明磊落的手法。

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修正主义的书记处当然迫不及待地广泛传播了这篇讲话。
修正主义者是否认为可以通过粗暴的阴谋活动和诽谤，就
能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同样，他们还妄想消灭阶级斗争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都接受修正主义者的挑战，每次都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胜利，变得更加巩固。

关于伯内尔在比利时共产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这篇演说，是关于那些早已熟知的、前面已经揭发了的修正
主义观点的一篇毫不精采的文章而已。

但我们更应指出伯内尔的一个极其无耻的诽谤。他说：“
“他们（指党内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还散布反
苏的谎言，趁去秋加勒比海那样严重事件的机会，干下了转移视听
的勾当”。

反苏的谎言！真是贼喊“捉贼”。只有在斗争中和行动中才
能看出当苏联遭受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究竟谁是苏联的真正朋
友，究竟谁对伟大十月革命的国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只要追溯一下政治局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所持的
态度！

只要回忆一下政治局在1960年7月斯大林事件和关于在加
丹加停火问题上所站的立场，这种立场既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也与苏联的立场相矛盾。

我们在《红旗报》上愈来愈多地谈到这样一些文章。这些文
章的借口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批判那些实有其事的或编造
出来的过去的错误，其实这才是反苏和不折不扣的反共呢。

这丝毫也不能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惊奇，因为修
正主义者是要变成反苏反共的。

182
政治局对阿尔巴尼亚同志和中国同志的攻击，达到了最凶恶的反动派才有的那种疯狂地步。

我們有必要来談談1968年4月10日最后一期《論坛》里面的一段話（既然领导机构未对此文作任何评论，因此可以认为它是“符合政治局的路线的”）。文中說：

“我們感到遗憾的是，将来有一天要控告中国兄弟需要对由于原子战争而造成的毁灭和其他的残杀承担共同责任。但是等到这一天来临时就迟了，因为我们凭經驗知道，死者是永远不会复生的，也不会再起来高呼报仇的。”

不，不是死者要高呼报仇，而是現在活在世上的共产党人要对策划这篇文章并蓄意支持它公布出来的那些人——说得轻一点——高呼报仇的。

我們再来谈谈伯内尔的第二个誣谤：“趁加勒比海事件的机会干下了转移视线的勾当”。

这样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指控，指的是什么呢？

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同志們組織了一些示威游行，声援古巴，反对美帝挑起的战争危险。

1962年11月6日，当美国舰队不断对该岛进行军事封锁时，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再度发出声援古巴的号召。

以上简短地介绍了一下馬克思主义主义者所犯的“罪行”。

在伯内尔看来，向社会主义的古巴表示声援就是干下了“明显的转移视线的勾当”。

伯内尔根本无法反驳馬克思主义主义者进行的批判，因此
再次誇對他們，硬說他們“沒有一個論點，沒有一句口號，沒有一項行動建議”。

修正主義者甚麼時候有过一个行之有效的論點、行之有效的口號和行之有效的行動建議呢？修正主義者沒有過，原因很簡單，他們反對行動。

反之，伯內爾、特爾夫、布魯姆及追随他們的人，千方百計地压制行動建議，压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進行的斗争。

這本著作恰恰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始終站在行動的前哨的，這正是與修正主義領導人矛盾的基礎。

尤其是，布魯塞爾的同志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幾年來布魯塞爾地區委員會及所屬各党委所進行的活動正是基于這些同志的建議。這些同志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革命者，值得高兴的是，他們是地區委員會幹部真正的多數。

布魯塞爾的同志們還知道，黨領導機構和地區委員會的修正主義者一貫對行動決議和貫徹執行這些決議制造障礙。他們尤其記得，百老大罷工再次表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站在斗争、組織行動、罷工示威隊、示威的最前列的，修正主義分子是不可能到这些地方来的！

伯內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还采取了明显地支持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的立場。他說：

“我們希望與南斯拉夫同志恢复党与党的关系。我們党对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恢复这种关系感到興趣。尽管我們与南斯拉夫同志有某些思想分歧，我們絕不要忘記，他們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是革命者資本家和地主，工人階級在那里执政，他們正在建設新的南斯拉夫。”
当铁托知道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一定会首先感到惊奇的！

为便于衡量伯内尔的背弃程度起见，我们来与上述的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论断作个比较。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

再论反罢工草案

“议会通过（反罢工）草案后，党的领导机构再次把组织工人行动听命于议会辩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把组织工人行动听命于等待参议院开始辩论。

中央委员会（见1963年5月20日《红旗报》）别无良策，只是不切实际地要求“原订5月28日举行的参议院的辩论延期举行”，要求“筹备工人和工会会议，并于草案公开讨论之日召集工人和工会会议，向参议员提出抗议并决定行动计划”

在开始讨论之日（此次讨论历时三天）举行工人会议以便“决定行动计划”，这真是“最佳行动的最好办法。”

5月27日，让·布鲁姆在《红旗报》上以下面的着烂出色的看法作为他的文章的结尾，

“5月28日即原定参议院开始公开辩论之日，就在明天了！赶紧时间哪！”

这不是废话吗？

反动派对民主自由的严重打击，是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所通过的。

工人阶级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但是，只要为进一步斗争而从中汲取教训，哪怕是溃败也可以迅速地转为胜利反攻。
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态度再次对涣散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起了决定的作用。由于我们的党领导机构背弃了真正领导改良主义的实践，抛弃真正组织斗争，因此，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所措。既没有有组织的先锋队，也没有带路人。反对反罢工法的斗争没有结束，它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如果工人阶级丢掉了修正主义的和议会主义的幻想，就一定会废除这些法律。

在即将到来的日益尖锐的斗争中，非常需要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需要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党领导机构是否丢掉了自己的纲领？

让·布鲁姆在1963年5月25日的《红旗报》星期刊上宣布“共产党要展开一个寻求新政策的运动”。

这表现出修正主义领导机构的政治混乱。让·布鲁姆企图使党员认真起来，每个党员的“任务”是“销售《红旗报》、散发传单，举着旗子或标语牌，与听众进行讨论”。

讨论些什么呢？无疑要（对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要对一筹莫展的共产党提出一个‘新政策’呢？”

诚然，让·布鲁姆虽不乐意这样作，但他的话表明：举行布鲁塞尔地区特别代表大会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举行布鲁塞尔地区特别代表大会是全国特别代表大会的第一阶段，全国特别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和遵守共产党的正常党内生活法则来进行。

这样作才有可能恢复党的团结，恢复党的战斗力，恢复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能力。
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对西班牙贵族
进行的“有效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认为应该参加比利时君主政体复兴运动的一个事件，即参加宫廷里举办的一次“花园酒会”。

原定“向议员请愿的作法”被“有利”的递交“纲领书”的办法代替了。在这纲领书中我们看到共青团请求国王，

“运用您对佛朗哥将军政府的声威，运用您与西班牙贵族的家庭联系，并以比利时人民和人权的名义要求放免政治犯并给予西班牙人民民主权利”。

如果对《红旗报》所说的派遣请愿团到议员家中去一事所作一个解释，那么递交纲领书无疑是“青年工人过去所缺乏的一个新手段”，“一个可以使君主制度按照国家的节拍存在下去，从而展现着过去未想到的远景吧”……

共产主义青年和学生摒弃了修正主义分子这派毫无动员性的胡言乱语，力主比利时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结成联盟，以便大声援为反佛朗哥制度、争取自由而斗争的英勇的西班牙人民。

修正主义的骗局与有效进行反对
战争危险的斗争相对立

1963年5月15日《红旗报》上的杂文在引证给艾南主教的一篇“具有很高思想修养的演说”(原文如此)时，写道:“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公分母，即维护和平”。

所有的人吗? 难道包括肯尼迪、麦克纳马拉、阿登纳、斯派达尔、李奇微、蒋介石、克虏伯、温台尔家族、通用电力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们吗?

对于这篇“杂文”来说，毫无保留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战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
侵略战争的土壤”的观点，以及八十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所有这些都已经过时了，都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1963年5月17日，《红旗报》杂志上以《国王与共处》为
题，大肆赞赏地引用了（比利时）布杜安国王在伦敦中心商业区
发表的讲话，并以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如果我们将不致力于和平，那么科学上的发现可以成为我们
遭受危亡的原因。我们进行的努力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句话：大
西洋两岸西方国家的联盟合作（黑体是作者标出），与东方国家
和平共处，始终不渝地继续进行核裁军与核监督的行动。

“等待着我们的任务是巨大的，但它值得我们满怀热情地去
做。”

这段引文的结尾也就是这篇杂文的结尾。

既然如此，当然就用不着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

罗伯特·达格在1963年5月17日《红旗报》的一篇文章中，甚
为赞赏斯巴克对《消息报》发表的谈话。社论说，

“毫无疑问，保罗—亨利·斯巴克的这篇富有积极意义的讲
话给予《消息报》的支持，标志着‘政府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现在刚好为保罗—亨利·斯巴克及其同僚提供了一个机
会，即开始一个‘有利于和平共处政策’的重要阶段的机会。大臣
对《消息报》说，比利时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倡导者。

“读过这篇讲话以后是会怀着满意的心情的。如果人们看
到这篇讲话能在渥太华会议场上得到确切的伸张和发扬，那么这种
满意的心情会更大”。

渥太华会议现在已经闭幕了。

它不仅没有在缓和国际局势方面和在进行谈判以实现德
英基计划方面前进一步，也未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
条约国家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方面前进一步，而且正如《真理报》对渥太华会议所作的评论：

“西方列强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核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一步使国际问题的解决更加棘手，并在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反之，让・布鲁姆却愕然不觉最明显的事实(见1963年5月28日《红旗报》上题为《渥太华会议后，新的必要性》的文章，副标题为《转折的开端吗?》)，竟认为：

“……但是在空气中毕竟有新东西呀。

“会谈的气氛是以两股潮流间的某种正向活力为标志的：一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传统潮流，这股潮流以‘冷战’政策和恐怖的和平功能的疯狂理论为重要标志；另一股潮流，按照我们的说法，称作寻求派，这一派力图从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中得出积极的结论。保罗・亨利・斯巴克属于后一潮流。这一点表现出他尊重我国公众舆论的一切积极倾向。他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与华沙条约缔约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建立无核区进行辩护。

“值得指出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这次允许他这样作，这桩事情哪怕在一年以前都是不大能够设想出来的。

“当有人说渥太华会议揭示出国际政策方面有可能开始转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

这段引文相当长，但对于阐明我国修正主义分子的心态和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要求正确地估价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魔鬼以及他们在工运中的代理人和行动，要求揭露修正主义者散播的危险的、解除斗争的幻想。

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抛弃了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的
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把我国最广泛的群众团结到真正有效的行动中去——而代之以追随于斯巴克之流的伎诈阴谋的要求。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经提到了解放和平而斗争的纲领的梗概，所以我们就不再此处加以论述了。

反对修正主义者所要的分裂——怎么办?

党内愈来愈多的同志正在摆脱领导机构的控制，摆脱领导机构奉行的政策，而投入坚决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

他們都可以衡量得出，领导机构想把党拖入深渊，它想把政策强加于党的毒性。他们懂得，使大部分党员投身政治行动（和参加会議）的方法是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因为修正主义政策造成的是各組織的貧血与硬化。在这方面看一看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客观条件往往比国内其他地区困难，但是由于他們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鲜明，所以党组织的活动仍很頻繁，政治影响很大。

工人运动的骨干——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正在摆脱改良主义，他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改良主义的有害行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們正在寻找革命斗争的道路。

由于领导机构，奉行修正主义政策，这些先进的劳动者看不出目前的比利时共产党就是他們所渴望的革命政党。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的斗争唤起了党员和非党劳动者的
兴趣，他們正發現了或再次發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具有的不可代替的重要性。這是我國工人運動真正革新的基礎。

我們呼喚所有先進勞動者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開展自己的活動，加強我們的隊伍。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將百折不撓地繼續並擴大自己反對改良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鬥爭。

領導機構的修正主義者已經為黨和工人階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們破壞性了党的團結，今天正企圖造成党的分裂。

- 怎樣才能恢復這遭到損害的團結呢？
- 應該從政治上战胜修正主義，將修正主義從黨內根除出去。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領導機構對黨的嚴重打擊，是長期策劃的結果。

因此，目前黨員和黨的組織都要求舉行一次全國特別代表大會以彌補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造成的損失。

全國特別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應遵照黨內生活的列寧主義準則進行，保證所有黨員都能公平、全面地了解情況，組織真正的民主討論。

在各級党组织的帮助下，全國特別代表大會應制訂一個總綱，提出一些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應用於我國和國際環境的具體條件中去的觀點。

在黨目前所處的環境下，即修正主義宗派集團控制了機構、書刊和報紙的情況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注意不僅使共產黨人而是使整個勞動群眾了解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行動原則。
对工人阶级，对我国劳动人民以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负有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重视工人运动和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要站在争取权利要求，反对战争危险、争取民主自由，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最前哨，要站在一切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的最前哨。

制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目前主要奋斗目标，确定行动方式，组织行动并争取必要的同盟军，这就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党组织应尽的义务。

在我国当前具体条件下，这样一个团结与斗争的纲领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认为，在比利时将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社会与政治的权利要求总纲周围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要想全部获得这些权利要求，都需通过进行反垄断资本，反垄断资本的国家的行动。

在1950年和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期间，大多数工人在辉煌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曾使资产阶级发抖，曾使资产阶级政权动摇。

改良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代都善于巧妙地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整体感和它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行动的意志，但是他们是为了把这种意识和意志转移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补“计划”。

从近年来的各种胜利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工人阶级，必将团结一心进行斗争，忍受必要的牺牲，以实现真正有效的目标。

目前阶段，问题在于准备并组织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全部实现权利要求总纲而斗争。

这个总纲中需包括工人阶级当前物质与政治权利要求的根本
本点，诸如：
——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最低三周的工资照付休假，享受退休金的年龄降低五年；
——普遍减轻打击劳动人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中等薪资或工资和低薪资或工资平均减轻50%）；
——普遍提高，
工资、薪资和退休金，
对患病和残废的津贴费（十二万法郎以下的实际工资的80%），
普遍提高失业和“生活安全”补助金（使之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
普遍提高家庭补助（特别是对第一、二个儿童）和其他社会补助；
——免费医疗；
——对妇女和青年实行“同工同酬”原则；
——教育民主化（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采取正确使劳动人民子女享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社会措施）；
——废除反罢工法，争取获得在企业中开展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特别要争取享有在工作地点集会的权利和禁止资方迫害）；
——实行联邦制；
——停止屈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政策，清除这种政策造成的后果；
——取消在比利时的外国基地和原子武器；
——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力量；
——不增加服兵役期限；
——缩减一百亿军费开支。
許多工会和政党的代表大会都曾把这些权利要求列入自己的决议和竞选纲领。现在右派和修正主义的领导人却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束之高阁了。

现在的問題不是去无谓地列举和开列出各种各样工人目前的殷切希望。

权利要求总纲应该是一个团结整个工人阶级采取行动的纲领。

实现这些权利要求的款项从何而来呢？
应该从浪费资金的地方提取；
——从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中提取，
——从巨额收入者的逃税中提取，
——从巨额军费预算中提取。

我们希望先进的党员认召劳动者就这个权利要求总纲的切实、完整的内容进行讨论并把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短期奋斗目标，将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广大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我们希望他们促进比利时总工会从事战斗性的工会活动，促进由基层组织起来的统一行动的实现。

我们希望他们促进系统的战斗性的工会活动——这些活动既相互配合又各有不同——团结一切行业，不给资本家任何可乘之机，直到最后取得行动的胜利。

当前各工厂、各行业和区域性的权利要求斗争及反对资方和政府进攻的斗争，都是这个普遍行动发展的准备和保证。

另一方面，为这个权利要求总纲进行斗争，不仅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战斗性，而且有助于劳动群众开展其他活动，尤其有助于反对战争危险、争取和平和争取销毁热核武器的行动，有助于真正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要求的行动。
我们可以预料，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目前阶段，必将是总危机的加剧，矛盾必将增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工人运动将日益高涨，阶级斗争必将激烈起来。

我国 1960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 月期间的大罢工是将爆发的伟大斗争的先兆。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这个政党要在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需在从事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失败密切相关的。

修正主义者无法否认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企图使人相信，这个新的力量对比，会是解除斗志，投降帝国主义和抛弃行动的一个原因。

我们则要说，恰恰相反，我们应当由此而提出更有胆略的奋斗目标。

目前，世界上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我国工人运动的策略应以此现实情况为依据。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并非是超出当前现实的抽象目标和书生之见。

正是自现在起，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为自己规定，要在革命斗争中起到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项宣传任务，而且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工人阶级抵抗着资本家的进攻，应该为开展声势浩大的运动创造条件。

我们要指出，日常的斗争只触及罪恶所造成的后果，而未触及产生罪恶的根源。

我们要说明，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根本结蒂，必须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制度，消灭贫困，消灭危机，消灭战争。

通过日常与资本家冲突所记取的教训，我们应该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揭露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

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作到，把我们在人民群众当前斗争中的先进活动和不断使工人阶级准备实现最终目的结合起来。这个目的超出了现存制度的范围，危及现存制度。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不把两者结合起米，那么，不是党的失败——党变成一个宗派——就是蜕化变质，堕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行动可以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这种潜力长期以来受到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抑制。

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这个泥足巨人——即托拉斯和垄断罪恶的政权。
真理必将战胜修正主义者的谎言。
站在斗争岗位上的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让我们为反对修正主义破坏分子所期望的分裂、为实现真正的团结——即清除了修正主义毒素的共产党的团结——而百倍努力。
为使共产党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奋勇前进！
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